

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
「记忆南京 2011 年」的报告和课题

日中の戦後世代を対象にした
新たな東アジア型歴史・平和教育プログラム開発
～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による平和構築～

开头语（翻译）

本书是根据 2011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在南京举办的 4 天研讨会「历史心理创伤的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记忆南京 20011」的记录和考察而整理出来的，2009 年 10 月实施的「记忆南京 2009」记录已公开在网页上了。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研讨会实施时使用三国语言。遗憾得很，因受时间限制，有的部分来不及执笔文稿或翻译工作。在口译笔译时，也会因有语感的细微变化或因不同场合会发生微妙的误解。参加者的感想中叙述的研讨会内容，由于作者不同会产生若干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件事情，由于接受人不同，领会的内容也不同，而且通过口译或笔译则更加容易变得复杂甚至扭曲。包括这些事情和过程，我们可以说这都是小历史的构筑。总之，为了实施本次研讨会以及编辑本著，负责口头翻译的各位老师同学，他们边参加研讨会边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做出非凡贡献。没有这样超越国境的共同合作的话，就不会成立和实现这次计划。虽然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课题，但是我们实在期待这样的过程能够跟和平联成起来。

这次不但得到「科学研究费基础（B）：以日中战后世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基金扶助，而且也得到立命馆大学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南京师范历史学部、立命馆大学 R-GIRO「法律和心灵的协同合作」、文部科学省私立大学战略性研究基础形成支援事业「把大学作为模拟社会空间为持续自立支援的对人援助模范构筑」、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基础（B）：反挫世代的和平构筑和性别」的支援。

承蒙张连红教授、阿曼多·沃尔卡斯教授、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綾女士，以及中国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罗翠翠教授、村川治彦教授、金丸祐一教授、小田博志教授，还有负责口译或笔译、录音整理等大力协助的各位、参加者各位、以及后方援助的所有各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我们开始的起步比较小，请各位从今以后也给予大力协助，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能朝着和平的未来前进。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村本邦子

目 次

开头语（翻译）

村本邦子

第一部分 主题演讲记录

195

1. 「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 張連紅
2. 【记忆南京 2011】活动流程（翻译） 笠井綾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211

1. 记忆南京 2011 活動帶領者的省思（翻译） Armand Volkas
2. 续·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记忆南京 2011 年」的报告和课题（翻译） 村本邦子
3. 为南京「和解」一架起历史深渊之桥（翻译） 小田博志
4. 研究战争史等各种问题（翻译） 金丸裕一
5. 从一人称中走向「战争之体验」～以体验心理学为基准，构筑历史和平教育～（翻译） 村川治彦
6. 当历史在故事中相遇——“一人一故事剧场”在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会应用的思考 郑春晖

第三部分 参与者的感受

265

1. 震撼！感动！万感交集！“记忆南京 2011”抚平战争创伤国际研讨会感想 羅翠翠
2. 活动之感想 匿名
3. 南京记忆 2011 10 月 5-8 日 陈韵
4. 记忆南京 2011 董石

5. 参加南京研讨会感想（翻译） 藤原慎太郎
6. 为了东亚和平（翻译） 洪里奈
7. 记忆南京 2011 鸣去剑
8. 记忆南京 2011 黄志敏
9.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翻译） 川崎宏祐
10.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 默崛
11. 记忆南京 2011 感想文 刘忠良
12.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翻译） 仲野沙也加
13.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翻译） 西顺子
14.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野间瑠璃
15.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菅原悠治
16. “记忆南京”活动感想文 滕川
17. 报告文献（翻译） 和田慎太郎
18. 记忆南京 2011 交流活动感想文 王柯
19. “记忆南京 2011 ～ 战争创伤与和解修复的尝试”工作坊参后感 渡邉佳代
20. 记忆南京工作坊的感想 袁晓菊
21. “记忆南京 2011”感想 张帆
22. 被聆听的记忆 被理解的创伤—参加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会心路历程
郑春晖
23. “记忆南京 2011”國際研討會參加有感 翁曉丹

第一部分 主题演讲记录

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今天的报告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我在2009年HWH研讨班上做过一次报告,我担心内容重复。第二个是我要面对心理学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同学,所以要找到一个既适合会议主题又能让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感兴趣的切点,是很困难的。

从昨晚接到村本老师和阿芒德老师的委托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做今天的报告。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是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屠杀发生以后到抗战结束的八年。当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很快就有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未被日本占领的大后方被广泛的宣传,一些逃出南京的士兵和难民接受记者采访或撰写回忆,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本书是田伯烈主编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在部队里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抗战八年期间,在国民的记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主题是日军的残忍暴行,不断强化宣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主要目的是要激励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努力作战,收复国土。

但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号召国民以德报怨,尽管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但实际上,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上所进行的审判,都不彻底,被审判和处理的南京大屠杀战犯,实际上都是非常少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政策采用的也是一种比较宽大的方

式来对待日本战犯。实际上从 1949 到 1982 期间，中国对日政策宣传的重点是中日人民友好。政府认为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是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广大日本人民。也就是说，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军阀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尽管当时政府提倡中日友好的时候，特别是在 1972 年中日建交的时候，南京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抗议反对。当时各级政府基本上都通过各种方法，压制民众的抗议。政府倡导的是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的观点。

也就是说从 1945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日军侵略暴行都是主张宽恕，着眼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和平与未来。

但是，从 1982 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之后到 2010 年，中国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的右翼，在修改教科书过程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些活动在媒体上大量报道后，中国国民特别是南京的老百姓心理上受到极大刺激。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幸存者要求对日索赔，1985 年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之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建立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开始仇恨日本人，一些反日的过激行动也不断发生。

近二十年来，在网上网民对日本的评价可以充分反映老百姓对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巨大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所有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民众暴行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个部分内容，我大概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认识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以后到 1982 年，第三个阶段是从 1982 年到现在。

2. 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变迁

第二部分我想介绍历史学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1980 年代之前，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或者说在 1982 年之前，中国没有人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暴行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也可以把它划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0 年代一直到 2000 年，在这个阶段，历史学研究南京大屠杀，其主要的思维方式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用大量史

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铁证。从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对抗性比较强。从内容上来看，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日军的残酷暴行、证明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人数即 30 万这一数字上。在研究表达的方式上，情感性比较强，论述成份比较多，而史料运用比较薄弱。其成果较多地体现了「以论代史」的特点。以论代史是指，用论点来代替史料，首先确定论点，并且以论点为基础来搜集资料。这是当时研究成果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是，研究者站在受害者立场进行研究比较明显。当时的研究成果和论文等，假如把作者的名字去掉，翻译成英文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地判断出这是中国人写的。也就是说论文作者的身份认识比较明显。

2000 年之后，我个人观察中国历史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始重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我们南师大、南京大学和南京几所科研院所，在南京大学张宪文老师的带领下一一起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到今年 6 月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到 72 卷，将近 5000 万字。这些资料的来源，不仅有中国的，还收集了许多日本的文献，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等散布在全球各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今天在现场做翻译的罗萃萃老师也参加了很多翻译、整理日文资料的工作。由于大量史料的公布出版，学者研究成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研究者更多是从史料来出发，开始更加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史料中的各种意见。在史料中发现的一些从日本的视角的一些史料，我们也不回避，也收集过来，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充分尊重这些不同的视角。由于拥有各方的视角，使我们学者的研究更加的客观和理性了。

另一个变化是，论文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讨论是 30 万、20 几万还是更多这样的数字问题。学者们也不再去关注日本右翼、否定派学者在讲什么，他们已经超出了对抗性研究这样一个范畴。很多学者研究已经克服了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身份意识来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许多论文已经看得出来这是中国人写的了。更多的学者已经从更高的一个视角，从人类这样一个视角，来反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他们的思维已经淡化了受害者是谁和加害者是谁这样一个原始的讨论。这几年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趋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当历史学者的研究视角能够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意识，

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历史创伤治疗。我相信当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都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和解就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的研究是历史创伤治疗和中日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中国历史学界这10年多的变化，也得益于许多日本学者的共同努力，像笠原十九司、金丸等教授，他们经常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学界认识的变化。

我特别有信心，历史学最终能够超脱时空、身份、民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视角。来研究南京日军暴行。

3. 从心理学的视角如何治疗历史的创伤

第三个部分我想从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如何治疗历史创伤。我个人觉得心理学对于心灵创伤的治疗是迫切需要的。这是我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感受到的。我调查访谈过数百位幸存者，有很多幸存者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后，他们心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我是学历史专业，面对他们精神创伤，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创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治疗，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平衡。

后来我接触到很多日本学者和普通民众，我感觉到不仅是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本的老兵有心理创伤阴影，一些普通的民众身上也都有体现。

1999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我见到当时在会议上帮忙的义工，我真诚邀请他们到以后到南京来访问，但是他们的回答大都是相同的，他们心理上不敢来南京。我想像日本义工这样心里的感觉很多日本人心里都有吧。我记得在2009年研讨班上，我听到一位日本同学的感想，她称也有害怕来南京的感觉，但是来了之后参加这一研讨班后，她感到心里很平和了。

参加过战争的很多日本老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到了晚年以后，经常会做恶梦，他们要忏悔过去罪恶。还有一种类型是，在靖国神社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穿着日本军服的老兵，在靖国神社里面回忆自己辉煌过去。我相信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在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我曾经接待过至少3位日本老兵，在我们学校访问和演讲。

有一位老兵叫本多立太郎，到我们学校做的谢罪和忏悔演讲已经是他的第1000多场了，东史郎也在我们学校做过精彩的忏悔演讲，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他也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对话了关于

战争的记忆。他作为日本的作家，我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广岛原爆的作品，我想他对日本加害中国的战争反省，也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日本老人，他退休以后到中国，在南京办了一个企业，他希望把他的不锈钢的技术，免费传授给中国人。他有一个有趣的经历，他曾经被一名中国年青人骗了 100 万日元，但是他心里面感到这是他前辈子做了对中国不好的事，应该用一种方法还给中国人。

大家如果注意了昨天的报纸，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位叫久保惠三郎的演员，听说一位幸存者刚刚去世后，他来到纪念馆这位幸存者的铜像面前，向她道歉。

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我不再具体举例了。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 74 年之前，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横亘在当时经历者以及完全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日两国国民的心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思考，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战争阴影心理创伤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以战争创伤治疗为目的工作坊，我们参加的人数非常少，但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庞大的需要心理治疗的群体。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工作坊，我们要做的就是类似刚才看到的 Play Back。当我们面对面望着对方的眼睛，不要去在意对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记住我们都是人类，真诚地凝视着对方，用心与心进行交流。这四天，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完成每一次 Play Back，共同分享我们的感悟，这一点非常重要。

2 【记忆南京 2011】活动过程(翻译)

笠井绫 MA, MFTI 表达性艺术疗法

加利福尼亚综合学研究所 东西方心理学博士课程

2011 年 10 月 5 日到 8 日,在阿曼德·沃卡斯先生的协助下,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运用历史创伤治疗(HWH)手法的对话性工作坊活动。在本文中,我想将这次活动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笔者是以艾迪领衔的翻译工作组中的一员,偶尔也加入到实践中来。每一个练习给参加者留下的印象和带来的影响,我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参加者的感想和之前对参加者的访谈来进行分析。我想在本文中结合我自身的感想来进行汇报。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HWH)

历史创伤治疗

历史创伤治疗,是研究戏剧疗法的阿曼德·沃卡斯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以让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子孙共同走出大屠杀这段历史留下来阴影为目的的。历史创伤治疗是大量运用戏剧以及表达性艺术疗法的一种和解方式。在各种有纠纷关系的群体之间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应用。HWH是以“群体创伤”,“创伤的世代相传”,“文化或国家的身份认同”等,这些给自尊心带来的影响的概念为基础的。(沃卡斯,2010)这个方式,包含了和解的留个步骤(1.打破沉默2.互相确认对方的人性3.意识到加害的可能性4.悲伤的共有5.共同的作业,仪式,创作,表演6.朝着服务,创作去改变)这些步骤也不是一直按顺序进行的。首先,在少人数的小组之间进行对话工作。为了让对话的效果在集体中得到推广、共有,举办仪式或者表演。在这次的尝试中,作为集体共有的一种方法,在日中演剧团的协助下,沃卡斯先生频繁地运用了“一人一故事剧场”这种公演方式。“一人一故事剧场”是把谈话者讲述的故事,以及观众的声音,通过即兴的互动演剧表演出来,也作为戏剧疗法的一种手段。它是共感和理解的媒介。

参加者

这四天活动主要的参加者有,南京方面:历史学、心理学、日语专业的中国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10名、教师1名。其中广州方面:6名。香港方面:2名。中国人中的社会人士分别来自教育、对人援助、金融、艺术等行业。日本方面中

有中国人留学生 2 名，在日韩国人 1 名，日本人中有大学生、研究生、社会人士、老师、研究者共计 18 人。日本方面与会人员的专业分别来自心理学、对人援助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等等。另外，还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及工作人员，也根据他们繁忙的日程，抽空参加了部分活动。主要以 20 多岁的学生为主，总计 40 人左右。在参加这次活动的大学的协助下，基本上是以 HWH 中两个有纠纷的集团的人数以达到均衡为标准来招募参加人员的。其中 20 几名不是长期住在南京的参加者，都住在南师大宾馆，此次工作坊也是在宾馆的会场中举办的。

10 月 5 日 活动第一天

第一天早晨，没有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参加者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因为 09 年的活动中，参观纪念馆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次活动中，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作为活动内容的一项，而且参加者自行参观。这一点我们事前就通知了各位参加者。因此，日本来的参加者几乎全员都去参观了纪念馆。

上午：导入

寒暄 / 欢迎及报告之后，张连红先生做了关于南京历史的讲演。并且在讲演的过程中也穿插介绍了“一人一故事剧场”。表演者们表示张先生的讲话（参照副本）及听了张先生讲话后参加人员的感受通过即兴演出呈现了出来。这一过程中，特别是中方的参加者谈到了上一次活动的感受，以及现在的思考。把想与其他参加者积极交谈的心情，新的疑问，想要控诉些什么的心情等表达了出来。我感觉“对话”似乎已经开始了。

下午：HWH 工作坊

热身练习

大家围成一个圆，

姓名和活动：通过名字和动态表达，将自己现在的心情和感觉以自己喜欢的任何动态形式表达出来。一个人完成后，其他所有人模仿他的动作。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缓和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并且自我介绍。

想象接力：把想象中的物体，交给下一个人。例如火柴和从鱼缸中拿出来的金鱼。让大家自然地习惯表演和游戏。火柴灭了，离开水的金鱼必须快点传递等等，为了表达出这些，大家都很配合。时不时也有人用火柴点烟，或者不小心让

金鱼掉到了地上，这些都引来了大家的笑声。

声音之球：如果有一个人扔出了有声音之球，被扔的那个人必须首先一边重复刚才的声音，一边接住那个球。接住球之后要发出新的声音并且扔给其他人。声音之球从一个增加到2个，3个。发出声音，眼神对接等等，都促进着积极的交流。

站成一列，

从这边到那边：单独表演：通过即兴的表演、行为、声音，每个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从房间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自发性的自由的表达，渐渐习惯被他人围观）组队演出：两个人一组，在互相没有沟通的前提下，即兴地表演一个场景，并从房间的角落到走到另一个角落。（和他人合作的游戏，即兴性）

围成两个圆，

30 秒短剧：

两人一组的角色扮演。在30秒内演出被赋予的角色。

边检人员 / 想入境的有些可疑的旅客

校长 / 犯了错误被点到的学生

在减肥的人 / 很有诱惑的甜点

呈现出一张白纸的电脑屏幕 / 面对作业不知如何是好的学生

喷火的龙 / 骑士

两个在公园相遇的害羞的4岁小孩

通过对这些的表演，把纠纷、权力关系、生硬等等和对话的主题有关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幽默表达出来。因为是所有人一起演的，所以大家也不会太害羞。就如同回到了童年沉浸在游戏之中。语言不通的人配成一组的情况也很多，大家通过表情、动作、声音，很好地进行了沟通。

Line repetition（台词环节）：两人一组，只能用确定好的一句台词，改变说话方式，持续表演30秒，观察在此之中的情感和感观上的变化。

好想要啊 vs 不行

请原谅我 vs 绝不原谅你

对不起 vs 你好过分 等等

这些与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主题很近。没有故事和来龙去脉，仅仅是通过这些语言，也会有很多情感呈现出来。通过观察进行这个练习的小组的样子，可以知道前期的导入是否充分，大家现在的情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做好了接受的

准备。这些分组练习，搭档是在不断更换的。在更换搭档之前，先确认上一位搭档的姓名，并且互相握手。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们做出了“请在屋里转一下，和刚才没有跟你配对的人互相确认姓名并握手”这一指示。

Socio circle（社会的圆）：围成一个圆，一个人说出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的一个主题。觉得与这个主题相符的其他人，向前迈出一步，围成一个小圆，互相看对方的眼睛，以示确认。确认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体验。虽然自己也有相同的体验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人，可以选择不动。

父母曾是军人的人

祖父母曾是军人的人

从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听到过战争经历的人

与曾是敌对国的人交往，并且结婚的人

与曾是敌对国的人成为好朋友的人

受到过歧视的人

在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分成若干小组，互相交流这些联系后的感受。HWH通常是在 25 人左右的小组中进行，这次因为是 40 人左右的尝试，所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被很多地运用了进来。在日文和中文都懂的 7，8 名参加者的帮助下，小组讨论得以实现。

记忆中的物品

这个环节更加接近主题。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通知了各位参加者带来一个把自己和这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物品。在思考带什么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自己和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导入。我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了分享带来的东西和与带来的东西有关的背后的故事。在此之后，每个人用一句简短的话，在大家面前介绍自己的物品，并将自己带来的物品供在用彩色丝巾装点的祭坛上。这些物品将一直放在那里展示到最后一天。大家带来介绍的物品有战争年代祖父母的照片、纪念战争的邮票，让自己了解到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漫画、书、相册、报纸，还有关于曾是士兵的高中前辈的文章、教科书和事件有关的老师的照片等等。通过这一环节，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并且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继承着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

10月6日 活动第二天

刚开始的一小时，我们对昨天的活动进行了回顾。昨晚做的梦、今天早晨的感觉和情感都得到了共享。把这些让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成员们通过即兴表演演绎出来，尝试了集体的共感。在此我想介绍下几个分享的事情。

日本女士：我梦到了战争时候在菲律宾当卡车司机的祖父。我梦在我自己生活的地方，坐在祖父开的开车上。祖父不太认路，驾驶技术也不好。我恨不得从副驾驶站起来握住方向盘自己开。

其实这是笔者自己的梦。做完这个梦之后，我无法从中走出来，也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完一人一故事的表演，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梦的意思。我继承了战争历史中的祖父的卡车，自己驾驶着的卡车，似乎朝着和祖父他们曾经想创造的不同的未来开去。

中国女士：我感到很平静，很冷静。我的体内被塞满了很多东西，好像是成熟的圆圆的石榴。这位女士这回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个工作坊了。看完一人一故事剧场的表演，她说“虽说爆炸了，但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似乎变得更加平静了。”

沃卡斯先生这样解释到，这样的练习，【不只是为了看清历史，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会如何去吸收这些，自己的体内将如何维持这些感觉，情感，印象。】一人一故事，是通过印象来促进共情，能够帮助分享参加者能够更加鲜明地了解自己的感觉、情感和意思，也能把这些传递给他人。

这之后，夏淑琴老奶奶来到了会场，讲述了她关于战争的证言。（证言内容参照副本）。听了她的讲话，好几名参加者坐到了夏奶奶面前的椅子上，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心情。日本方面的参加者表达了谢罪的心情，表达了绝不会忘记夏奶奶说过的话，以及要把这些告诉自己身边人的决心。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向夏奶奶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等等。大家把自己所想的都告诉了夏奶奶。夏奶奶一边赞同大家，一边接受着来自大家的暖意。夏奶奶在交谈过程中说道“你们不坏，坏的是军国主义的政府。”也表达了希望我们年轻一代更近交流的愿望。这些不仅仅让在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深深感动和感谢，也提高了我们增进交流的热情。

下午：HWH 工作坊

身份认同环节

我叫***。我是***人。

沃卡斯先生作了说明：“自己国家的历史，对于给自己认识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这就来看看”站在大家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国籍，聚焦在自己的内心，自己有怎样的感觉、情感和印象。重复说几遍都行，或者用别的语言说也可以。这次，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士和一位日本女士，还有一位香港出生的男士主动挑战了这一环节。他们每一位都感受到了说出自己国籍时候的矛盾感，而且在说出自己国籍的时候，涌现出了很多背后的故事以及复杂的感情。在此之后，我们分成小组，做了同样的练习，并进行了分享。

椅子环节

象征着日本的椅子和象征着中国的椅子相对而置。谁都可以坐上去代表集体的声音，进行辩护这样一个环节。沃卡斯作为协助者说道：“也许这样做会觉得有些可怕，至今为止的活动中，我们构筑起来纽带、羁绊，如果不把聚积在心里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解。”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不问国籍，谁都可以坐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椅子上来。在此之中，日本人坐到中国的椅子上代表中国的声音；中国人坐到日本的椅子上代表日本的声音，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开始是一个人一个人坐到椅子上，中日两国对立的声音被表达了出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后半段中日本人不断地谢罪，对于这些，中国方面也不断地接受着来自日本的谢罪。日本人方面产生了“究竟要背负着这些谢罪和罪恶感到什么时候？”的这种疑问，以及对于这个疑问的愤怒和无力感。而从中国一方也传来了希望把日本人视为“鬼子”的这种印象能早日从历史上抹去的愿望的声音，以及想要接受个人的道歉，并且原谅日本人的声音。还有从日本一方传来了希望更多地倾听来自中国的愤怒，和希望政府之间能够共同编写教科书的愿望的声音。

这个练习之后，我们扑扑身上的灰尘，放下扮演的代表“国家”的角色，围成一个圆，每人用一个词来分享刚才的感受，作为这一环节的结尾。2009年的尝试中，没有达到适合的时机让我们进行这种率直的意见交换，沃卡斯说“2009年时，我们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纽带如果因这一环节断了，大家的关系又断绝了，是很可怕的事情。”于是这次，即使是冒着这种风险，我们似乎已为率直地进行对话打下了基础。

10月7日 活动第三天

上午：从参加者的点名开始进行。因为前一天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首先倾听了大家在前一天的活动中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心声。一位中国男生说，“政府还没有公开的道歉，至今我们还觉得被日本人看不起。”对于他的这番话，也有人和我们分享到“日本人长年都在想去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有右翼反对势力的存在。到底要怎样的道歉这件事才能结束呢，我的心里又复杂又悲伤。”之后，另外一位日本男士讲述了他在美国的体验。沃卡斯总结说通过一人一故事剧场提供了一个将个人体验和分享给大家的场所。然后，三个人分别通过一人一故事剧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参照宗像佳代的报告书）

下午：由于上午大家一直坐着分享的故事以及看一人一故事剧场的表演，可能有些坐不住了，所以下午的活动以肢体运动开始。首先作为导入，我们还是进行了【姓名和活动】这一练习。之后两人一组，所有人进行了以下的练习。

相互的雕刻：两人一组，其中A摆了一个姿势，然后B要加入到A的姿势中摆出相对应的姿势。然后A再根据B的姿势摆出相应的姿势，这样重复进行。

礼物：A把一个想象出大小和重量的物品送给B。B即兴地说出那个物品是什么，然后感谢A。“哇，好漂亮的**啊，谢谢啦。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接住哦！”B对A这样说，然后将一个重量和大小不同的想象出的物品送给A。A接下这个只是大概知道重量和大小的物品，对B说“哇。好赞的**啊！那么我也……”这样重复进行。

表演一个场景：

登山：两个人一组，将正在攀登一个很难爬的山的场景持续表演1分钟。

遇难：飞机坠落在亚马逊河畔，在热带雨林中两人幸存下来，互相都很惊魂未定的场面演一分钟。

神话故事：两个人一组，即兴地创作神话故事。A先说“从前有个地方。。。 ”自由讲一段时间后，听到“交换”的口令后，B接着A停下来的地方说“然后、、”以这种形式重复进行。

表演神话故事：这次是讲故事的人边讲便加入肢体动作进去，和刚才一样创作神话故事。

寓言：故事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开始治疗之旅。然后在这个故事中，幸存者，发怒的中国人群体，有智慧的贤者，扬子江等先后出场。也是以两个人交换着创作的

形式进行的。

我认为这些也是把在这次工作坊中我们体会到的“纠纷”和“历史”这些深刻的主题，在身心都放松的环境中，通过做游戏的心情以及想象力来再度表达的一种练习。

自我认识环节

信息之图（自我认识的解体和构筑）

我们的自我认识以及相互的认知，是通过家庭、学校、朋友、社区、媒体、网络、政府、书籍等平常接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行成的。我们是从哪里接受到了怎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实际的地图来描绘来解释，并且认识这些。在这认识的过程中，从负面信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和各种各样的信息去对话、去选择、取舍这些信息，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通过将个人描绘的这张图在大组中再现，将那个人的图中出现的角色演出来的方式，促进相互的理解和共鸣。这次是一位中国朋友将她的信息图展现给大家。日本出生的母亲战争年代在日本被叫做“チャンコロ”（对中国人的蔑称）受到日本人的歧视，不得已回到了中国，可是在中国也同样遭到了歧视。作为女儿的这位女士明明是中国人，却被叫做“日本鬼子”遭到中国人的歧视。即使这样，也想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长年从事在教育岗位上。她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的信息之图。她和这个信息之图里面的几个角色进行了对话。参加者们扮演了这个信息之图里面的角色，亲身体验，我想他们应该有了共鸣。在这个环节之后，大家谈了自己的感受作为第三天工作坊的结尾。

第三天的晚上，这次工作坊的参加者，中国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和日本的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成员们举行了一场共同演出。（参照宗像佳代的报告书）

10月8日 第四天活动

上午：追悼仪式

和2009年一样，在扬子江畔的燕子矶纪念碑前，我们共同举行了追悼仪式。和上次一样，日本人和中国人2人一组进行追悼的形式，得到了参加者们的赞同。首先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两人一组共同向纪念碑献花，献上追悼的祈祷，互相给对方作证。之后，中国人一组，日本人一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一组，再次追悼。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带着追悼和谢罪的心情，严肃地为战争的牺牲者祈

福。在那之后，大家再燕子矶公园内进行了短暂的散步来缓和心情。虽然离上车时间很近了，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地在扬子江边的高台上互相合影留念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

谢罪环节：Please stay/I have to go（请留下 / 我必须走了）通过重复两句台词来进行导入之后，“你很过分！ / 对不起”通过这两句台词的重复，来即兴地演出任意场景。这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大家在幽默诙谐之中进行着表演。并且和自己的伙伴分享这一过程中的感受。然后沃卡斯先生向大家解说了谢罪的七个步骤（破坏、承认、责任、谢罪、原谅、修复、起誓）并将这七个步骤两人一组通过雕像的形式一一演绎出来。

椅子环节：沃卡斯先生最后有一次设置了代表中国和日本的椅子的环节。坐在椅子上，表达出两国的公开的对立的声音，然后绕到椅子后面，表达出受伤孩子的声音。中国方面的声音是，我们的伤痛没有被理解，我们没有得到谢罪。日本方面的声音是，不想被别人利用，不想被别人看到我弱小的一面，还怕，不知所措。这些代表着集体的困惑和受伤的心情，又被聚焦。在理解这些声音确实存在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今后应该怎样去做，得到了表达和确认。最后，参加者相互握手、拥抱。（这一环节的意图和详细情况记录在沃卡斯的报告书中）

希望之树：最后，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坐下，安迪作为协助者，把纸发给了大家。在上面大家写下了希望和祈祷，并且一念出后，像信笺一样挂在了事先在舞台上准备好的书上。

本文作为一个线索，将其中出现的台词和感情，以及通过怎样的流程，进行了怎样的练习，简短粗略的进行了汇报。过几个月，我想去采访这次的参加者，了解这次工作坊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向张先生、村本女士、沃卡斯先生，以及这次活动所有相关人员，献上我最诚挚的感谢。由于篇幅的限制，很抱歉我不能把大家的名字一一写进去。能够参加这次的聚会，我真的很高兴，也很光荣。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K. Muramoto (Ed.), *Generational transmis-*

sion of war trauma and efforts for re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 Remembering Nanjing 2009 (pp. 131-156). Kyoto, Japa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Human Service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记忆南京 2011 活動帶領者的省思（翻译）

Armand Volkas

MFA, MA, MFT, RDT/BCT

加州整合學院 副教授

生命藝術諮商中心 所長

生命藝術故事劇團 團長

歷史創傷療癒學院 院長

2011 年 10 月，四十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生聚集在南京師範大學會議室中，探討南京大屠殺中祖先們遺留給後代的影響。活動當中，一名日本男子哭倒在一個看來瘦小又虛弱的 83 歲半盲婦女面前，而這名婦女正是一位南京大屠殺的倖倖生存者。這個深深鞠躬的姿勢代表著日本文化中一份深深的尊重與歉意，這名男子正在為他的祖先於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乞求原諒。1937 年，日本士兵闖進她南京的家裡，就在她的面前殺死了她的祖父母與父母，還姦殺了她十三歲與十五歲的姊妹，當她企圖阻止這些士兵們的行為時，他們用刺刀捅了她三刀直到她不省人事。當時這名生存者只有七歲，當她從死亡的邊緣甦醒，家中僅剩她與她四歲的妹妹在驚嚇中哭泣。她的童年就在那一刻結束，她擔起了照顧妹妹的重擔。

這名日本男子用他充滿著難過的聲音和眼淚對著她說：“你的记忆中這些遭受過的痛苦將永遠不會被忘記。”這位婦女帶著理解與痛苦的心扶起這名男子，告訴他：“這是那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的所作所為。當時你並不在那裡，這不是你的錯。”這名男子懷著這份對於祖先的羞恥，謙遜地與其他的參與者共同見證了這名倖倖生存者的故事。

這個令人感動的道歉與原諒的儀式是此次活動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相遇最重要的核心部分。這些參與者主要是由世界二戰的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子孫們組成，大家相約在南京一起面對這次戰爭中兩個國家留下的歷史傷口，共同探索著心中這塊不曾被碰觸過的地方。

藉由道歉，這名男子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了一個面對南京大屠殺最大的禁忌。

在日本，南京是一個很具爭議的話題，人民對是否應該承擔起戰爭兇手這個罪名有著不同的看法，擔起這個罪名形同冠上莫大的恥辱，極為重視面子的日本文化價值觀念讓日本人民不願意直接面對這個事件。而這名男子腳下所踩著的，正是當初這些惡行發生的地方，如此道歉的行為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他必須認知到一旦他們這樣的道歉行為在日本被公開，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右翼的目標。

既然如此，為什麼日本成員要大老遠飛到中國為這些並非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呢？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紀念南京”的活動目的僅僅是一個讓參與者去面對處理這個歷史傷口的過程嗎？又或者它可以是一個集體性的社會變遷呢？

我們這些活動的策劃者與治療師們，是否正在日本與中國的社會中創造一個治療性的介入呢？當我們帶著日本學生代表團體在 2007，2009 與 2011 年來到南京時，我們是否正在推動我們的信念，建立一個日本與中國社會在世界二戰後被療癒所應該要做的典範嗎？當事件裡的暴行已經漸漸消失在歷史的回憶之中，這些個人性道歉與集體性道歉對於日本人民來說是否還具有任何的意義嗎？

倘若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有價值與意義，那在記憶南京這個活動裡我們的下一步該怎麼做，才能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有真正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避免這些革新的調停活動會消失在文化衝突與誤解中呢？

這些是我在 2011 年 10 月來到南京時問我自己的問題。我於 2009 年推動帶領記憶南京活動之後，(Volkas, 2010) 再一次我將我戲劇，表達性藝術治療師與劇場的技术帶進這個活動。我針對處理文化衝突與創傷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理論 (以下簡稱 HWH) 是一個用來面對處理歷史創傷的模式。(Volkas, 2003, 2007, 2009, 2010)。HWH 整合了即興創作，心理劇，社會劇，表達性藝術治療，戲劇治療，故事劇場和治療性的過程，同時伴隨著對於南京大屠殺，戰後的後代子孫於心理，情緒和靈性的探索。

這些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參與者意會到這名婦女是最後一個見證歷史上悲痛一頁的倖存者，他們輪流對她表露了尊敬。有一回大家分享了她的故事對他們帶來的影響，有一位將近三十歲的中國男子對這名婦女說：親愛的“奶奶”，我感受到你深深的原諒，你受了這麼多的苦卻仍然擁有一顆慷慨的心。當我聽到你的故事時，一股很深的憎恨不斷的湧上我的心頭而無法化解。從你的例子裡，我會試著將我的心變的像你一樣寬大。謝謝你，奶奶，你讓我們見證了你的故事。

當一名中國人與日本人相遇，那無數喪生的生命在他們之間畫下了一個很難跨越的鴻溝。中國歷史的傷口是如此的深，那些過去無法被遺忘。這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戰爭取走了將近兩千萬的生命，這個偌大的創傷仍舊影響著這個文化。在這個同時，日本與中國正嘗試共同建立經濟上的新聯盟，但這個歷史的傷痕依舊影響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當日本人民來到中國道歉，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影響也是政治上的影響。

如此一個個人和集體的道歉究竟有什麼樣的架構和意義？而它又是否具有療癒歷史傷口的能力？如果有的話，戲劇和表達性藝術是否可以被當做一個道具用來建造一個在日本與中國之間成功的道歉？

道歉不僅僅只是一句“對不起”，而是一個真實的演出。道歉中必須要有悲傷，懊悔，羞愧和謙卑。它必須要有情感，脆弱，真誠去被接受和顯露出深層而痛苦的歉意。這樣的情感是當人們在犯了過錯並且願意承擔責任時會經驗的罪惡感。它無法讓已經發生的事實有所改變，但是道歉仍然可以是羞恥心與力量的互換。我相信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道歉是具有療癒的效用。

沿著二十五個臺階往上，一塊龐大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佇立於岩石上俯瞰著長江，一名中國學生用日文為在場的日本學生誦念著石板上的碑銘，那是一個發生在1937年的故事。74年前，數萬名平民百姓就在這個地方被入侵的日本士兵用機關槍掃射屠殺，據說當時他們的血染紅了整條河流，集體網綁的屍體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被丟棄在河裡順著江流飄浮到南京市內震驚了原本就已瀕臨崩潰的市民。

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兩兩成隊，一起寂靜地走向石碑，他們將鮮花置放在石碑的前方，並且默默地向那些喪生於此的人民哀悼，之後學生們圍繞著石碑並注視著它好一段時間，然後一起鞠躬後大家才又走下石階。接著，成員們依照自己的國籍不同，分別共同圍繞著紀念碑，在沉靜中默默地各自認同源自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痛。在追念南京活動的最後一天，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成員都深深地融入集體性的悲痛。中國成員們自發性地使用來自孩提時期學習到的口號來表達他們對於身為受害者的創傷，在哭泣的聲音當中更可以聽見憤怒的震顫。他們誓言身為一個國家，不會再懦弱無能。日本成員們也表達了他們身為歷史創傷加害者的背上沈重的擔子，他們低下身子鞠躬表達集體性的懊悔，部分的成員在沈重的哭泣中流露出身為加害方的痛苦，他們的哀悼照亮了靜寂的幽暗。

這個儀式已經舉辦了三次。第一次在 2007，就已經成為當年活動的其中一個高峰。這個儀式在每一年都有著類似的形式伴隨些微的變化。儀式與非直接的語言溝通都是日本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在長江畔的這個儀式無形中裝載了雙方的悲痛。實際上，這個儀式儼然成為日本成員表達他們對祖先暴行的承認與懊悔的一種行為。每一次這個儀式可說都是以極具美感的方式進行，蘊含著戲劇與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元素，其中更是隱含著療癒與轉化的可能性。在這個儀式的供桌上，承受不了的情感在這裡都得以被完整的裝載著。

就在帶領與見證了感人而又美麗的儀式與整個追念南京的活動後，我卻依然感到不完整。當我在 2009 離開南京時，我感覺到活動裡在個人情感這個層次上應該還有更多的外殼可以被褪去。依照我在利用 HWH 處理多文化衝突的工作經驗中，我觀察到在藝術治療的過程裡，兩個相對立的團體可以迅速地達到基本的親密熟悉度。成員們往往都會很驚訝地發現“敵人”原來也有共通性並且喜歡彼此，也因此達到調停和諧的目的。然而，這樣的親密度往往是在深層的情感探索與類似創傷，羞辱或是憤怒等深層情感的表露後達到。所以在這次的四天活動的最後階段裡，照理來說應該是帶領一些接近尾聲的活動，我卻決定要冒險去再次揭開這個歷史的傷疤。我邀請成員們再進一步深層地看見自己還未完全表露出來的情緒。我知道在雙方的成員底下可能還有一些歉意與調解還沒有被全然地被看見。是否可能雙方團體能夠不畏懼地再次檢閱自己並且挑戰彼此已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親密熟悉呢？

在長江畔邊的儀式之後，大家聚在南京師範大學的會議室裡。我告訴大家：我們相聚的時候只剩下短短幾個小時。藉由剛剛這個感人的儀式裡，我們將這幾天浮出的悲痛都存放在裡面。在我們即將要道別之前，我邀請大家來共同理解道歉的藝術，因為那是我們在這個活動裡最核心的部份。在接下來的時間，希望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察覺自己的情緒，看看自己在這個“道歉”的心路歷程中是在哪一個階段，而這樣的察覺又該如何應用在中日關係裡。

在我針對“個人性與集體性道歉”的研究當中，大致上可以分為八個基本階段：

1. 破裂，違背，或攻擊性的舉止
2. 在言語或非言語上對於道歉上的要求

3. 承認並認知到傷害已經在雙方之間造成傷害
4. 對於自己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負起責任
5. 在道歉的表現中表達了遺憾，哀傷，懊悔，羞愧與謙卑
6. 若造常傷害的事件是可以被原諒和接受的 - 給予原諒（拒絕原諒也是一種可能性）
7. 情緒或實質上的補償是在道歉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雖然有時候無法實現。
8. 直接或間接的承諾，這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在此次的活動當中，用中文與日文將以上的八個步驟標題寫在板子上：

1. 違背
2. 道歉的需要
3. 承認
4. 承擔責任
5. 道歉
6. 原諒
7. 補償
8. 承諾

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兩兩成對，共同合作用具體的方式去探索道歉的動力，並創作一個演出。每一對都用他們自己的身體為八個階段分別做出一個人體雕像，並且呈現在團體面前。

當我分別念這八個步驟的標題時，每一組都用慢動作將整個道歉的過程依照標題表演出那個階段的靜止影像。整個過程利用視覺上的影響讓每組的成員內化整合何謂道歉。每個景象對參與者來說都彷彿是一個透視圖。

根據精神科醫師 Aaron Lazare (Lazare, 2004)，由於屈辱是一種在沒有被公平對待而被降低地位卻又無力抵抗的情況下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情緒，所以道歉必須至少要滿足一些被冒犯方的心理需求才可能成功以及被轉化。其中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自我尊重與尊嚴。

在中日關係當中，中國人必須要重新得到他們的自尊以面對在戰爭中巨大的恥辱。他們必須要重拾失去的面子。經過這個四天的活動，中國的參與者表達了他們對於自己高尚大國卻虛弱到被小小的日本接管的恥辱與羞愧。而日本右翼對於這段歷史的否認也造成了他們沒有被看見的痛苦，引起了在中國社會當中對於日本的憤怒，而這股憤怒埋藏在平靜之下仍然可以被感覺到，卻一直沒有被中國的參與者在活動中表現出來，直到接下來社會劇的演出。

我在團體的前面擺放了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並跟大家簡介接下來的社會劇如何進行：這張椅子代表的是一張中國人的面具，受了創傷並且憤怒著，一旦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就要呈現出那個姿態，誓言要在二戰中保護中國。而一旦你站或坐或跪在椅子的後面，你所代表的則是面具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如果你可以為中國發聲，你會怎麼怎麼述說這份脆弱的心？你的感受是什麼？你又會從日本人身上需要什麼？

而另外一張椅子代表的則是一張日本人的面具，受了傷並且憤怒著，它代表著日本社會保護自己的聲音，一旦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要呈現的是生氣，防禦和否認，拒絕承擔你的軍隊在二戰時於南京所做的任何行為。但是一旦你站或坐或跪在椅子的後方，你所代表的是面具底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你會怎麼敘說這份脆弱的心呢？你的感受是什麼呢？從中國人的身上你需要什麼呢？身為在二戰中被委派這份暴行的日本軍人的後代自孫，你的情緒又是如何呢？

在我解釋如何進行這個社會劇之後，參與者開始輪流扮演他們國家的角色，他們不僅僅為自己出聲，也為自己的國家出聲：

中國男人（坐在椅子上）：父親的罪過，報應會降臨在孩子的身上。日本！你必須要接受你祖先們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就是你的命運和責任！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只有少數的日本牧師有勇氣向我們道歉！連德國人都願意向他們的受難者們道歉，而竟然只有十分之一的日本政客願意道歉。他們是如此的懦弱而無法理解中國的痛！

日本男人（在椅子後面）：我不願意在中國人的面前展現我的弱點，這是多麼的丟臉。我需要這份盔甲保護我自己，我不想要接受我竟是如此的脆弱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停止你的哀號，中國！你這個偽善者！看看你在歷史

上曾經殘害了多少的生命，你沒有立場對我們批判！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我們需要你，中國！現在我們在經濟上依靠著你，我害怕再過一百年之後，我們會成為你的殖民地。你成長的太快了，你的憤怒在駕馭著你！你現在太強了！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經濟就是一場戰爭！日本，你在哭些什麼？

Armand：我現在要把這兩張分別代表著兩個國家的椅子挪開，我希望你們現在拿下這張面具直接對著彼此說話。為個人出聲，也為國家出聲。告訴對方你的心在說些什麼。你感受到什麼？你又需要對方什麼？中國人！你想要你日本朋友對你的道歉嗎？

二十個日本人與二十個中國人站在彼此的面前。

日本女人：我希望我們停止我們之間的戰爭！我希望日本可以停止傷害中國，承認這個歷史上的事實就是這樣的悲痛。

中國女人：我們被瞧不起。我們是如此的丟臉。我們不僅僅被日本欺壓，也被其他國家欺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股重擔。你難道希望我們看著這個被蒙羞的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傷嗎？我不願意帶我的朋友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因為我不願意他們像我一樣感到悲痛。我知道你們的天皇不再擁有實權，只是日本權位的象徵，但是我相信你們的天皇能夠停止這段歷史的傷害。我希望他能夠來到中國，來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來向受難者們道歉，這個舉動將可以療癒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創傷。

中國男人：我們不會默默的吞下我們的犧牲。我們希望你們看見事實，我也希望其他的日本人也能夠看見。一旦他們看見了事實，我們之間的關係才能夠改變。我們需要你們看見事實！

日本男人：這是一份很難接受的事實，但是我們願意看見它。

（好幾個日本人都闡述這樣的心情）

中國女人：我們希望你們能夠主動作些什麼

Armand：你希望他們能夠採取舉動？

中國女人：是的！

中國女人：我們不需要你們卑躬屈膝地道歉。我們需要的是你們能夠看見事實。

中國女人：我希望我們兩顆受傷的心可以互相融入彼此。

中國男人：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可以代表人民為這個歷史的創傷作些什麼。當初日

本的軍隊來到我們的土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插上日本的國旗，這裡並不是法國或是德國，這裡是日本。你們的驕傲自大對我們來說是很沈重的傷害與羞辱。

日本女人：當你談到日本政府的時候，我感到很無力，我對國家的政治方針沒有任何的權力。我可以看見你正在用你的心跟我們溝通，可以聽見你們壓抑的憤怒，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情感上的釋放，因為我們知道憤怒一直都存在著。我由衷的感謝你們告訴我們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你們一直在說這是日本右翼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事實上，戰後有很多的老師與學者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我們聽見你們，中國人。我們願意面對並且承擔，請給我們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Armand：所以你們現在的意思是說你們希望中國的參與者能夠看見並請感謝你們所做的改變？

幾個日本參與者：是的！

Armand：中國的參與者，你們願意與你們在場的日本朋友分享他們來到南京的舉止對你們的改變嗎？

中國女人：我們的歷史是很沈重的，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可以從你們的背上減輕一點負擔。日本的人民，謝謝你們來到南京！你們的舉動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凡。請你們不要放棄！

中國女人：我知道你們必須要承擔來自日本右翼的許多壓力，我也知道在日本還有其他人跟你們一樣對我們的這段歷史有所覺悟。我想要對你們，也對這些人至上深深的敬意。

中國女人：我願意與你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Armand：這個過程很痛苦，但是也很必要。我們現在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成員們在沈重的沉默中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女人：我想要與我這些日本的朋友們握手，因為我們都想要締造這個世界的和平

中國男人：我想要跟他們一起朝向這個相同的目標

Armand：你們想要握手嗎？

中國女人：我想要擁抱我的日本朋友

Armand：想這麼作的人，你們現在可以與對方握手或者擁抱

一個接著一個，日本成員與中國成員彼此握手，大部分的成員也擁抱了彼此，擦掉眼淚，並從剛剛的社會劇裡被分成兩個彼此對立族群的壓力中釋放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成員經歷了這個痛苦而又感人的過程，成員們學習到他們可以承受像這樣與對方直接面對這個歷史的傷口，不但沒有傷害到原本建立起來的友誼，甚至更加深遠也更堅定。在經歷過 HWH 這個社會劇的過程，成員們得以繞過雙方對於“愛面子”的文化價值裡的禁忌。一個人該如何道歉卻仍然保有面子而不會讓自己的家人，社會與國家蒙羞？這將會是在中日關係裡繼續要面臨的挑戰。然而，在活動裡利用兩張椅子去代表中國與日本的面具的目的，是在讓雙方的成員都能夠從集體文化的角度發聲，允許他們去更自由地發表想法與感受，當成員們從個人的角度表露他們的感受時，不一定能夠像這樣直接而激發地表達他們的聲音。

* * * * *

在這個簡短的文章中，我無法詳盡地描述這意義非凡的四天過程裡許多重要的部份，我會將這些點滴收藏在我的心中，而它們將會更充實我將來面對類似這樣彼此之間有衝突的團體。

我想要感謝 Dr. Kuniko Muramoto 對紀念南京活動的策劃和 Dr. Zhang Lianhong 第三次招待在南京師範大學的聚會。我也要感謝 Dr. Hara Murakawa 在活動初始時候的帶領，基於他在近二十年前就針對調停中日關係的非凡見解，才能造就在我們在南京的相遇。同時感謝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在 WHW 裡最常合作的帶領者，Aya Kasai，感謝你持續對於療癒亞洲歷史創傷的貢獻，和你在日文 / 英文的翻譯，倘若沒有你的支持，我無法實踐我在日本與中國的工作。還要感謝接下來的這位戲劇治療師和一人一故事劇場家，Eddie Yu，擔任此次活動中文 / 英文的翻譯。並且在活動的第三天與 Kayo Munakata 共同帶領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精美演出。來自日本的 Playback Theatre AZ 與來自中國的同聲同戲劇團共同合作卓越地將日文與中文融入即興創作中，象徵著中日關係的合作與調和。這些演員們能夠迅速同理彼此文化之間的能力，深化了 HWH 的過程，更是對於“追念南京 2011”的活動成功貢獻良多。謝謝你們！同時感謝 Luo Cuicui 日文 / 中文的翻譯，你將活動的過程細緻優雅地串連在一起。最後至上的最高的感謝給所有願意相信我們來參與活動的成員們，成為彼此國家在療癒歷史創傷這條路上的先鋒。

- A.V., November, 2011

文献 References

- Davis, Laura, *I Thought We'd Never Speak Again: The Road from Estrangement to Reconciliation* (pp. 226 – 238),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2.
- Lazare, Aaron, *On Ap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eveton, E. &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Germans and Jew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Healing collective trauma using sociodrama and drama therapy*, Leveton, E (Ed.), (pp. 127 – 146) New York, NY: Springer.
- Miller, R. & Volkas, A., (2007)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In A. Blatner & D. Wiener (Eds.), *Interactive and improvisational drama: Varieties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pp. 34 – 44). New York: iUniverse.
- Volkas, A. (2003). Armand Volkas keynote address. *Dramascope: The Newsletter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Drama Therapy*, 23(1), 6 – 9.
- Volkas, A. (2009)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Drama Therapy in Collective Trauma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 Resolution*. In D. Johnson & R. Emunah (Eds.), *Current approaches in drama therapy* (pp. 145 – 171),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Ritsumeikan human services research*, Muramoto, K. (Ed.), (pp. 130 – 156), Kyoto, Japan: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续·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记忆南京 2011 年」的报告和课题（翻译）

村本邦子
立命馆大学

1. 引言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对虐待、性暴力、DV 等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与心理创伤研究工作，已经迎来 20 年多个岁月。预防活动也一直在并行工作着，在我的工作延长线上，都是以民间性心理创伤，历史性心理创伤为主题的研究。我对战争问题一直很关心，主要是由我个人意识中产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

参阅过去的一些详细论文（村本，2004，2008，2009，2010），通过村川治彦先生的于 2007 年 7 月、阿曼多·沃尔卡斯（Armand Volkas）先生和 HWH（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愈合历史的伤口）相遇，然后又参加于 2007 年 11 月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国际研讨会」。当时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连洪老师、学生们的相识。让我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主题，中日两国又试办了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记忆南京 2009 年」和 2011 年 11 月「记忆南京 2011 年」举行了这两次研讨会。本论文是 2011 年的总结报告。

本次研讨会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研究费基础（B）：以日中战后世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科研赞助而得以实现。作为带领人的沃尔卡斯先生、翻译兼帮助是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绫女士，同时并得到中国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支持，大家一起制定了更有发展性的方案。此外还有村川晴彦先生（身体教育学），金丸雄一（中日关系史），小田浩先生（文化人类学）都来此参与，真是一个跨多学科领域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日本政府补贴而实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详细数据分析留给今后的工作，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记忆一下本次研讨会，把大致的概要和目前的考察做一下汇报。

2. 加强我们彼此纽带的连接和「进一步迈向和解」的进行

在 HWH 上, ①打破禁忌和沉默; ②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组织, 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有故事的人; ③让他们觉察自己在潜意识中可能变成加害者; ④体验什么是深深的痛苦; ⑤表演、仪式、追悼等统一·表达和共同工作; ⑥变换成对社会的服务和创造性活动; 这“和解的六个步骤”里。根据沃尔卡斯先生(2009年)的 HWH 持续这个研讨会, 譬如即使更换参加者, 也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使用 HWH 这个方法是第二次, 如果包括 2007 年的国际会议的话, 那么有的参加成员已经是第三次了。包括我在内的中方日方的主办核心成员, 都感到参加者对日中这个具有连续性配合的研讨会的信赖已经超越了国境, 人与人的相识加强了友好纽带的衔接。

2009 年的研讨会中很鲜明地体现出这些, 参加此研讨会的本身就是具有“打破禁忌和沉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决定参加此研讨会, 这就是迈出最初的第一步, 这个阶梯就是彼此往来的一个过程。此外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走向阶梯的方式不同。但是只要能参加此研讨会, 自然就会感觉到「彼此不是一个团体, 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拥有故事和面孔的人」, 并以此感觉来促进这个过程。作为中国人参加这样的研讨会, 需要接受正要正视过去日本人的存在的这个事实, 和总括不了日本这个民族群体的认识相关; 而作为日本人带着一种内疚或恐惧来访问中国, 受到的却是热情的款待, 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虽然是很应该的, 能面对彼此并一起感觉不同的故事, 这才能更上一层阶梯。此次来参加研讨会的人, 中国方面包括居住在香港和海外生活等具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 日本方面也包括在日生活的外国人, 参加者他们都亲身体会到中国对日本, 这个二项对立的方法捕捉不到的事实。

然而对于「自己内心中的加害者性」, 似乎要求有个新的进展阶段。围绕着南京大屠杀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构造中, 容易形成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构造。在最初的阶段里, 这种受害者和加害者性很容易固定下来。日本方面, 特别是男性与加害者很容易认同, 只有对此表达抵抗。日本女性把「自己内部的加害性」, 放入自己的内心里, 直到感觉到「右翼的声音」时才开始。在 2011 年的此次研讨会中, 与中国男性共同分享时留下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 留学美国的朋友志愿报名去参加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故事, 「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 就会被射死。谁在这种场合下都会做同样的事」, 他很有讥讽性地去给予肯定。另一个是: 「别

哭了！谁都会根据情况做出这样的坏事，不只是日本人，如果是我也可能那么做」类似这样安慰的语言。这两个故事中都是人到了一种极端状态，谁都会有可能成为一个残酷的加害者，这些言词已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里双方共同往哪个方向进行，这就成了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所以没有办法」，而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去做把自己逼向极限状态的事情」。

「深深的痛苦经历」，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对于感情程度的理解深度是不可缺少的。但参加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故事，特别是在倾听幸存者叙述时，这种感觉会加深，那种具有象征性的追悼式似乎已达到顶峰。

「深深的痛苦」，是对受害者所经历的悲哀，也是对这样残酷加害性的悲哀，看到了人类中有着类此残酷性罪恶时的悲哀等，是从好的角度中感觉到的悲哀。根据纽带的加深和采用艺术表达的引导，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的子孙，此次比上次要更相互接近了一步，打开了心扉。超越礼仪和谦逊，完成了向共同分享述说真心话这个难题的挑战工作。表面上可以听见在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声音的背后，各自隐藏着受了伤的孩子的声音。这是采用沃尔卡斯先生的「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个舞台设定，治疗专家的语言促进了表达。能用肉体感受到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子孙们的哀悼和痛苦。这两把椅子实现了这种可能性，让日本人坐在中国人的椅子上，让中国人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用换位思考来促进自己自身位置的相对化。

「表演、仪式、追悼等方式的整合、表达和共同工作」，使程序的最后整合部分有所促进，「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变换」这个阶段，表达出对未来决心。口译和笔译等积极地配合是这个项目的开始。今后通过岁月的流逝，期待着从参加者中能论述出向和平活动承诺的报告论文。

3. 用艺术来帮助表达

HWH 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采用了戏剧 / 表达疗法的艺术方法。沃尔卡斯先生说：“戏剧疗法有着娱乐的因素，娱乐作为在跨国文化斗争和解中具有许多功能。在战争这个很深重的主题里，带入娱乐之心，成为继承集体心理创伤的解毒剂的同时，帮助引出了参加者「儿童时」的自我状态，「恢复了孩子们接受家长爱护的权利」有一部分被开放，对孩子们挽回了失去的纯真有很大帮助。还有从心理创伤的印象、记忆、继承下来的集团心理创伤信息中孕育出艺术和社会活

动，是克服心理创伤最强有力的方法（沃尔卡斯，2010）。

关于戏剧 / 表达疗法的有效性，在上次研讨会就有很多参加者谈到。通过超越戏剧和艺术，用身体和作品的形式来表达，用共同拥有去促进升华。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把历史的心理创伤不是作为抽象的普通论，而是作为极个人的东西被理解了，通过动作发散能量，也许能够从历史的心理创伤中避开了二次受伤。

特别此次通过连续两次「中国椅子、日本椅子」的互换，把这两把椅子放在相对的位置上，由于把椅子表面（社会上的面孔表面上的声音）和背面（容易受伤的孩子的声音）分开使用，而相互明确了各自的立场差异，双方都能够同时表达出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此这样的舞台设定，传播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成为多音的安全的表达声音的装置。

此次研讨会采用了故事剧场。关于故事剧场的介绍请参照村本（2009），以指挥者（主持角色）引导的形式，其中参加者里 1 个人作为叙述人，把自己的亲身体会介绍大家，这样就成为参加者全体人员共有的一种结构。得到中国的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的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协力，剧团团员参加了为期 4 天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中完成了通过使用一人一故事剧场这个方法，完成了 40 人为一个大组的研讨会。由于带有充分娱乐性的后援参加者的存在，使参加者的表达幅度得到了扩大。

第 3 天的夜晚，一人一故事剧场公开了演出。HWH 的最后的阶段是「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改变」，由于少数研究者的参加，使得他们成为沟通感情的带头人，并且以仪式和表演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公共活动，其影响效果波及到整个社会。重新体会到了艺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很多参加者彼此不相知，但是在沃尔卡斯先生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中日剧团团员的初次共演。结束了第一天的研讨会之后，不能忘记他们每晚都此热情重复彩排的景象。在专业协助者的帮助下这种超越国界的活动，实在让我觉得此次研讨会活动比预想的感动要大得多。

4. 遥远的战争和当今的战争

在第三天晚上进行的「记忆南京 2011 年；日中一人一故事剧场共同演出」，从中挑选 4 个故事来分享。结果是三个世代的故事，都没有把南京大屠杀作为故事情节。这个 HWH 研讨会的整个流程，到此为止都设定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的故事，经过三天的活动，此次研讨会到这里终于演出了以三代为主角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表达出来的是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相爱的一对恋人，以留学和经济交流的形式，使他们成为了永远分不开的亲密关系。虽然在那个狭窄的彷徨、沮丧、犹豫中，这两个年轻人决定携手共同走向明天。「时代不同了」「世代的更新」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让我再一次去深思如果在今后把南京作为我们的记忆继承下去。

研讨会的第一天，比起「亲耳听过战争故事的人」群体来说，「没听过的人」的年轻人比我预想的要多。往往认为没有听过故事的日本年轻人很多，但这次发现在中国年轻人当中也有许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次参加研讨会的大多是南京周边出生长大的或是作为大学生在南京生活的人，这次包括从远方来的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也有「对南京大屠杀不太了解的」中国人。在追悼仪式上偶遇一个中国年轻人，在我的询问下他回答说「对战争不太知道」，他明年想去日本学习。我们交谈了一会之后，接着是「中国人小组来进行追悼仪式」，那个年轻人随着声音做出了某种反射性反应，他立刻加入了中国人的行列。

2007、2009、2011年，南京研讨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亲耳听到幸存者的故事，眼看着那些奇迹般活下来的人，这个体验比想像的还要强烈。能亲身体验这种存在，在大屠杀博物馆和书本上代替不了这种强大力量的体验。此外，作为日本战争幸存者叙述战争是自己的一个使命，那种宽大能够很和善地引导参加者们鼓起勇气去面对黑暗。但是在阴暗的背后，应该有不计其数的幸存者永远不想去面对日本人。可悲的是幸存者的人数在年年减少，我们的研讨会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而得以举行的，为了和平如果能够再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么那个时候研讨会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

如上所述，参加者听朋友说参加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都感到有些触目惊心。当然望远世界，好多地方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这意味着许多青年都被动员到战场（实际上许多幼小的孩子们也被动员到战场上），但好像还是有一种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感觉。至少从来没听说过，日本留学生自愿参加美国发起的战争，这也许仅仅是我们缺乏想象力。通过举办三次研讨会的交流，对我来说，我很喜爱来参会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但是当听到「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这样的言谈，或是当想像到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拿着枪，仍然感到很震惊！

到今为止，「也许不只是南京」这样的意见受到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但

是在人的一生中能够面对的事物是有限的，虽然南京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但它将超越很多意义。不要把南京的记忆相对化，请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连接整体里去，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5. 性别与战争

这次研讨会使我强烈感受到一个性别问题。通过「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个活动，再一次听到了中国和日本的「男人」（比实际的男人更加「男性化」，或者应该称为「属于男性分类的人」）的声音。例如，作为中国方面的「你们是不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进攻和侵占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必须富强起来」。「我们永远忘不了过去痛苦的历史，我们近代不只是受到日本，也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犯。类似这样痛苦的历史要我们反复面对，反复受到伤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虽然最近中国和日本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然后在追悼仪式上，中国小组都举拳头发起誓来，无论怎么解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但还是令人感觉震惊的场面。

事实上，于 2011 年 8 月在苏州举行的「第三届表达性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笠井綾女士还有 200 名参加者举办了 HWH 的工作坊。当时在那个群组里，一个中国男性呼吁「大家想过没有，为何三十万中国人连反抗都不想就被杀掉？！」另外一位中国男性又发起号令「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必须得强大起来！」，于是很多中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其他群组的人，虽然不懂语言，但是被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的沮丧、怨恨、痛苦和悲那种感情的力量所压倒。本学会会长山中康裕先生在学会的闭幕式上时讲话：「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日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你们已经足够很强大了。还有必要比现在更强大吗？今后请多和善些」。在那个学会上，中国的男性是如何去倾听这位日本智慧丰富男性长辈的讲话的呢？我们不得而知，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方面的声音非常相似。从椅子的外面「在干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去道歉？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虽然战争失败，输给了美国，但没输给中国。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成功，你们不也富强起来了吗？」。从椅子背面「不想被人看见的拼命用盔甲去隐藏弱点，任何事情都不想接受。当然更不想接受现实。不希望自己的脆弱被人发现，被人利用，被人歧视。自己真正的弱点不想让

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即使是日本制造的产品，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食品如果不从中国进口我们甚至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一定知道这些事实，所以才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再过 100 年，日本可能会成为中国殖民地，好可怕」。

这把椅子正面声音变成了这样：「你们在经济上是战胜不了日本的，所以你们流泪。你们在用如此肮脏的手段来讽刺我们日本。现在的经济才是所谓的战场呢！你们在用我们的技术，使用着我们的所有的技术使你们的经济发展起来。正因为你们害怕，所以你们在说谎！」「别不知好歹，一边在说自己是受害者，一边在接连不断地制造航空母舰。好像是在失火现场用谎言来应付似的。南海不是要占为己有吗？南沙群岛不也是吗？你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制造核武器」。

日中双方都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容易受伤的姿态。我自己对中国和日本的构造持有不同的见解，男性女性的构造上也有这种实感。这时想起研讨会上的故事剧场里「和和蔼可亲的祖父的回忆」，「男人」为了保护子孙、妻子、父母，为了保护自己宝贵的东西，击败、驳倒对手、抓住他的致命伤是最有效的手段。「南京大屠杀」用英文短语表示是「The Rape of Nanking」，为什么用这样的词汇来表示呢？它意味着战争中的强奸和「慰安妇」的问题。女性寻求男性的保护，渴求的越强烈，男人就越不能从这个强烈的剧本中摆脱出来。战争是男人去做的，可在背后教唆的是女人。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日本的椅子，「没必要变得那么强，不用那么保护我们，你们没必要勉强自己去努力。首先，对犯下的罪行让我们好好地去道歉，然后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去解决将来的问题」，我心里有一种冲动真想跑到他们跟前去诉说这些。

2007 年国际会议是在老年人的号召下举办的。在追悼会上自己的祖先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感到很遗憾，向受害者谢罪。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中看到日本男性流泪道歉的身影，就好像体验到了作为女人心灵上的安慰。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听到了好多被强奸被虐待的妇女和儿童的经历，多次体会到女性如此受到伤害。在 2009 年的研讨会上，除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日本学生以外，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带领这样的日本人小组，虽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感到又很遗憾又孤寂。在做完用雕塑中国人女性被强奸的练习之后，我们相互拥抱着哭了起来。越过日中之墙，感到同是女性才有的相连接的那一瞬间。

2000年在东京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跨越国界妇女的连接，审判由于日本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在这里也存在和有分类的男人」战斗的一些男人。军队的程序，利用性差别和种族差别等所有歧视权利，促使士兵暴力的高涨，非人化的行为。实际上这次研讨会只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举行是不成立的。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这次研讨会多由几位男性来参加。

6. 无助和行动

此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是「无助感」，特别是日本方面表达出对政府和右翼的无力感，对此中国方面也感到很焦虑。「想做些什么，但能做的事情又很少，感到沮丧而流泪」；「如果行就好，但是还是觉得不行」；「我真想作为日本人的代表向中国道歉，但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作为日本人真是很懊恼。提起日本政府，真是感到无能为力。怎么努力都感到无力」等。面对日本方面的失落感，中国方面：「即使你们来道歉，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你们不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如果想向我们道歉，首先改变自己的国家吧」；「日本真是改变不了吗？想一想在这里的长辈们叙说的残酷现实吧。中国有句古老谚语就是「父之罪，子去偿」，你们祖先所犯下的罪行，你们必须得接受。这是你们的命运。你们的祖先在中国做了什么？做了多么残酷的事情？作为人永远不能做的那么残酷的事，你们是否知道这个事实？」。这样的词语就好像在发泄着什么。

之后，日本方面「在日本国内右翼舆论虽然很明显，很多都还是教育者或是研究员。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因为讨厌中国而中途放弃的。我们之间如果有可以妥协的地方就请妥协吧，恳求你们援助我们」流露出这样的话语。「请相信中国方面，有的也想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要逃避历史。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放弃道歉这个形式感到很憋气，在此，祈望日中双方一定要放下这个重担，千万不要放弃」的鼓励的言辞。我们的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目前双方需要什么」，在沃尔卡斯先生带领下逐渐地「同步走向同一个地方」。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下，大家互相握手热烈的拥抱，参加者们沉浸在短暂的亲密感和衔接的纽带中，迎来了研讨会的闭幕。

此次的研讨会使得我们在无力中感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看到了参加者们决心从自我的行动开始。虽然是 HWH 的最后的阶段「社会服务和向创造活动的转换」，也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7. 同一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同一性这个词。在 HWH 中包含着关于同一性的活动，在别人面前说一说「我是○○○，哪国人」，试着看看你感觉到了什么？如果让日本人中国人尝试说一下出生地或者出身国，可能会有人感到很尴尬。在接受了对方的出身国之后，如果再进一步询问对方的出身地的话，最终会感觉到什么呢？所谓的同一性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是什么？作为引言，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沃尔卡斯先生的例子：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犹太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何印象？我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张白纸。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美国人。这让我感觉更为复杂。我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让人感到很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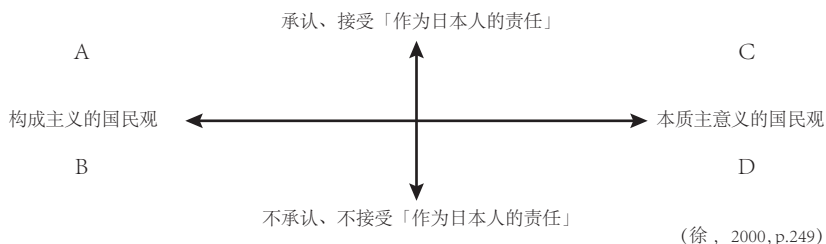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法国人，出生在法国，有法国人的公民权。我感觉到美国电视节目像洪水一样泛滥，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国人」。

对于在美国生活有不同背景的人来说，「我是○○人」是比较熟悉的句子，他们可以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同一性而毫无抵抗地去接受。相反在现实中即使包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仿佛就没有那种意识，比如说对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不很习惯「我是日本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听到时首先是一种困惑的感觉。对「日本人的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恐怕右翼之间他们行得通。

在此，我想介绍自己的感受。在 2007 年初次到南京时，我曾经犹豫过把我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放在什么位置为好。日本文化中我喜欢的部分很多，同时对日本政府和日本也持有反抗和批评的态度，我就好像一直在保持一定距离而眺望着。如果我接受不了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同一性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诚恳地对中国人说「很抱歉」。但我的变化是当我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在一堆裸体女人旁边的容光焕发日本年轻士兵的照片时，这如果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或曾祖父，他们回到被野火烧尽的日本，他们在战后重建家园，然后我们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当我意识到这些时，那块土壤生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长大成人。我毫无疑问地在那一瞬间接受了作为日本人的这个事实，那时作为加害者的羞耻、悲痛、愤怒就好像在胸部里开通了一条路，让我觉得作为日本人一定要向中国人谢罪。

通过参加 2009 年的研讨会，第一次有了日本人同一性的参加者，他们作为日本人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过去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不只是过去，还有痛苦在战争伤痕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于那样的痛苦，我们要勇敢面对和正视」，我觉得「肩负责任」并不可怕，「要踏实地好好地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

这里围绕着徐京植（2000）「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论争进行整理和介绍一下。徐先生说：把「靖国派」等有右派国民观的人放到右侧，（这是「本质主义的国民观」），把国家国民论（非）的国民观放到左侧，（这是「构成主义的国民观」）设定一个横向轴。只有这个横向轴是整理不了杂乱的责任论的，在此「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承认接受，还是否认或者拒绝放到竖轴上（见附图）。



D 是代表「靖国派」的右派，是极右派势力。作为「自由主义史观」的小组和小林义则的群体位置，C 一方面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为限定承认道歉和补偿的同时有必要肯定民族主义的「国际标准·民族主义」，加藤典洋等能赋予这个位置。B 是从构成主义的立场开始的国民国家批判论，把国家相对化地被陷入在（到）没有责任论，以上野千鹤子他们为代表。而作为我们的目标是 A。

沃尔卡斯（2009）把 HWH 的目标之一指定为「拆卸同一性文化·同一性国家」。因为不少日本人，「没认识到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在拆卸之前，首先要把它构成起来。以国家单位变动国际政治，除了亡命者和难民，任何人只要属于自己国家的话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并且，没能经过「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的认识和拆卸的训练，如果无意识地停留下来的话，有任何诱因而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惊奇的。此次研讨会通过两把椅子对同一性进行认识，得以每个人都倾听着，发生反复解体和拆卸。

10月有机会听了精神分析家埃尔曼先生的「记忆起童年时战争德国人」的讲演，他说：「在日本能用德语，即是歌德，康德，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用过的语言来做讲演。对我来说感到特别的光荣。德语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罪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使用的语言，一定给听者某些窘困的感觉」。以这样的开场白来开始自己的讲演，日本人当中也会有吗？埃尔曼先生是出生在波兰的德国人，作为德国人受过德军的迫害。他用「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国民」，而是一个「会说德语的人」来总括和规定自己的同一性，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实感兴趣。

8. 结束语

本稿不是十分充分的，回顾此次研讨会，面向今后会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课题。至今还没能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要定义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此次研讨会的标题是，「记忆南京2011年由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探索世代之间的连锁和修复和解的可能性」。这仅仅是暂定的课题标题。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和平教育或者心理疗法？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超越历史，教育，心理，艺术等范畴的工作，还没有正式最后命名。

2009年，提出了翻译和谁来做带领人的这个问题。有关翻译适宜地使用了同声翻译，这样改善了好多。有关带领人的这个工作，让沃尔卡斯先生担任的同时又得到剧团团员的合作。为了尽可能让中日协调进行，我们又做了好多工作。以第三者立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具有很深的意义，为了以这个方式的活动得到今后的继续扩大，培养新的带领人是不可缺少的。

2012年4月有关人员将汇集于京都，我们将一起整理课题。为了能找到今后的方向性，我们将探讨再次召开国际讨论会。正如此研讨会在同心协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我们同样也期盼着今后的研究与和平活动是超越国境的，在相互衔接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文献：

- 徐京植(2000) 『作为日本人的责任』再次考虑—被彻底考虑的意图的懈怠
『加害的精神结构和战争责任』绿风出版

- 村本邦子 (2004) 「战争与创伤—传述同历史的形成」『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4 号』
- 村本邦子 (2008) 「通过家庭传述—战争与心理创伤」『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8 号』
- 村本邦子 (2009) 「用身心来考虑历史”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通过用历史愈合伤口) —」『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9 号』
- 村本邦子 (2010) 「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 沃尔卡斯 A. (2009) 从我的会话中
- 沃尔卡斯 A. (2010) 「南京的悲剧共同面对南京历史的中日文化」『根据战争的加害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

为南京「和解」—架起历史深渊之桥（翻译）

小田博志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

衷心地感谢村本邦子女士给我这个参加于 2011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的研讨会的机会。也向胸怀宽广地来迎接我们日本一行的张连红教授和为我们提供这个相遇机会的沃尔卡斯先生表示由衷的致谢。在此把我个人参加此研讨会的经由，对研讨会的感想和以及 4 天的南京之行的所感总结出来，愿本文能为促进日中和平做些贡献，为此实感幸运。

绕道而行的中国之旅

平山顶事件油然浮现于脑海中

也许此行能让我踏上曾经肩负着日中战争的这块土地，成为正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野蛮行为的开端（同许多日本人一样）。

在 2009 年的第一学期，我请了半年的研究假，去了柏林并居住在那里。我的主要研究题目是有关德国历史战争和解和民众的阶层运动。具体是把活动的中心设置在柏林的基督教系的一个团体组织「和平行动·补偿的象征·为和平而奉献（Aktion S ü 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作为调查的对象。这个团体是 1958 年在罗达·库拉西这个人的号召下设立的。当时因没能禁止纳粹党的非法行为，所以德国国民一直在这种罪过的意识里承受着煎熬，他们便为遭到被害的人而建起「补偿的象征」。这个团体是以奉献活动为目的。现今每年约 180 人为长期志愿者，他们被派遣到 10 多个国家，并且每年夏天在各地都举办着夏令营活动。

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在捷克得勒记强制收容所遗址举行的夏令营。其中共同野外调查是在捷克得勒记近郊的里德此这个村庄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村庄是战争的遗迹。捷克从 1939 年起被德国纳粹党所占领，当时的那个副总督海东力西于 1942 年在布拉格被暗杀，他因与执行犯有关被判成冤罪在里德此村被杀害，此事件是在希特勒的指使下执行的。居民大部分（约 500 个）都被虐杀，一些建筑物也都摧毁。整个村落也全消失。如今此处既是痛诉德国纳粹党野蛮行为的地

方也是追悼居民牺牲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建起了纪念馆。当时和夏令营的成员一同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在中国也有同样真实的事件发生过」，那个地方就是平顶山。

平顶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在2010年3月去过那里。从东北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向东大约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抚顺。那里因拥有巨大的露天煤矿而闻名。因此日本关东军极力想占领这块土地。于1931年9月18在沈阳近郊发动了柳条湖事件。第二年，又建立了所谓的「满州国」这个傀儡国家。抚顺煤矿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煤炭供给源。柳条湖事件的第二年，当地敌视关东军的势力袭击了抚顺煤矿。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发生此事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在寻找犯人的过程中，关东军怀疑这与离煤矿最近的村落平山顶的抵抗势力有关。1932年9月16日关东军把平山顶的居民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为了警戒关东军实行大屠杀。更残忍的是把还活着的人用枪和剑胡乱刺杀。据说第二天，把堆积成山的尸体倒上重油烧掉。用炸药摧毁虐杀现场的悬崖，然后把尸体埋起来。据说牺牲总数为3000个人（平山顶山事件诉讼辩护群团2008）。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几个原住民，战后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判决虽然承认了集团大屠杀的这个事实却拒绝所索赔。平顶山大屠杀事件可以称为是「亚洲的里德此」。因比里德此居民虐杀事件早发生了10年，所以倒不如说里德此是「欧洲的平顶山」比较恰当。

平顶山事件牺牲者的遗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掘。1972年建起了「平山顶殉难同胞遗骨馆」，把当时发掘出来的遗骨，原封不动地展示在那里。现在作为历史写照平顶山事件的博物馆附设「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在我访问那里时，还设置了日语翻译。

本文作为南京事件的研究报告，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平顶山事件，这是因在南京事件之前，日本已有侵略中国的历史。为了更好地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写的。因平顶山事件是在日中战争开始5年前发生的。战后约1000个关东兵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自身也认识到所犯的罪行。在东北哈尔滨罪恶滔天的细菌，毒瓦斯兵器的开发，人体实验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遗迹，至今现存，那里现今作为博物馆也可供大家参观。

就这样经由欧洲绕道而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惨遭日本军加害的遗迹。我对于历史没有任何认识，就直接踏上中国土地的很多日本年轻学生，实感羞辱。

但是恐怕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也并不少。这也许是构造性的问题吧。或许日中两国相隔的墙壁太高或许记忆的长河太深。所以为此我想我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架起一座桥梁。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意味着这些，一定亲自去那里和跟当地人相互交流，我期望参加这次的南京研讨会。

在南京的 4 天

第一天上午，张教授同时进行了关于南京案件的讲习和故事剧场。那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听到了一个学生的所感：「对自己的祖母和关东兵有种非常矛盾的心里」据说战争时关东军给过这个学生祖母的糖果。但是祖母的父亲（这名学生的曾祖父）又被别的关东兵给残杀。对日本兵的并不是单一的仇恨感情。类似这样的所见所闻不去现场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的上午访问了幸存者夏淑琴。夏女士她 8 岁时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父母和祖父母以及 3 个的兄弟都被日本兵给杀害，母亲和姐姐被日本兵强奸。她自己又被枪和剑等刺得遍体鳞伤，最后和年幼的妹妹一起在家忍受了 14 天之后被救援。夏女士痛诉着：“哭啊哭啊直到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为止。”“「伤口很大，至今有时还感觉到疼痛。」”对此有个日本著述家出版了一本叫「谎言」的书。夏女士对此气愤至极，向南京以及东京法院提出名誉损坏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对夏女士的诉讼给予承认，并因被告的上诉被最高法院拒绝，所以夏女士得以胜诉。来南京之前，有关夏女士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事情我真是一无所知，感到无比羞愧。她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众」分开对待，她说：“你们是无辜的。”（对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人）那时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夏女士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呢？也许在通过在日本诉讼判决时，感受到很多日本的声援者的温暖了吧？也许这才是修复彼此关系的一把好钥匙，我想去详细地向她询问一下。

能够在这此开研讨会，协助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他在，大家才放下心，开诚布公地把话说出来。正如和平学者约翰·伽如道古先生所言 彼此和解一定需要「中介人」。沃尔卡斯先生正是最好的人选。

第三天，感觉看到了故事剧场的真正价值。有许多来参加的日本人，都变成了被控诉战争的对象，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其他的日本学生想起自己慈祥的祖父，作为志愿军去参加战争，不由得和祖父之间产生一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这种感情气氛比故事剧场增大了许多，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把真实的记录告诉给

后人，感到一种成就感，此时才认识到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才能真正促进和解才是。沃尔卡斯先生用「相互人性化」的来表达。就是面对面，把所有能诉说出来的都倾诉出来，这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研讨会也体现了这些，事剧场也能促进人性化，能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

最后一天，大家在扬子江沿岸的燕子矶公园的「遇难同胞纪念石碑」前举行了追悼仪式。这里是被日军追逼的中国人想远渡对岸，却牺牲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旅游景点，有很多中国人来此旅游。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合成一组向纪念碑献花时，有些入园人站在那里向我们寻问在做着什么呢？其中有个在学习日语，想去日本九州留学的青年。因为我们的献花仪式使他们排成了相当长的队。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

到了研讨会尾声时，让每个人都边带着回忆各自表达一下感想。我说：“我们是座桥梁”，应多互相理解，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换位思考。这4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做了好多事。就好像已超越历史的深渊，架起了中日往来的一座桥梁一样。

所虑之事 1：「东亚」的独特性？

这个研讨会，是用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作为「把日中战后世代作为研究对象，开发新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召开的。其中目标之一是对沃尔卡斯先生「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的理念，也许是考虑到东亚独特的条件，去修正、应用的。

所谓「东亚型」是什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简单的事情。「欧美崇尚个人主义，东亚崇尚集体主义」这种类型论，其实毫无根据的，很死板的化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的。尝试所谓「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的背后个人主义更现代的、先进的、然而集体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特征，后者像是为前者进步而服务，暗藏着一张进步图。把这张图放在「近代西方」社会进步的最前端，「西方」好似是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幻想。应该有选择地去接受。「西方人」也有集体主义的行动，「东洋人」也会出现个人行动主义行动。这个差异不是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为了在情况里起到连贯作用的复杂的表达方式而已。

其他也有「这样的东亚特征在欧洲又会怎样」？「这样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何不同」？各种框架已经普遍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令人感到困惑的

是，不只是对一般人而言，比如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这些领域里也蔓延着像刻板印象一样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在没有反思的前提下，在当今的现实实行中行不通，恐怕也会有脱离现实的可能。

原本「东亚」是否有自己的独立单位？与其他有所不同，就连是否具有独特性在此不很明确。「亚洲」就是原本「欧洲」所说的不是很方便的领域划分地区。

研讨会期间，一名中国参加者说「日本不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具有着“耻辱的文化”所以也不谢罪」。所说的「日本耻辱文化」的这个观点也是典型的千篇一律刻板印象。那个所言人，恐怕是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和刀》的中文译版吧。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没有来过日本，只是战争时在美国国内强制收容所里，他采访过日裔美国人，他通过日译英的一些书籍，把「日本文化」等用固定的方式记述下来。那些最终不过是架空的建筑物。实际上对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侧面记述也有很多不贴切的内容。当今的文化人类学家，指出那些记述与日本文化有所不同，「日本文化」实质上是否存在，持有批判的意见。

总之，问题是「东亚实质上是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日本兵的残酷暴行的背景下，是否与日本文化有关」？「对此中国文化又是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并不是要论述这些「要超越那些刻板印象，作为‘人’我们如何再重新相逢」，或者「为此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

但是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具体分析来考虑一下已构成「东亚」历史上的，地政学的要素的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和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地区至今仍然残留着冷战结构。社会不断地分割着，就是朝鲜半岛分割成北朝鲜和韩国的这个事实。

现实东亚的形成不仅是在地理上的构成，除此以外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特别是美国于 1951 年急与缔结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那时把日本战后的赔偿责任在政治上弄得很暧昧。在东西冷战中日本把自己套进自营阵。至今美国仍因中国和北朝鲜「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等借口而相持不下。在日本和韩国不断地设置军事基地。可以说这种分割已成为东亚战后和解的一个障碍。还要注意的是修复友好关系和解的当事人限于日中之间的话，会潜在还包括美国的宏观结构。

冷战构造不是绝对的墙壁。在欧洲，尽管有同样冷战后政治结构上的困难，西德（当时）的年轻人往来于波兰，譬如作为史迹整備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在那里建设了住宿、学习、交流设施「奥斯威辛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一个人的

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就是这一个个微小的活动因子才会形成一个无穷的力量。

所虑之事 2：同一性？

「同一性」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当时只设定用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这个词，分成 4 人一组进行讨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还有人说「我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人，是 20 万年前出生在非的人”时，好多人都感到很惊奇。为何同一性这种思想意识必须以一个国家的国民为单位呢？原本「同一性」就像「食品的有限期」（上野 2005）一样过去的概念，必须一定有使用这种概念的必然性吗？

我直率地阐明：我必须接受「构筑主义」的这种看法（上野 2001）。我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个所谓的范畴，然后连接起来被一种性质所固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构筑主义我认为应当把它看作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地形成的一种概念。

这个地球上原本不存在国界。那是人随便划出来的。然后再把国境线内的人圈起来，最后统一下内部的多样性，用来强调与外界的差异。因此国家这个结构组织也就随之成立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或许是「日本人」，或许是「中国人」），不过就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制定出来的。

我认为从构筑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了玩赏思考本身，而是为和平的需要而制定的。以国家这个单位把人分成类，统合起来的这种想法也就是民族主义。通过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被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就好像相信一个非常明了的哲理一样深信而不疑。这在民族主义历史起到了暴力性的作用。相当于成为各国民众的总战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其次就是更惨不忍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心理创伤和罪恶的单位来维护国民，如此会可能把民族主义在叫做研讨会这个微观的场面上会再生产。总而言之千万别陷入「民族主义」的这个圈套里？我感觉到好像这次研讨会是围绕着「（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和解」这个故事构成办的。但是，用民族主义来驱使人们发动战争从根底上克服是，以国民这个单位去分类，可以从思考或者「同一性」的这个框架本身中解脱出来吗？把很明了的民主主义「同一性」作为前提，为了从此解脱出来，我们做的是必要的

永久的和平工作。

为了从「同一性」和刻板印象解脱出来，需要考虑一下如何被那些形式所镶嵌上的？

此次研讨会，每个参加者自身谈论「同一性」这个问题，然后又把日中的这两把椅子相互而立来互谈，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刻板印象的这个框架。可是如果别的研讨会上，是没有机会让大家进一步去反思去挖掘刻板印象。为此我反而觉到最后「日本人」「中国人」这个两元式的区别。正如上文那个学生所诉的：“对日本兵和祖母那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一样”。人是生活在现实中，两元化这个问题是难以阐述清楚的。解决两元化这个问题，汲取微小的力量去做多元化的工作，又会如何呢？

这是个「继承心理创伤的世代」范围的问题。（这种心理创伤被继承到何时呢？）原本在考虑「和解」的这个问题上，早已想定基本上的问题「谁与谁的和解」。并且「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这些都作为相关的参加条件。如果即是「日本人」也是「加害者」，那这些年轻人一定还要继承着祖辈和父辈们的「罪过」吗？提起中国人，有多少人成为「中国人」「受害者」的子孙呢？在民族主义方面上，国民有时被象征成「家族」这样的趋向。如果用「我们是加害者的子孙，他们/她们是受害者的子孙」的观点看问题，是否能放入民族主义这个范围内呢？

某个民族完全都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应固定为某个特定的民族。一定要抓住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吗？曾经是受害者的民族时也有可能为另外的一个时代的加害者。也需要人类从历史的视点抵御这些问题。张教授第一天所陈述的就是要「从人类的视点来扑捉南京事件」我也持有同样观点。并且在国际讨论会上「南京事件的记忆」（1999年，华盛顿大学）的加拿大布鲁克博士提出，「把过去人种·民族间的对立构造的虐杀历史记录下来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日中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也应当做人类的问题来考虑」我也有同样的想法（笠原 2002：293）。

我自身「作为一个日本人」想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因此不想从「日本人」的这个单纯划分区域里逃脱出来。我是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日本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同时我也知道肩负着一些政治责任。但是我的存在还原不了「日本人」里，这也是确切的事实。

在研讨会上经常对「感情」作为一个焦点。从构筑主义的立场看，感情也是

在社会上·政治上塑造而成。在这里回忆一下为何具有这种感情，内省工作是必须的。需要具有形成反思感情的过程的这些才智。曾拥有犹太系的父母，在纳粹党政权下从德国向巴勒斯坦逃跑的社会心理学家坦波路与纳粹党党员的子孙和大屠杀生存者的子孙一起共同工作。在他们当中参加者，据说为了尝试他们的命名，并非一定要使用「和解 reconciliatoin」这个词。用「回顾和相信 To Reflect and Trust」这个名称（Bar-On 2008: 198-207）。在这个组织里，避开根据（「德国人」「犹太人」）这些「集体同一性」的讨论，相互叙说个人的故事，就是在接受对方。在此再反思一下要从集体同一性这个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中解脱出来，参加者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属性，而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所虑之事 3：伴随着面孔和姓名的记忆

亲临那块土地才体会到远远超过书面上记载的那些内容要生动得多。我由南京返回日本后，身边的笠原十九衙门先生所编写的著作为主阅览了一番。于是比以前更能顺畅地更具有实感地理解了好几个方面。

其中有本书是『南京事件和日本人』（笠原 2002）所叙述的是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这个地方的论述很重要。就是让我把遇到幸存者·夏淑琴女士，谈起南京事件时，夏女士具体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引用一下笠原先生的文章。

「至今日本人回顾南京大屠杀时是缺乏记忆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p. 249）

「我们所谓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和面孔，相反就是我们不想记忆起牺牲者曾受到的悲伤和痛苦。」（p. 250）

「在日本把南京大屠杀数量问题过少地论述，重要的是，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每个牺牲者都在南京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有一天因日军的侵略和野蛮行为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南京中国人的亲戚被杀害，女性被强奸，一想到每个人承受着的痛苦，让我们必须想起牺牲者每个人的面孔和名字。」（p. 250）

我感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出。不仅是南京事件，历史上任何各大暴力事件，回顾历史时常常是用抽象的概念和数字来解释的例子很多。「大屠杀 600 万人犹太人成为了牺牲者」这个说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类似这种暴力，如果只是这些，这场屠杀只不过是「他人之事」。相反「如果自己遭遇上」，「如果自己

的家人成为了牺牲者」这时会具体地深思考虑，牺牲者的痛苦会有同样感受。

在参加 2011 年 10 月末在广岛召开的日本和平学会的研究集会时，在酒店餐厅看到「中国新闻」（2011 年 10 月 29 日 15 页）有这样的报道。在中国随军的某原日本兵，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战争加害体验（「面对自我历史 滨田的鹿田先生自费出版」）。作者在这本书写道，在中国袭击村庄时，「父亲为了庇护患病女儿，可又在她父亲眼前把那个孩子给杀害，把俘虏的人当做人体实验等毫无隐藏地记录下来」。以前举行这样讲演时，本人要叙述曾犯下的残酷暴行，对自己的儿女婚姻是否有影响，他们也有过很痛苦的时期。可是，那时「想起同样袒护自己女儿的中国人的父亲，感到很愕然失措」据说从那以后，发誓证言活动作为他的毕生事业。

这个人正是「自己和那个中国的父亲和立场调换」。这个小故事，意味着战争和军队组织如何把他人当做「敌人」非人化，然后通过士兵在再那里做些非人化行为。并且再把人从归于人性化可需要多大的力量啊！

总之，是否能感觉到「他人的疼痛」是抑制暴力和维护和平的根本上的重要条件。但是根据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划分，人际关系被所分割，又会筑起「痛觉的墙壁」。于是墙壁的外侧的人感觉不到疼痛而失去知觉。

要摧毁这面墙，正如笠原先生所言，用伴随着牺牲者具体的面孔和姓名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应该用「记忆的人性化」去做。在南京的研讨会上听到夏女士的谈话，我更确信了应该这样做。然后再加入「感情移入 empathy」的工作里。试着想像「如果夏女士是自己的祖母」。我想也能需要。体会到上述的原日本兵所经历的同样过程。这个经过，阅读一下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原日本兵的记录也有同样的感受。自己（日本兵）想像到在战场上杀害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同样的人的时候，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

本次研讨会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的地区，以前曾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宣教师米妮沃特琳（1886-1941）曾任那里的教员。记录着南京女性受到日军性暴力（沃特琳 1999）。沃特琳在书中写道：“南京所发生的，希望日本女性也应有所知作为女性是不能容忍的”。他期待着在日本国内也应该引起反响。这是通过男女社会性差别向他人的感情移入。把人性化做为一种记忆，为他人感情投入，也许会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吧。

所虑之事 4：跨越其他现场来领会

要克服历史的分割，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和解同和平工作。经验和智慧的积蓄是庞大的。在那里不学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同事」和「先辈」存在世界各地。在这个研讨会上主要是用了艺术和心理疗法的方法。欧洲的「行动·补偿的象征·和平奉献」，通过机能化的工作（建筑和对老龄人的关怀等）实现了和解。我在「擦窗户」和「用耳朵来倾听」（小田 2012）的论文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布拉格的事例是纳粹党支持者的孙子，访问犹太系的大屠杀幸存者年迈人的家庭时，就是用擦窗户这个具有实用性的工作发挥了巨大意义的。同上所述，去从事补偿的象征的志愿者们，在邻接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痕迹那里，建设起国际交流中心。这里作为学习、住宿的地方，现成为「和平的基础设施」被许多人可使用。像这样多种渠道上去和解。对于解决南京问题，尝试开拓日中关系，我们会有好多好多路径去思考。

希望：不仅都是心理创伤还要有和平的记忆

想着和平，不知不觉话题转换成了战争。我们的讨论往往会向如此倾向发展的。为了再不动战争，把战争悲惨性作为个焦点，留在记忆中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维持和平，没必要再向悲惨战争迂回，和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焦点，一定要铭记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但是，可以怀疑「和平的存在」。不可能像绘画中描写的那样完整无缺，那样的和平是不存在的。但是，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即使在最激烈战争中时也存在和平。就像黑暗中的阳光一样，应该从阳光中寻找焦点，汲取知识，然后变得更强大，这才是接近和平，光明的方法。

政治学者玛丽·卡如分析冷战后发生的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就是所谓的「新的战争」的『新战争论』。非常深远有趣地指出在「所有的「新的战争」里，可以发现由于排外主义对抗战争的地区和人民。譬如称呼自己为胡图族，在自己的地区大量虐杀里保护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人们，特别是在萨拉热窝和波士尼亚等图兹拉这样的城市，人们都是没有特定民族集体所属的，和一些置身于和平解决的索马里兰的长辈们，他们都是为了要彻底保护市民性的多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卡尔多—2003：14-15）。在凄惨的旧南斯拉夫，卢旺达，索马里等的武力纠纷进行中，也确实有不加入战争维护和平的人，但是他们是少数派。

可是我们如何做才与他们一样。为了给未来带来更大希望，从那里我们应该得到更多有的学习的。类似这样的记忆，都是为了促进和平的丰富资源。把历史中积极的侧面作为焦点，我希望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可汲取的宝贵经验。

在南京事件中，有「良心的日本人官兵」，也正是在现场遇到的约翰·玛吉美国宣教师们记录了这些（笠原 2005：338-344）。为此可以想起日本兵吧？他们最终还是少数派，这也是很例外的存在。如果有多数派，南京事件本身也会阻止不会发生。虽说有良心的日本人兵存在，其他的士兵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也免不了赎罪的。提起「良心性」，原本他们也支持过侵略中国。但是一般人被列入为人道主义犯罪的情形时，即使存在少数犹豫不定的人，这岂不是还具有一定的意义的吗？他们为何能做那样，也有必要去探讨一下吗？对于南京事件，把一些有良心的日本兵的存在说成是「和平的回顾」这也是过大的评价。不光是有心理创伤的回顾，而且类此侧面回顾，给我们——有极限的——给人性化也带来了希望。

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侵略和战争，如果追溯到约 2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同样在非洲诞生的数千个智人的（奥本海默 2007）。少数的祖先从非洲出来，分散到世界各地。那里的后裔们偶然分手，分别住在日本和中国，随着时代的延续，倭国和日本，接着又有隋·唐朝的差异变迁。中国作为先进地区，日本人不顾安危去那里留学。相反中国孙文和周恩来等来日本，学习一些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情况。

历史持续向前，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约一千名日本兵宽大以待，给予他们反思和赎罪的时间。那些日本兵 6 年后，回到日本，结成「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活动于他们加害行为的证言中，用直接加害的行为来反思自己，他们的活动是自发性的。这在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伴随着老龄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解散的同时，年轻的世代又结成了「继承抚顺的奇特迹会」。

战后在中国「居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回国后，组成了「ABC 企划委员会」市民团体，在日本启发了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和日军的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相马 1997）运动。以南京事件为题材作合唱曲，有个日本小学老师组织合唱团，一直在唱着这首歌。这个「紫金草合唱团」完成了在南京的公演，通过民间艺术的和平交流，确实开展扩大了友好的网络。

这样的和平种子栽种在每个角落，只要放开你的视野就会找到希望。所谓和

平，不是谁把这个万能的存在全部给予我们的。和平的种子刚刚发芽，或从小小的泉水中正流淌着，有一天一定会百泉汇海。

未来的庞大的和平是由无数个小小的和平组合而成，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一条条小小的泉水！

参考文献

上野千鶴子（編）

2001『所说的構築主義是什么』勁草書房

2005『脱离认同』勁草書房

布德林，米妮（岡田良之助、伊原陽子译）

1999『南京事件的日子米妮沃特琳的日记日記』大月書店

小田博志

2012（予定）「『擦窗户』和『倾听的耳朵』：行动・赔偿的象征・平和奉献和非正式的和解」石田勇治・福永美和子（編）『对于当代德国新的视角』（第4卷）勉誠出版

奥本海默，史蒂芬（仲村明子译）

2007『人类的足跡 10 万年全史』草思社

卡尔多，玛丽（山本武彦，渡边翻译）

2003『新戦争論』岩波書店

相馬一成

1997『放置の有毒瓦斯』草之根出版会

平頂山事件訴訟弁護団（編著）

2008『平頂山事件到底发生了何事—通过诉讼衔接的日中国民的友好纽带』

高文研

笠原十九司

2002『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書房

2005『南京民区的百天一外国人多看到的大屠杀』岩波書店

Bar-On, Dan

2008, The Others Within Us: Constructing Jewish-Israeli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研究战争史等各种问题（翻译）

金丸裕一
立命馆大学教授

1. 引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学研究者的视点和我个人的见解，对日中战争史的研究做了一下简单的整理和介绍。当然把要考察的每篇著作、论文的重点公布于众是再好不过的。但因笔者的能力和篇幅的关系，在此主要是把方法和框架的问题作为焦点，同时也想为日中战争史的论证提供一些素材。

我观察到在战后历史学中「大故事」的影响力正走向衰退而对一些「小故事」的阐明，已成为叙述/「叙事(narrative)」的主流。对此类论文的反驳文章也不多。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发展法则的共鸣，1980年后东欧、旧苏联的「壮大试验」的失败、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混乱、都因以上因素的急速低落而决定的。试着想像一下，把用手工订做好的相当合适的结构当作历史，与其说为了学述事业不如说是正往政治立场上迈步。这个转换契机作为历史学原有的使命，是重视返归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此现象是不应该受欢迎的。在日本国内的史料阅览条件的改善下，还有这个时期台湾和中国首次开始公布史料，对「实证史学」的正式复苏也许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对战争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不同的意义上看，是个很大的转换期。考虑到国民「对外感情」和「对历史的认识」的形成时，对社会有一定了解年龄的人之中，经历过大战的于192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在各界退出了第一线，无非就是1980年代的。如果换句话说对这个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讲故事的人」，不管在腥臭的政治外交世界里，研究的重点、教育的重点不论是唠家常，逐渐被不知战争的这个世代所代替。

不管思想意识上影响有无，以悲壮的经验做保证「不想再重现悲惨的事件」，默认在渐渐变弱背景下，战争史研究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面对什么样的陷阱？以下把我的想法，如实论述点一下。

2. 根据历史学家的落脚点的「科学性」

30年前，我立志研究历史学（1970年后期），历史是科学，人类是根据规律性「发展」做为世界观。历史学家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为了为人民服务」作为必要的命题，抱着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当然也明了对有明显性见解的批判。不过，那样的「噪音」是根据「反阶级的 / 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的长声嚎叫咒文的里喊出来的，当然可以无视。

前文所述现实的变化，也极为有撞击性。对于「人民解放军为何把枪口面向了人民」这个问题，在当时1988年在中国学习的我们来说，是共同感到的不信任感、绝望感。还有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大体上在中国作为既定路线固定下来，但是在富裕层扩大的同时有一种「大同社会」也会要走向解体的预感，研究历史学同行都持有此看法。

回顾8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界也是一个大转换期。建国后确立的「中国现代史 = 中国革命史 = 中国共产党史 = 毛泽东线路史」为基本构造，被迫重新评估由于文化大革命各方面失败的原因，很长时间被放弃的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中华民国史等都迎来了复兴。其他不谈，正式发动日中战争史研究的工作，也是这个时期所追求的。

日中两国在80年代，要粗略地总结一下，可以说成是原有的「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的「人类解放故事」的结束又是开始。不可以轻视中华世界的多极化，台湾的民主化和殖民地香港的繁荣等。不应单纯的叙述历史的重点，就是二元论的观点或「好人·坏人观点」，这些都失去了说服力，突然重新转向「实证」正如上文所论的。

因此在此经历中，曾经被「法则性」担保的历史学的「科学性」，由史料的「验证 / 反证可能性」被代替。可以说是把研究主题分成几个部分，这也是自然形成规律。虽然存在着各个研究员的差异，但这是从追求「普遍性」向「个别」志向的转换。至少可以说研究学者忽视或轻视实证是走向灭亡之路。

还要重复上述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应该欢迎的现象，同时不过在我们眼前又显示出新的难题。就是由于从很多事情发生中，记录的庞大的史料群中选择那个，去创造出一个历史形像会产生很大差异的。如果不怕误解，另言别论的话，好好地运用史料，不做任何窜改。然后作出自己正确的结论，在方法论上是可能的。特别是现代史第一次史料还是第二次史料的记录极为丰富多彩地保留着，这

个危险性是很大的。

然而只要履行「实证」这个手续，不要去怀疑历史学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史料选择时，因为已经是在取舍选择的前提下进行的。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可是最终还是不能超越「主观上的客观性」。

如果对 21 世纪初期有一定认识，在中国经济急剧发展的背景下，恢复政治大国的信誉，相反这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被失去的 20 年」这种闭塞感的蔓延，两国对具有同样历史「人类故事」倒不如分成每个「不同的故事」和「小故事」这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急着连接小结，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把「叙事」这个工作，我们历史学者，有时过于相信科学上的、客观上的一些弊病。用口述继承的方法最为记忆。被放在比记录更低下的位置上，连一些常识和方法都没有。讥讽性地论述在实证史学的发展过程，成为孕育新的「故事史学」的母体。但此「故事史学」，与其说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故事内容不如说，把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和愿望浓厚地反映出来的故事。

是否接受多元性的「故事史学」的泛滥，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别人的「故事」，这是为了作为今后的战争史研究的实态，而且是否能把原因作为历史去去对立解决。一定受影响的。

3. 历史和解是否可能

历史学是可以称为把「才智」和「理智」总调动起来的学问。特别是在外国史研究中，该地域的语言学习，文化途径上依存性的探求，以历史的结果去向现代好多问题去洞察，加之对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周边领域的起源的态度等。给历史学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来近代的历史学，逻辑的调整性作是把坚持重视立场为理由，根据这些繁琐的事情而发生，也是为了回避各种各样的混乱。

经过坚实磨练的历史学家，他们都是具有禁止性的慎重地去工作，更确信自己的「论证」是根据「真实」事实阐明出来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正向前文所述的那样，除了不伦不类的无学者以外，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即使没发表过，也不会发现论证上的错误，这是现代历史学的特征。最终自己的成果还是「真实」是「客观的叙述」，谁都可以各自主张自己观点。

发表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手段是，目前论文和著作被限定。不能通过舞蹈来叙述历史，也不能换成抒情散文诗去朗诵。所以历史学，是特别具有语言的学问。如果要是想写出与历史评价有密切关系的论证，譬如「真理」「公正」或者「正义」等这些概念。具有哲学性（论证）不也是经过再三被斟酌之后才开始使用的吗？遗憾的是我持有不同意见。历史研究者都是在竭尽全力地贯彻于「确证」的这个工作。可是把热情集中于对历史真实性的挖掘，包含价值观的术语无规律的使用，对此是不是可以容忍的？A先生说的「正义」和B先生说的「正义」，到底指同样现象和状态没有确认，这才是我们工作的一环，只顾读研究成果/接连不断地写……。

关于所提的历史「和解」这个重大课题，也许会有同样的现象指出。在实际的生活中，让我想起伤害过我的人。通过与他/她的对话然后接受了这个人，更加宽恕了他，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关于战后「和解」如果在现代史寻求实例。许多人会就想起德国和法国，或德国和犹太人（以色列）并且再往下问的话，「德国可以道歉，日本为何不能呢？」。

关于教科书的成立过程等，在这里没有详述的余力。只有一点可以说就是日本、中国和德国等西欧社会的「和解」是语言上意思的差异，加上关于「和解」构造过程的不同，在此提出我的愚见。

(1) 首先作为我们生活的真实感，如何联想起来「和解」，试着翻阅一下日中有代表性的词典。里面「和解」的解释有「①互相的意志变柔和，融洽，和好。②〔法〕互相争斗当事者互相让步，相互签订不再发动纠纷的契约。调解→审判上的和解。……」（『广辞苑』第5版，岩波书店，1998年，2862页）这个定义。中国「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双方～」(『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551页)和『广辞苑』②的解释相近。

在这里应该事先确认的是，在现代日语、汉语的「和解」的主语最终还是「当事人」，「双方」具有「常识」是共存的。这是在构造上，与当事人A和当事人B双方的主张相碰而发生纠纷的状况中，结果彼此互相让步，相争停止（调节）经过签订，这是民法上的和解结构的（『新法律学词典』第3版，有斐阁，1989年，1484页等）。这些法律应该考虑不也是在一定空间下根深蒂固地使用下来的吗？

(2) 其他就是东西冷战至今还没迎来终结 1985年5月8日，西德在总统魏茨泽克

记住战败 40 年，与犹太的和解，在对战争犯罪反省的演说中，与我们的一般的「常识」有相当大的距离感。本文会变得稍长一些，在（到）这里想引用一下。

「当今人口的大部分，那时也许还是个孩子，有的还未出生。这些人对没有自己动手的行为，不可能坦白自己的罪行。……然而祖先给他们留下了很难解决的遗产。不论罪过的有无，老幼与否，我们全体都要必须承担过去。全体互相开始归结过去，不得不背负过去的责任。……问题不是克服过去。是不可能的。把过去加以改变成没发生的事是所谓的捏造。对过去闭眼不问的人，结果到现在也是很盲目的。不把非人性化行为刻在内心深处的人，容易陷入那样的危机里，正因为如此，不深深刻在心灵深处里何谈和解。这是个一定要去理解的事情。……深深地刻在自己心灵深处是，体验历史上有过天帝的行为。这才是拯救信仰的源泉。

正是这个经验才产生希望、拯救的信仰、撕开又被合为一体的信仰，能孕育出和解的信仰。忘了有过神仙本领的人，他也会失去信仰的。……我们自身的内部，也是需要有个智慧和情感的纪念碑」（『荒地的 40 年魏茨泽克总统演说』岩波书店，1986 年，16～19 页）。

接着魏茨泽克大总统，在他的记忆中，就是「在演说中，考虑借用了不是我自己深某信仰某宗教。『如果需要忘记就会把肃清的问题拖长。拯救的秘密是所说的向心灵深处的刻印』这是古代犹太教的智慧。我们不能救济自己，也不能决定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用丰富的经验去面对。可仅有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必须做的事。那才是成恼地面对那个深渊（丰富的经验）为了这个事实和未来，那才是最重要的」（『夏德·冯·魏茨泽克记忆录』岩波书店，1998 年，232～233 页）。

虽然把自己面对历史的无力非力作为前提，他同时又尊重别人内在思维法的态度。不是所说的与超越者的中介理智和科学，确信对「和解」作为信仰体系的基础。顺便魏茨泽克用的「和解」是德语的 "Versöhnung"（与神的和解，让神免于免罪），非常鲜明地以神学的立场来解释这个词汇。

这个构造，不是象所说的日本和中国一样横向和解的这个单纯过程。和解的第一意义就是要先从超越者给予，然后当事者之间根据超越者宠爱的赏物作为走近「救济」，纵向和解用起点来表示很恰当的。称为有神职经验的人魏茨泽克他的本领发挥。虽说根据通过世俗化的进展宗教的色彩减少，犹太教世界和基督教

世界的人被印上的「超越」的这个存在，正是祈求共通的这个精神背景。实行这样直率坦诚地演说也可行的。

反过来考虑日中关系，发现不了宗教上，精神上类似这样的基石。如果借鉴一下日韩双方的和解，很多都是尝试根据基督教神职者·信徒经验。中日之间在这里没有「一同畅谈的故事」。把心灵的「刻印」作为认识历史共有的道路，和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相比较，困难是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在日本、中国、韩国的「共通教科书」作成等工作中，努力把才智和理智作为对话的线路，这样不会堵塞会勇往直前的。可以高度评价这个方法。不过，「智慧和感情的纪念碑」的重点是把内在的感性和感情的相互沟通总是可以修建的。

4. 总结

原本语言化是很难的内容，具有没有列举无聊的文章。不同的见解因为在本文中事先出现，最后想简单地总结一下我的论述。

第一，日中之间想象的「和解」，也就是法律上的 / 那个理智性的。所以，思考的重点容易陷入所说的「善与恶」、「被害和加害」二元论的思考，这个激化对立的矢量状态。

第二，是否赞成重视理性的历史学研究，如果换个别的文献 / 把实证的着眼标准为「叙事」的限度。历史学家是否自知，对于今后的「对话」去向决定起到一定原因。当然，最后理解确证工作必须是有推进性的。但是作为那个主体不是我们自己用全智全能，严肃的事实，更可以说有限者每个人是否觉悟到「裁判」别人的可怕性？即使是「客观上」的「真实的历史」、也不能逃脱出主观上的客观性的这个阶段。想带着自戒再一次论述一下。

第三，叙说历史问题时，我们历史学研究者应该有认知异同存在的宽恕性，今后应彻底地需要摸索那些。历史学具有伟大的能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借鉴」的格言，极有说服力。可是，作为历史学者应从荣誉和理性信仰中面对，有些偏离「和解」这个展开过程。对在此刻视为形而上学 / 伦理学或者神学上的「精神」作为故事存在的出发点，需要谦虚地认可。就得抠心自问「调动历史解释的跳跃需要有想像力和同感力，在哪个阶段能允许呢？」。

如果再过 30 年，我也许从这个时代消失。然后作为一个很小被造物，人们为何去研究历史，教育历史呢？利用这机会应熟虑一下这个问题。

【附记】本文是于 2011 年 7 月 9 日的报告整理。内容是「以围绕南京事件研究史许多问题 --- 以历史学的言论为中心」。为了批判把「南京」为特定主题等，以及应该检讨涉及多方面的论点等。在这里做了些大幅度的修改。

从一人称中走向「战争之体验」～以体验心理学为基准， 构筑历史和平教育～（翻译）

村川 治彦

关西大学副教授

继承未体验的战争之体验

「过去闭眼的人结果到现在也会盲目。不铭记非人类行为的人，必然也无抵抗能力抗拒感染源所带来的危机吧」。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 40 周年仪式上，德国大统领魏茨泽克演说的著名演讲之一小节。即使已过了 25 年，但魏茨泽克的这翻话，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据有很大的意义。

在历史社会学家福间良明 (2009) 写的「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中，曾说到这样的内容。战前年代与战后年代间存在着战争体验的葛藤。并且此葛藤造成了战争体验的绝灭。「战后会把战争体验作为一种『教养』。对未直接体验过战争的青年人来说具有象征性的暴力。因此指摘出所谓战争体验教养失去了青年年代的支持」。正如福间所说在战后日本社会中战争体验并非对『反战』『和平』据有调和性」。对于直接体验过战争年代的人来说战争是无法用言语所能简单陈述的。因此有时会成为『反战』的政治主义所批判的根据。与战后年代的人发生了继承战争体验中的年代间激烈的摩擦。那样的批判与摩擦表达出继承体验的复杂的要素。但福间给于此复杂的要求肯定的看法。「正因绝灭及齟齬的局面，才使几个可能性浮现出来」并陈述了以下内容。

战争体验重叠了风化，但那并非是示意代代相传及继承的不可能性，而是正视绝灭战后史时，是否会成为缩小记忆继承的契机呢。未来是从正视有可能发生了的过去的失败中，第一次开拓枯竭。(P262)

南京事件已过了 7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到现在也经过了 65 年以上。怎样才能把在自己出生前发生的战争体验反映到自身的生活方式里。战争体验的继

承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的，又或者是作为「日本人」谢罪此意又在于哪里？为找出此答案如福间所说正视「绝灭之战后史」「风化及绝灭所重叠的战争体验」与这些怎样面对，让我不得不重新探寻。从此对于在 21 世纪的我们每个人，应找出怎样继承战争之体验。那样才不会盲目，并且这又何尝不是让我们拥有抵抗力的课题呢。

一人称的陈述 1：「脱历史之身体」

1963 年出生的我，想要正式面对自身的历史问题是因在美国研究生院听讲的「社会之身体」为题目的课程。Somatics（是最先研究从第一人称的观点探究身体 / 心理应有的状态的研究者），身体心理·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其中一位 Don Hanlon Johnson (1992) 讲授的课程中，说到 Susan Griffin (1992) 「A Chorus of Stones」每次读后经常会写散文进行发表。刚开始时我看到同年代的德国人，犹太人，各自在讲述着背负的沉重历史时，我突然觉察到自身没有像他们一样切实的认识过历史问题。

到那时为止我自身对于在卢沟桥、南京、真珠湾、广岛、长崎等地所发生的事件，作为知识理解了，但是从未曾认为和自身有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比起 1941 年 12 月 8 日或 1945 年 8 月 6 日的记忆，大化改新及镰仓幕府成立的年号的记忆会更犹新。

谈到过去的战争场面，就会浮现出大河电视剧里面出来的关原战争及戊辰战争。去过原子弹资料馆，也看过真珠湾的影片和南京的相片，但是看过那些也并非影响我的人生。祖父母及父母的年代所经历的战争与在自身及日本社会的暴力性及现在此时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战争，都无法联系在一起。

教育及医疗等社会体系是通过身体训练把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刻印成结构及特定的规范的。在 Johnson 的课程中学到福柯发现的「社会之身体」的观点时，第一次觉察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自我未能联系到一起的这件事。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日本社会中成长的我的「社会之身体」的事实。因此我把脱离过去只生存在现在的自己的社会之身体模仿（西田几太郎）叫成「脱离历史之身体」。

与他们无法产生对痛苦的共鸣及未有对复杂社会赋有想像力。只是单单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为知识储蓄。那只能成为加深身体的脱历史性。例如在教科书里增加关于战争时的记述，但培育时就是培育成无法实际感受历史的「脱历史之

身体」的话，再如何理性分析也是不充分的。日本人所作的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蘑菇云下的被炸者或在东京大空袭击中到处乱窜的人们。边被所谓这战争庞大的历史波浪所摇晃着，但即使直接有听取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的心声，对于我这样的「脱历史之身体」是无能力对那样的心声产生共鸣的。

为了从「脱历史之身体」中摆脱出来并且把自己成长过来的过去成为自己的东西要实际接受。与近邻们更深一步交往的话，要直接面对自身的感情，接受他人及自身的感情并且要把身体培养成「历史之身体」。察觉到自身的复杂历史，(和自己的暴力性联系着)。能把这历史与现实所能联系的「社会之身体」才能称为是历史教育。才能称为是记忆历史的基础。我那样认为着，所以1996年在旧金山主催了讲演「亚洲世界工作探究日本第二次大战争中在亚洲所作的行为，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村川2001b)

体验之心理学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的 Eugene Taylor (2000) 是把心理学之历史分为了3类。experimental (实验)，clinical (临床)，experiential (体验)。把各种互相联系后，从而明确了独自发展过来的结果。

体验之心理学 (Experiential Psychology) 是持有19世纪美国心理的·精神的传统，接受欧洲的深层心理学及实存主义哲学等的影响，发展成了1960年代以后人类性心理学、人体科学、超个人心理学、全人心理学医学综合医疗。在体验之心理学的领域，自笛卡儿以来未有人批判过心身二元论及根据主客二元论分的主观及客观的实际心理学研究，或把一切心理之现象要还原为个人内面的心理学主义等。把人类的心·身心·精神作为整体存在之理解。归属体验之心理学荣格派的心理疗法家 Arnold and Amy Mindell 夫妻举办的团体福利工作中有包含着世界工作。「世界工作」是「把个人内心与团体的生气合为一体的程序。把这新的观点导入到心理学中(中略)。歧视种族及性别问题，或关于民族纷争等深刻的对立。不是把哪个归化为善与恶，又或者分为抑压者和被压者来寻求和解，而是作为第三之观点设定「场所」，并要进行「场所的改进」(村川2001b)

不是从第三人者的立场对知识面的分析或解译，而是从一个人的立场探究之体验。在体验心理学的立场时更鼓励人们在反省自身体验之前，首先接受原有的自己。因每个人的体验不同，所以不根据各人体验基础衡量「善恶」，「正误」，

之价值判断。但「体验」不在此绝对化。为了找出他据有何意义，也有必要反省并分析体验之经过。故在此意中的体验之心理学领域里「体验」是，跟随着实际感受的「实际体验」把体验本身先原原本本的接收后，再与他人进行沟通。探究怎样互助地生存下去。体验与思考·反省会形成循环之过程。

站在体验心理学立场的民德夫妻，在世界工作中强调，个人与团体，善恶，加害者与被害者作为扬弃的契机，强调了「场所的生气」。根据这样的新的研究仔细地找出战争关联的复杂问题，才会有可能跨越上述的「脱历史之身体」生出「新的历史教育」之可能性。

一人称的陈述 2：伴随感情的现代历史

我为了探究「脱历史之身体」，选择「世界工作」的研究理由是 1994 年初次参加民德夫妻的世界工作时，发觉在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着「在集团中解放自身的生（性）之快感联系起来所产生的暴力性」。周围的人对待我个人时也许未曾给予相当暴力的评价。但在日本人这个团体中我所感受到的暴力是与战前日本军所作的残虐行为同样我是否也有可能作出同样的行为。对此向自己自身寻问过。那并非证明「战前日本兵」作的残虐行为是「日本人」的问题，也不是「他人」的问题。而是掩盖抑压及对他人实施暴力之行动的我，面对此行动时怎样去正视。才是问题之根本。

1996 年在美国作为亚洲战争问题为题目开催的亚洲世界工作。正好我也有参加在美的中国系美国人的市民运动。自己也进入了这个想要把日中战争在美国社会中得到认可的活动中。（村川 2001a）通过此类的活动中国系美国人及因 731 部队被当作为人体实验所遭害的美国退役军人，张纯如，另外有时在日本还会有机会与东中野修道氏们进行亲密地谈话。有时还被委托给在旧金山战争中牺牲的牺牲者祭奠中作为日本人去献花。通过这样的经验体会到 70 年前的战争不完全是过去的事情。对于现在生存下来的据多的亚洲人来说正是带有强烈地感情色彩的「现在」。参加 1996 年在旧金山发生的亚洲世界工作的几位在那以后也带着强烈地意志也参与到此问题中。其中有一位棚桥一晃是抱有一定要去南京之意向，经张纯如介绍 2000 年拜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氏。并在南京事件 70 周年的 2007 年时在南京开催了国际会议「Remembering Nanjing」（Tanahashi 2007）此会议的目的是「体会并了解受到各不同的战争体验及教育的日本人，中国人及其它国

家的人，对于日本与南京的悲剧敞开心扉，互相听取心声」。并且在参加的条件中，考虑历史解译的多样性，会议上统一不进行历史之解译，而是虚心接收自身未体验的事实。就是把自己固定的想法及意见先保留，接收各种见解。基本原则是首先要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鼓励参加者各自发表自身的见解及感情。是一个这样活用了体验之心理学的观点的一个活动。也是到现在为止未曾有过的活动。

另一方面，2007年同样参加了亚洲世界工作的戏剧治疗专家 Armand Volkas，来到日本，在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以日本战后世代的战争体验为主题，并结合运用他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History*，举办了研究会和一人一故事剧场。此时，在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开头，就有一位步入晚年的日本人激动的说，“在成为加害者之前，有许多日本人因为原子弹爆炸失去了生命。”这样强烈的情感表达，既是愤怒，又同时让人感到悲伤，让人真实的感受到残留在日本人心中未被表达出来的交错重叠着的被害与加害。另外，在剧场中，也能够感受到，在像这样的公共场合中表达出的强烈愤怒情感，没有被否定而被接受，并作为一个声音被尊重着。由此也促成了这次研讨会得举行。

刻在身体上的记忆与情感

Kleinman 等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对大屠杀、越南战争为首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及民族净化等带来精神创伤事件的社会记忆进行研究的先驱。就如他们指出的一样，即使到了和平社会的年代，不论是对加害者还是被害者，战争中得暴力，都会以精神疾病或身心疾病的形式对个人留有影响。这种暴力，不仅残留在直接体验过的个人，还会被带入家庭，从个人、认知及身体行为三个方面传达给后代。

(Connerton, 1989) 然而，东亚地区过去的历史教育及和平教育，从 Connerton 所说得个人与认知方面传达了战争体验的悲惨，并将重点置于阐明战争的“客观事实”上，并没有着眼于如家庭暴力等从身体行为方面传达的社会记忆（张，2010）另外，至今为止的精神创伤治疗都是以个人治疗为中心，而将个人的精神创伤与因其产生的身体行为方面的社会记忆联系在一起进行治疗的观点却很缺乏（村本，2008）。因此，在日本，由于偏向客观事实传达的历史教育，战争体验并没有伴随着活得情感被传达给后代，对战后世代来说，战争的记忆也和自己的生死无关。另一方面，就像 Kleinman 等明示的那样，因战争暴力产生的身体行为方面的社会记忆也确实实的被传到了今天。像这样没有被认知的精神创伤，

无意识的以暴力的形式被行动化，进而产生忧虑和自我伤害等症状，对日本现代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

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历史中是不存在唯一绝对正确的叙述的。例如，在直面长年种族隔离政策产生的憎恶和愤怒的南非，以和解人种对立而设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指出“真相”有几个不同的存在方式。TRC 将其分为四种①作为事实的，或者法定的真相②对于个人的，或者叙述的真相③社会的，或者对话的真相④治愈。修复的真相。（永原凉子，2004）至今为止，在讲焦点置于“事实的真相”的战争及历史问题时，以及这个模式中的第二“叙述的真相”和第三“对话的真相”的时候，每个人各种各样的感受和情感密切相连，产生了情感治愈及相互关系修复的真相。要去解开每一个真相的话，作为战后世代，有必要开辟一条与情感治愈和关系修复的真相相互联系的道路。Volkas 经过多年开发出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History*，就是重视活的情感的同时，将个人的故事体验与更多的人共享的一种出色的体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人称的叙述③：“记忆南京研讨会 2011”的感想 1

2007 年，村本参加了 Volkas 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同年 11 月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Remembering Nanjing”，并结识了许多中国学生。为了完成当时和中国学生们的约定，村本于 2009 年和 Volkas 一起再次访问了南京。而今天这次的研讨会，也是那次访问的延续。在 Volkas 带领的持续 4 天的 HWH 研讨会中，我有过好几次积极发言。

首先，第一天，以少人数的分组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同一性进行了讨论。之后，全体人员组成一个圆，并在圆的中间放 2 个相对的分别象征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椅子，练习了从各个立场进行发言。当时我首先坐在了象征中国的椅子上，面向日本人的椅子，提出来责难日本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我十多年来听到的中国人的声音。之后，各个参加者都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当中也有站在日本人立场发言的中国人。最后，我换成日本人的立场，表达出了日本的“无关心世代”。这也是对我自身中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各种立场的声音的确认。

自己是日本人之前，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着。在体验心理学的结构中，被尊重的不是强调国籍不同的“日本人”“中国人”，而是身背各自历史的日本人中国人，

将其身体中得声音尽可能的表达出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与青森县人和奈良县人，山口县人和福岛县人的区别有什么不同，是语言和习惯的不同吗，各自的声音又是以怎样的存在表达的呢，这些在我自身的经验中也出现过。根据 Volkas 指导的方法，在安全的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能够被表达出来并被分享。而这也为倾听自己或他人身体中各式各样的声音并理解这些声音创造了机会。但是在这样的实验空间中产生的体验，并不仅仅与被害者的治愈相关，而这些声音和体验作为真相，与政治方面又有怎样的联系，还是个未知数。

从被害 / 加害到共生：历史·和平教育的方向性

以战后 50 周年为契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展开了关于战争责任的热烈议论。（安彦他 1999）其中，根据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中心的活动及“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的小林等人的，把“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作为“自虐史观”进行批判的言论，让许多的年轻人产生了同感。对于这样的事态，教育学者佐藤学（1998）指出“与其说‘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是对战后历史教育整体的否定，倒不如说是继承了战争历史教育的基本结构”，并对战后民主主义历史教育进行刻一下批判。

将战争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消除，并抹去死者的声音。通过这种惊人的方法，战后的教育实现了向和平民主主义教育的快速转移。当然，充满着苦恼和恸哭的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战争还在每个人的身体中逡巡着，但至少在学校教育中所学到的法定的历史中，那些身体的记忆都被抹去，正在施行的光明的迈向祖国再建的教育。

然后，佐藤回顾了战后的历史教育方法，关于新的历史教育方法主张：“互相尊重每个人身体上的多样的战争记忆以及历史的多样性是叙述历史传承历史的教育原则”，“并非以善或恶，对或错来概括，而是将活着的每个人的复数的历史，作为‘日本人的历史’的事实来接纳，这对于日本近现代的教育来说是有必要的。”

教育学者高桥舞（2009）在《以不阻碍人类成长为重点的教育学——现在必要的共生教育是什么》一书中，对“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小林及“自由主义史

观研究会”主张的恢复“日本人性”能够解决现代问题的言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通过探讨，高桥指出，被他们的主张所渗透的日本社会的“由能力主义产生的格差扩大问题”，和网络了所有问题并作为根本问题的“关系性的危机”问题的真正原因及提示解决方法的必要性。

对高桥来说，从“对被害者的自我教育”到“对加害者的自我教育”的思想范畴变化是必要的。那是因为，既存的教育学推荐对他人的暴力—他人的殖民地化—，并强制对自我的暴力—自我的殖民地化—。以这个观点为基础，高桥如下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妨碍相遇的近代性”。

现代教育问题的原因不是“日本人性”的欠缺，也不是近代的未达成，而可以说是妨碍相遇的“殖民地主义”，它是近代性的延续。单单是高效率的变动可能殖民地化的集团界限（日本国民—日本人精英）的话，实质上 and 战争年代一样，排除了相遇依然是殖民地化，继续殖民地化的结果。没有和谁相遇也没有能和谁相遇，因此我们感到了孤独和相互关系的危机。只要不跨过这个“没有相遇维持的社会—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被强制成为什么人的社会”的近代，现代教育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我们也不会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第一人称的叙述④：“记忆南京研讨会 2011”的感想 2

研讨会最后一天上午，所有的参加者去了燕子矶。2007 年来的时候我也给同样的纪念碑献过花，但是这次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参加者和日本人参加者两个人一组进行献花。看到日中的年轻人牵着手一起走上台阶献花，并为牺牲者进行祈祷的身姿时，1996 年以来一直走在没有答案的道路上的我似乎看到一个方向。

之后，大家回到了下午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研讨会的闭幕式，最后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对面站着，互相坦率的说出自己寻求着什么。“希望大家考虑到各自所说的话是各自的声音同时也是集体的声音。”大家被 Volkas 的话所催促着。中国人参加者也坦率的说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话。例如，“不要以右翼为借口，希望做些积极的改变”，“看见日本人下跪谢罪就会心痛。不想再看到那样的身影。希望做些实际行动”。而日本人参加者也说出了自己的声音，“日本国内右翼的呼声非常引人注目，但也有许多人从以前就拼命努力着进行教育。

但是，这些人中最近变得讨厌中国并放弃的人越来越多。请帮助我们达成互相谅解。拜托了。”互相坦率的说出心声互相坦率的回答之后，日本人和中国人互相谅解，互相握手，互相拥抱。坐在两组间的地板上，一直看着他们的我，想把这些身影好好的烙在眼中。那是因为，面对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黑暗历史，他们感受到了互相的痛苦，每个人都在想面向未来应该做什么，这个过程是大家一起度过的，而我也好像感觉到了这是已经变为可能的一次相遇。

当历史在故事中相遇——“一人一故事剧场”在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会应用的思考

郑春晖

同声同戏剧团代表

“一人一故事剧场” (Playback Theatre) 由美国心理剧治疗师 Jonathan Fox 和 Jo Salas 于 1975 年在美国纽约创立。它是一种即兴互动剧场。演员没有剧本，把观众现场所讲的故事运用戏剧、肢体动作、音乐等艺术形式即时演绎出来，作为礼物回赠观众。

“记忆南京”研讨会系列，经历了 2007 年学术研讨，2009 年加入心理剧和戏剧治疗，2011 年加入“一人一故事剧场”形式，作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种方法。同声同戏剧团有幸作为中国团队被邀请，与日本 Playback — AZ 剧团一起，在研讨会中联合演出，参加了这个尝试的过程，更感受到“一人一故事剧场”在社群联系的力量。

根据 Armand Volkas 的“历史创伤疗法”的六个步骤：

- 双方对话，“打破相互间不能交流的禁忌
- 聆听彼此的故事，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对方
- 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加害者的潜在可能。
- 对我们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哀悼
- 把哀悼通过仪式、艺术作品表达出来
- 把在工作坊的成果通过公开演出、活动或社会服务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和受惠。

一人一故事剧场在第 1、2 和 6 步骤起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一）主题报告中的演出：帮助参加者整理面对历史的情绪

一般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倾向于学术性，多为资料 and 数据的表述，而这次研讨会其中一个内容关于：通过个人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来认识历史。

Armand 先生创造性地在主题报告的每一章节的结尾处，加入“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呈现，通过戏剧的形式把文字资料里所隐含的情绪、历史发展的过程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让参加者更深入地理解了主题报告的内容，把个人情绪与历史资料进行联结。同时也帮助参加者了解“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形式，知道如何参与到这个剧场中，为工作坊的顺利开展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二）练习中的示范：帮助参加者了解如何参与练习并投入其中

工作坊主要采用心理剧和戏剧治疗两种艺术性表达治疗的方式，需要参加者亲身参与到剧场游戏、角色扮演、即兴创作当中。因为有了“一人一故事剧场”演员的加入，让参加者减低他们的心理防卫，更自然地投入。也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显著地出现。

（三）故事的演绎：同感分享者的故事 促进双方的理解

在工作坊中有两次时间集中运用“一人一故事剧场”，当中的故事，有日本人有国外时遇到中国人关于中日战争大型集会时的震惊；有日本青年面对得知自己慈祥的祖辈曾参加中日战争暴行的伤痛，有中国青年讲述自己试图成为中日友好桥梁而面对的挣扎，有双方面对这段沉重历史的复杂心情……

中国和日本两国青年面对这段受到不同教育的沉重历史，都不轻易触及自己的记忆和情绪，而“一人一故事剧场”让这样记忆在安全、轻松的环境下表达出来。

当这些故事被在剧场中呈现，参加者从更多角度了解彼此的家庭、社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和创伤，更能明白对方在此刻所经历的挣扎与困难。同时，故事之间自然的对话与回应，让分享者的故事不断深入，也从战争亲历者家庭、或本人面对这段历史的故事，慢慢进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故事，彼此的困难与努力。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

从故事的演出，我们更清晰地看见，战争影响是如何深远地在世代间相传，人们为此而困于潜意识的羞愧、仇恨当中。当故事被听见，被明白，双方经历战争创伤的愈合就有了进一步的可能。

（四）公开演出：把工作坊的成果扩展出去

在工作坊的第三天晚上，我们与日本团队进行了两小时公开演出，面向南京市民。其中有来自南京 YMCA 主要负责人，各高校的社工系的老师……他们都是对于社会安定，民众教育有影响力的人。

在演出中，观众们分享了在中日和平之旅共同的期待和让自己困惑、无力的地方，有些内心的执念开始柔软，有些难处被呈现让大家有更深入思考。

“一人一故事剧场”不是要解决问题，在剧场呈现的故事中，我们从相似处找到共鸣，从差异处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让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有进一步了解和接纳的可能性。

公开演出把这次由 Armand 先生带领，中日参加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把和平的种子在更大范围地播撒开去。

这次同声同戏剧团与日本 Playback-AZ 的联合演出，对于双方都是十分愉快和有意义的经历。不同文化、不同剧场语言的团队在一次次的即兴演出中寻求彼此合作的默契点。中文和日文突现了两个团队背景的差异，彼此心领神会的即兴演出让我们看到和解、融合的可能。此次与美国 Living Arts 剧团的 Armand 先生、日本 Playback-AZ 剧团的合作，是同声同戏剧团很宝贵的经历，期待在这个和平之旅，我们可以再次相遇、贡献更多……

第三部分 参与者 1 个评论

震撼！感动！万感交集！

“记忆南京 2011” 抚平战争创伤国际研讨会感想

羅翠翠

抚平战争创伤国际研讨会结束时，邦子通知大家，务必在两周交来感想。时至今日，已快两周，尽管写感想的事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可是，万感交集，始终无法理出个头绪。每每打开电脑，却不知从何写起而又关上电脑。也许是时间不等人而急中生智，想起了在研讨会四天中，阿尔曼德先生总是让大家说一句感言来结束一天活动。

于是，大家将一天活动的感受凝聚为一个词说出来。每个人的感言的确不仅是大家共同的肺腑之言，也反映了几天来我和大家一样的心理历程。从而在此，将大家的感言排个顺序，据此作为本感想个小题的题目。

期待

2009年，我曾参加了阿尔曼德先生主持的HWH工作坊。因为感悟颇深，因此，当绫发来邮件邀请参加第二次HWH工作坊时，即欣然同意并很期待本次的工作坊。

2009年的工作坊不仅让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体验，最重要的是，自打从事中日友好事业以来，从来没有以战争受害国的立场，与初次见面的、作为与战争加害国立场的日本人，特别是与战争加害者有某种关系的日本年轻人，就南京大屠杀这样彼此讳莫如深的话题，开诚布公地交流过。

而且，那次工作坊结束后，特别怀念仅仅相处四天的阿尔曼德、邦子、绫，还有印象深刻的年轻的日本朋友们。以至于想起他们便难过得想哭。

那次工作坊的体验不可思议，虽然事过两年，但那四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特别想再次见到大家。因此，对本次的工作坊十分低期待。。

不过，期待中还有些许不安。因为在上一次HWH的工作坊中，感觉中日双方的朋友们，相互已经透彻地了解了彼此的痛苦和悲伤，已经基本消除了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这次的工作坊不会再产生上次那种感动，相互间因了解而不

再像上次那样进行深入交谈，反而会变得无话可谈。

当然，还有一点不按是，当作为受害方的心中，还有不尽释然的情结没解开时，真的能够和加害方的日本朋友们毫无顾忌地深入交谈吗？我一直怀着这样不安和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的开幕。

感动

事实上，我的感动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邦子开幕词的一句话，让本次工作坊研讨会在感动中开始，让我原先的些许不安顿时消失了。并让我产生了立即想和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的冲动。她的话触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弦，邦子说：这次工作坊研讨会因为有政府资助，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阿尔曼德先生做主持，才得以成功进行的。

听了邦子的话，看着自费从大洋彼岸赶来，眼神中充满了将友好诚意展示给南京人的期盼，感觉眼眶湿润了。首先让我感动的是，日本友人们为了和平，极力推动政府和学府给予援助，顶着来自周围同胞不理解以及右翼势力恐吓的压力，鼓励年轻人前来南京，他们的工作一定异常艰辛。那一刻，看着为准备本工作坊而消瘦疲倦的邦子和绫，我想起了倒在右翼暴力团子弹下的长崎市前市长伊藤一长，想起了长期受到右翼恐吓的笠原十九司先生。深感到日本友人寻求和平的道路之艰辛，不由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再一个让我极为感动的是阿尔曼德先生。在 2009 年的工作坊，先生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后裔。

只知道阿尔曼德先生是戏剧疗法的心理学教授，开发了 HWH 工作坊，设计许多戏剧心理疗法。原本以为先生来到战争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主持这个工作坊只是测试自己研发的成果，对消除战争造成的创伤是否有效。先生的研究目的令人感动，觉得是了不起的国际主义者。

没想到阿尔曼德先生双亲也是大屠杀幸存者，先生内心也有很痛的战争创伤。但他却控制自己对加害者的仇恨，潜心研究如何将负面的战争创伤转换成积极的推动和平的力量。为此，先生奔走各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探索与加害者的后裔友好相处，共创和平之路。

还有令人感动的是，参与本次工作坊的日本年轻人中者中不仅有每次都参加

的有许多日本新朋友，还有来自广州和香港的艺术家协会朋友们。

尽管本次活动刚刚开始，仅仅站在会场就已感受到人们锲而不舍、艰苦探索和平之路的氛围，这已足以令人感动不已了。

心痛

紧接着，大家按照阿尔曼德的指示，开始自我介绍，并说一句“我是某国人”，以此让大家体验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祖国名称时的内心感受。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方人在说“我是中国人”时，都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而日方的朋友们在说“我是日本人”时，感受是复杂的。特别是对战争一无所知而度过幸福童年长大成人后，才看到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惨状，才知道战争时期日军在亚洲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后的日本年轻人，在说自己是日本人时的感受是痛苦的。他们茫然、困惑、无奈、凄凉的表情，深深刺痛了在场的中国年轻人。大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感受到他们作为战争加害者后裔而极为压抑。

另外，香港的 H 不能在众人面前，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中国人时的感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颇为诧异。原来当他在海关办入境手续时，香港人被要求站在外国人队列办理，令他非常尴尬和屈辱。H 觉得虽然中日双方的年轻人都因战争创伤而痛苦，但大家都有抱负，都目标明确地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贡献。而自己作为中国人回祖国时，却被要求站在外国人的队列里。他不想现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模糊身份，想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其实，让香港人陷入目前尴尬处境的还是侵略战争犯的罪孽

还有韩国女孩 L 的发言也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感到震惊。身为在日韩韩国人的第二代，她仅一直使用日本名，不愿表明韩国人身份。堂堂正正使用韩国名。开始使用韩国名字也是最近不久的事。

H 和 L 的经历让我们痛切地感到，战争创伤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绞痛着各国年轻人的内心，这是我们很心痛。

理解

HWH 的一个环节是展示令自己开始关注南京事件、想起战争的物品，并向大家介绍有关该物品的故事。

首先，阿尔曼德先生给我们看一张十几个人合影的大家庭照片。那是一个非常和睦、温馨、充满朝气，每个男子都非常帅气，女子都非常美丽的大家庭。可是，照片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屠杀了。阿尔曼德先生的母亲是唯一的幸存者。可想而知，阿尔曼德先生的母亲每次看这张照片的心情是多么的凄苦、悲伤。大家静静地听着阿尔曼德先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刺痛着我们心，感到眼眶湿润了。

接着，人们依次展示自己的物品，介绍激励或震动自己的故事。

- * 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惨状的影集。

- *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令自己开始深刻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

- * 在非洲被抢过的钱包。令人联想到战争根源即贫穷和暴力：

- * 来自南京的明信片。每每接到即加深对南京大屠杀残酷实质的认识。

- * 家永三郎先生的照片。那是在高中时代，看到面对不关心历史的学生，感到心痛而发火的先生，为此大为震动而开始关心历史。先生为了让历史教科书符合历史事实，大无畏地三次舍命将政府告上法庭；

- * 身着日军军服的爷爷照片。儿童时期，每天都亲切地搀着自己小手散步的爷爷，竟是残忍战争的参与者；

- * 在日本度过一生的爷爷奶奶照片。战时，他们是从朝鲜半岛被强行拉到日本的；

- * 身着日军军服的爷爷照片。孩提时期，只告诉自己被苏联军强行拉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受尽了非人待遇的爷爷，一定也有参与罪恶战争不可告人的秘密。

- * 孩子们参与和平活动的照片。那是在热心的爷爷指导下做的。令人想到爷爷是否为自己的战争罪行悔过而以此赎罪。

等等。

大家的物品以及相关故事，超越了国境，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彼此间的距离正一步贴近，相互注视的眼神更加温柔、热情并充满信任和理解。大家开始主动寻求和近旁的人交谈，会场充满了和谐和温馨。

震撼

四天中，每天都能感到一种震撼。震撼我们的是那大家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

声。人们相互的呐喊并相互感到了一种心痛。

在相互祈求原谅的环节结束后，当阿尔曼德先生询问大家有何感想时，佳代哭着看着中国年轻人大声说“如果我爷爷杀死了你爷爷！我爷爷强奸了你奶奶！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说心里话，佳代发自内心的痛苦哭诉深深地震动了我。她的哭诉至今还鲜明地回响在我的耳畔。佳代是多么勇敢而有责任心的女孩啊。对于这个许多日本人可能都想过，却没有勇气向中国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她诚恳地提出来了，说明她将南京事件和自己联系起来认真思考过，强烈地感受到了受害者身心的痛苦。与她相比，日本的右翼和一些政治家却尽量回避南京事件，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不仅对战争受害者漠不关心还大肆污蔑痛不欲生的受害者。

在此，我为佳代的勇敢而感动，向敢于来南京的日本年轻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向所有能够正视历史事实，敢于排除一切压力，探索世界和平之路的人们致敬。

有位女孩，到南京后，通过见闻了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后，才震惊地得知，孩童时代，每天牵着自己小手散步的慈祥爷爷，竟然也可能是和日本鬼子一样的战争刽子手。可以体会到，她是多么不愿相信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女孩那一刻无奈而无助的心情，可能也代表了很多日本年轻人的心情。只要想到曾经那样疼爱自己的爷爷，竟也是进行了大屠杀的魔鬼，仅此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了。她痛苦的哭声刺痛了在场的人们。

那位只知道爷爷在西伯利亚做苦役受尽磨难的男孩，此时也是一脸茫然和无助。因为他一直不知道爷爷曾经也可能是战争罪犯。

关于旧日本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不仅中国年轻人了如指掌，亚洲各国的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而旧日本军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却一无所知。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让第三代的年轻人今后如何与各国人民建立国际关系呢？

敬佩

四天中，每天除了震撼和心痛，还有不时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意。对阿尔曼德先生的敬佩不言而喻，还有对日本年轻人的勇气和诚恳，更有对日方学者们襟怀坦白的态度。学者们表达出了正义、良知和尊重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在进行中日对话的环节中，正义且富有良知的村川先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尖锐地怒斥日方道：“你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至今也不来了解我们幸存者的痛苦。是

否想等我们这些幸存者都不在人世了，就达到了你们死无对证的目的，而不承认过去的罪行了？”村川的怒吼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

其实，村川在美国时，曾经看过一次中国人声讨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集会。当时，尽管村川不懂中文，但充斥会场的愤怒压得村川痛苦不堪，喘不过气。注视着满脸痛苦和愤怒，一腔正义的村川先生，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还有令我敬佩的是一人一剧场即兴表演的演员们。对他们的敬佩不仅仅是他们精湛的演技。其实，没有心灵的相同，没有用心去体会当事人的真切感悟，再好的演技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将当事人面对战争的痛苦、迷茫、困惑、纠结、折磨、震惊以及对和平的期盼等复杂的心理，用肢体语言表演得淋漓尽致。从而让当事人体会到不同国籍的人们都来分担自己忧愁、都最大限度地理解了自己的轻松感。

我感受到凡是在一人一剧场表达过自己心情的当事人，之前和之后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之前是凝重的，之后是轻松的。

在此，真要感谢演员们的爱心，和他们用灵魂进行的表演。

另外，让我产生敬意的是参加工作坊的许多日本年轻的女孩子。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年轻人多数不关心政治和时事，特别是女孩子。而来到工作坊的日本女孩却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正义、睿智和顽强的一面。

在相互接龙讲故事的关节中，我和小堇是一组。在故事最后，当我说到，过去的痛苦就按照日本的谚语，随水流而逝吧。其实让过去不好的事随水流而逝而忘掉，是我听到许多日本人和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中国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一种特质。有些日本人强调这种日本文化而希望大家忘掉日本侵略者在二战犯下的罪行。

然而，小堇却极不认同，她非常严肃地反问我：“过去的事真的想忘掉就能忘记吗？我觉历史上的事不可能随水流而逝。”

在最后一天下午，当大家把自己的感想挂在小树枝时，那位小时候一直和爷爷散步的日本女孩，一直跪在讲台后面硬邦邦冰冷的地上，默默地帮助大家挂好纸条。看出她已经开始行动了。她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阻止战争。

这些可爱的日本女孩，有良知，有正义感，值得我们尊敬。

真心

在情景再现环节中，阿尔曼德先生指示我选几位朋友，扮演在我成长期中，对我自我意识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我选了邦子扮演我母亲，里奈扮演童年的我等。当邦子用悠悠的、充满慈爱的优美歌声，唱起儿时经常听母亲唱的歌时，流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晚霞片片，夕阳西下，山上传来寺庙的钟声。小朋友们手拉着手，一块儿回家去。小乌鸦也和我们，一块儿回家去。”

邦子的歌声实在太像我母亲了。令我想起记忆中年轻的母亲，儿时，母亲就像邦子表演的一样，一边唱着日本童谣，一边怀念地将许多日本的事给我听。邦子好像是我母亲分身令我十分吃惊。

其实，邦子之所以表演得那样逼真，是曾经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邦子母亲也和我母亲一样，有过许多痛苦经历，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年幼的邦子，希望邦子成年后能够帮助弱者。用邦子的话说，我俩的经历像是双胞胎。在那一时刻，我感觉和邦子心心相印了。

我母亲生在长在日本神户。在战争年代，中国华侨在日本被骂作支那人秦国奴，日军在中国打了胜仗，还逼华侨学生上街游行庆祝。受尽了歧视和屈辱的母亲，年仅十七岁的母亲一气之下只身回了国。

今天的母亲，白发苍苍非常虚弱。但她越上年纪，越眷恋出生地日本的食物和神户风景。她那因怀念神户而显得凄凉的身影，让看到她的人感到心痛。

然而，正因为母亲的日本归侨身份，在中国的特殊时期，我们这些归侨子女的童年时期，受到来自周围公私两方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人们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倾泻在的许多日本归侨的子女身上。骂他们是小日本鬼子，不给热爱学习的孩子们平等升学的机会。无可奈何的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保护孩子，免受更大的伤害。

邦子用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扮演了我童年时期的母亲，让我体会到和母亲一样的日本归侨们当时两难的处境，以及看到孩子因受自己的牵连而遭受痛苦，又得不到周围人理解所受到的内心煎熬。

感受到战争的创伤，其实在战后七十年的今天，依然折磨着深受其害的人们。

扮演其他角色的各位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尽管没有亲身经历，但是他们也能用心去穿越时代，逼真地表现出了四五十年前的场景，令我感动不已。

反省

回顾那四天工作坊的体验，实在有太多的感受要写。

在最后的总结会上，我曾看着疲惫的大家说到：四年来，大家说的最多的一个日语单词是“无力”，译成中文应该是“无奈”。阿尔曼德先生和大家这么努力组织工作坊，爱好和平的人们自费从美国、日本、香港和广州赶到南京，共同参与抚平战争创伤的研究，可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的一句话，就能将我们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还不如请那些政治家来参加这种工作坊，让他们来体验更有效。”

会后，我对张连红教授说，我真后悔刚才说的话，不过这的确是我真心话。但是，张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深刻反省。他反复说：“民众的力量不可小觑”。这令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的，阿尔曼德指导我们做的就是为了和平的星星之火之事。不久的将来，将会变成和平的熊熊之火。。

信心

四天的工作坊，各国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表达，令我对 HWH 工作坊更加有信心了。

首先，在燕子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前，阿尔曼德先生、韩国的里奈、中国的我和广州的女孩，哭着抱在一起安慰一位痛哭的日本女孩。那是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战争受害国的人们同心协力地安慰战争加害国的孩子，体现了超越国境的最大、最融洽的相互理解和体谅的场面。

其次，在本次工作坊中，日本年轻人所表达出的坦诚和努力；中国年轻人的理解、宽容；小翁和小董那样努力进行翻译的留学生；中日双方学者们非常客观、诚恳的研究态度。

当中日双方人员站在两国立场，相互从极端的角度严厉指出一直不能面对面提出的问题后，依然能用最真诚的态度相互拥抱握手，希望为了和平共同努力下去。这让参与工作坊的所有人都有信心，看到将不利的战争创伤转变为争取和平动力的希望。

以上是我参与工作坊的部分感想。

活动之感想

匿名

这次非常有幸的参加了 HWH 工作坊的“记忆南京 2011”的活动，活动中最让自己受益良多的是活动中令人感到惊异的活动形式，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接触到的独特的形式。通过戏剧治疗来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好的沟通，尤其是双方是曾经有很多不愉快历史的两个民族的人们。也正是这个在这些独特的活动中我体会到了心里埋藏很久的想法，只要抛弃过去脑海中的成见，什么问题都是可以沟通的。而沟通才是人们以后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这不仅是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之中，即便是放到国家之间也只有良好的赤诚的沟通，相互理解才是更为理性的做法。

在 10 月 5 号到 8 号的这四天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参与者们在一起互相交流，即便语言上有一些障碍，但是我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感觉到他们的善意，而不是虚伪的应付，这是我对这次活动感觉最为动情的地方，我们忘我投入在 Armand 教授指导的活动里，不带任何偏见的与大家一起互动，只是心中会有一个想法，那是一群人在一起的交流，没有那么多区别日本和中国人的心理角色，当我以一个我们都是普通人的角色融入进这个群里时，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哈哈，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这些朋友太有意思了，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活动中，教授让我们自由的表达自己宣泄出来的所有消极的情绪，而用戏剧来试图让我们心底里的那片阴霾消散。幸运的是我在这次的交流中，也真实的将我心理几乎所有的从我的环境和我的家人带给我的一些关于日本的消极情绪释放了出来，因为我一直觉得当年日本国对我们中国造成了伤害，那些无法抹去的事实，那些看起来狰狞枯槁的骨骼，那些心底里还久久埋着伤痛的战争幸存者，我能从生活中看到这些有时候无法无视的信息，还有童年时亲人坐在一起交流时长辈们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叙述。比起我们这些 80 后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比我们艰难，但是在他们困苦的岁月中，他们带着伤痛依然积极的活着，而且活的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也没有带给我仇恨，而是坚强与包容。而就是这些精神才让我欣然参加这次活动，才让我认识了很多生命中珍贵的日本朋友，

呵呵，希望不久之后能够再和他们见面。

最后一天的在南京燕子矶纪念仪式在我记忆里非常深刻，大家带着的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忏悔站在了燕子矶大屠杀纪念碑旁，当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跪在纪念碑前一起俯身向遇难者们献上一束花的时候，我感觉那一刻那超越国界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打动我的，一万个鞠躬不足贵，贵在心中真正能理解那段历史。在以后我们以后个人的生活中让这想法开花结果，努力不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最后的告别带来的总是情绪上的点点失落，和朋友的道别后走在回去的路上，心中带着一丝不舍，有了你们我多了一个重新看世界的窗口，这些天和你们在一起，受益良多，这件事我理解了。

我心中不禁在呐喊：理解万岁。不是单单理解侵略与屠杀，也不只是灾难与复仇。若是人类只有这两种感情，我想这几百万年的文明是不会存在的。理解的是我们是人。以人的理智和情感还不能理解这段历史，那我们还有存在的必要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洞彻如明镜。

3

南京记忆 2011 10 月 5-8 日

陈韵 (Sana)

参加工作坊之前，思考我和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关系时，我才发现，可能是因为与战争的关系很远，脑海中浮起的有：钓鱼台的主权问题、网上流传抵制日货的倡议、大地震引发的灾难时人们的态度……发现自己对一个国家的态度和情绪，基本上受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影响，对日本国家发生的事情，很难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对待。一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从受害者的角度来产生同感，这与我从事的服务弱势群体的工作价值观一致；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不能公开表达这种同情，因为能感受到大家内心汹涌的愤怒。直面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觉得沉沉的无法挣脱的是，这件事的符号化意义，我是中国人的一份子，我的同胞曾经历的苦难，我的国家蒙受耻辱，我不能说一句“这与我无关”。

第一次的中日双方两张椅子的时候，听着日方说，他们对改变自己的政府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说他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内心涌出了一种愤怒，他们怎么可以说一句自己对政府无能为力就放弃了呢，为什么他们不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什么，也许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或许只是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工作坊，推荐他们来参与。现在记忆那时候的想法，终于明白其实内心希望他们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我们需要行动！我也不希望一直沉浸在仇恨的情绪里面，我渴望找到改变和解决的办法。

在工作坊的和解部分，我觉得我说出一直以来都很想说的“我原谅你”，因为我感觉到对方的真诚，虽然我同时感觉到背后的沉默。说完之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是不是没有这个资格说原谅，我是不是背叛了大家。可是我知道，这是我很想很想对参加这个工作坊的日本朋友说的话，他们为了这些并不是自己犯下的罪行来道歉了，连我这个离战争很远的属于受害国家的人都希望卸下南京大屠杀的包袱，渴望轻松地往前走，相信作为加害者的一方，更加渴望。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流泪和自我反省，似乎有颗种子已经埋在土里，未来有一天它会破土而出，带着这颗种子上路，他们一样可能也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到今天，能够改变的只是人的想法和当下的做法，而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方向。

回来之后，我以为我会可以比较轻松地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但是我发现似乎内心有个声音无声地劝我深入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例如知道里面发生的故事，似乎是觉得更仔细地了解事件的详情并不会有助于我更好地处理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和情绪。尤其是和日本的 Playback 再沟通联系的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其实你可以放下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仅是如其他你希望结交的朋友一样，只是实现一个人和人相知所以希望相交的纯粹愿望。我对自己这种反应有些不确定，是我对还没有找到方法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逃避，还是我不希望停留在痛苦当中，所以想放下了这件事，继续前行？

但是我回来之后，看着我们每天的电视，隔三差五就播放抗日的战争片，正面战场的，谍战的，“日本鬼子”、“小萝卜头”、“侵略者”的标签不绝于耳，我的表妹生于 90 后，她对日本人的厌恶甚至憎恨让我意想不到，包括报读本科专业坚决不读日语（掌握日语对将来工作很有帮助），不进日本公司，不看日本电影，听到日本的时候一脸“不要跟我提日本”的表情等等。战争之于他们相较

我们稍微年长的人来说，更是遥远的事情，而随着幸存者的去世，我倒不觉得这段历史和伤痛会随之淡化和消失，反而可能因为人们的害怕忘记而牢牢记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当人们带着刻板印象仅从一个面向去看南京大屠杀，去看待日本这个民族，会扼杀了人们去探索其他角度的愿望。

因此我看到，更早地为接近这段历史的人们参与到工作坊来的重要性，当人还在感到痛苦和憎恨，而且不愿离开这些感觉，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过去，没有走到现在，所以过去的经验切断了他们感受当下的触角，拒绝了解身边实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表面上他们和一般人一样。通过戏剧这种有距离的也贴近的方式，可以帮助负载痛苦的人们，重新接触伤痛的部分，可以有他人保护和支持的情况下感受痛苦，可以安心地表达情绪，也有治疗师在引导他自己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处理伤口，继续前行的方法。只有他们真正原谅了，伤痛才不会继续流传下去，后人也不必背负伤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挣扎。

作为 Playback 演员以及对戏剧治疗感兴趣的缘故，我也不仅仅用参加者的角度去感受，所以有几点思考。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其中一点不同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我们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紧密相连，即便不是每时每刻都会用这种思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会在大是大非，像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等这些事件上，把自己与国家、政府捆绑一起。例如，在讨论国家之间的问题时，会用“我们”而不是“我”，会表达国家的或者是大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一切以国家的荣辱为先，个人的感受和观点不应该被强调。所以在两国人民聚集的时候，尤其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议题，我如何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然字字句句不离集体的观点，客观的角度。我们 Playback 的演员更容易从个人的角度谈感受和观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演员对于舞台和现实的区分训练，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更有敏感度去理解和接收到治疗师的意向，但当我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难免经历挣扎和不确定。因此我有听到一些声音说即使我因为这个活动改变了看法，都改变不了其他人的看法。我觉得说这句话人都在无意识地把自己和群体一体化，忽略自己已经发生的转化的重要性，日本的参与者的无力感也是来自于此。

所以我在想，也许在工作坊中有一部分帮助参加者从集体中暂时分离出来，

让大家摆脱集体思想，内观一下个人的需要。我留意到工作坊有要求参与者区分国家和个人思想的引导，但也可能有语音的沟通问题，使引导的力量削弱了。我觉得翻译的作用可以再大一些，他们不仅仅进行意思的传递，甚至可以在感觉到参与者有理解偏差的时候，提供一些解释和引导。

集体主义的影响不仅让我们把集体的思想和个人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也让我们渐渐形成不懂得不习惯表达感觉和情绪的说话方式，也没有一种教育帮助我们区分情绪的词汇，和鼓励我们表达情绪。因此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哪些是描述感觉的词汇。有时候以为自己说“我觉得……”“我感觉……”就是在说感觉，但是其实接下来的内容却是事情的描述或者是一种看法或者判断。所以需要更多的帮助例如示范、辨别，来让参加者明白自己在表达的是感觉还是想法。

虽然存在以上的障碍，戏剧的手法仍然创造了一个空间，试图去冲破这些思想的障碍，也成功地打开了缺口，使一些情感得以流露，工作坊已经完结，反而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延伸，发现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我明白这样的主题并非一次工作坊能够解决，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打开清洗掩埋，再打开清洗掩埋。

Playbackers 的示范促进了参与者更快地明白治疗师的意思和投入角色之中，也推进了治疗的步伐。有意思的是，Playbackers 同时作为参与者和表演者的身份拉近了和其他参与者的距离，但会后有声音说“我不是演员，没有你们做得那么好”，潜台词似乎是“我担心自己演得不好被人笑话”“担心自己被评论”，可能只是客气的说话，但也提醒我要学习进步的地方是在与其他参加者演对手的时候，如何更不着痕迹地和对方一起进入戏剧世界而不会给对方造成压力。

参与工作坊，让我有机会经历了一次短而完整的戏剧治疗，我对其中对立的椅子、翠翠老师的心理剧印象十分深刻，尤其结合阅读《Acting For Real》的描述，使我对其中的一些环节的理解深入，即使我并不是“主角”我都能感受到当心理分析经过抽丝剥茧提取重点再以具象的形式展现出来，顿时打开异常丰富的面向，一下子脉络清晰。再一次如我初接触 Playback 的惊艳，一切的积累仿佛为了这一刻遇到戏剧治疗，让我找到自己的专业方向。

HWH 其实归于心理治疗的范畴，或许在和中方主办单位沟通的过程中，让他们对戏剧治疗的目的、方法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例如邀请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参与到工作坊，可能会对推动以后这个项目在南京的发展和本土化有帮助。

记忆南京 2011

立命馆大学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对人援助领域硕士课程 1 年级 董石

这次我作为立命馆大学的留学生，以日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今年【记忆南京 2011】的研讨会。短短的 4 天的研讨会，对我来说将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灾难后，战争后的心理创伤治疗，在这个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年 3 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地震，海啸，核辐射给灾区人民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在整个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灾后心理创伤的治疗，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新闻报道中屡屡出现的令人心痛的画面，其中不仅是家园遭到破坏，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些在废墟中寻找自己亲人的画面，那些由于辐射而无法正常出行只能在家中无奈的等待的画面，那些由于失去了家园，集体集中在避难所生活的画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这些人们没有收到肉体上的伤害，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中，从他们的话语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心里收到的伤害。2008 年的中国四川大地震，也是同样的场景。这两次灾难，让我最直观地感受到了灾难后，战争后心理创伤治疗的重要性。如何让那些在灾难中，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并且让这种创伤不会世代延续下去，正是心理学研究，及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这次【记忆南京】研讨会，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运用美国 CIIS 大学阿曼德教授的“play back”的心理创伤治疗疗法，以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模式，通过内心感受的描述，及将描述的内容以演剧的形式反馈的形式来展开的。村本教授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就我个人而言，至今为止的学习中，简单地接触过类似的“drama therapy”疗法，但是“play back”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坦白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疗法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依据，能达到怎样的效果。但是随着研讨会的深入，我似乎渐渐的体会到了其中的真谛。首先，将内心的感受通过语言描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将内心的痛苦得以抒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然后听者感同身受，通过无声的演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以反馈。当自己内

心的痛苦，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被很形象地反馈出来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被社会的接纳，被社会的认可，也许真是这个疗法的核心所在。我本人也自愿地作为实验对象，体验了一次“play back”。我想把我当时的感受描述出来。当我坐在前面，面对下面三四十人的听众的时候，我的内心并没有任何的波动，非常平静。然后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作为一名留学生来到日本，当日本人说中国不好的时候，我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极力维护我的祖国，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知道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同样当我回到中国，身边的朋友说日本不好的时候，我知道他们说的不对，想去为日本辩护，可是又因为我中国人的身份，经常无从开口。我将我内心的矛盾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起了波动，我感到一丝委屈，有些激动，有些想落泪的冲动。当一人一故事剧团的朋友们将我的描述和感受通过无声的演剧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欣慰他们很形象的描述出了我内心的纠结，内心的挣扎，以及一些无奈。看完他们的表演，我很感动。感觉自己内心所想的，原来不为人所知的，无形的，抽象的感受得到了理解。回日本后的当天晚上，我又梦到自己回到了南京。

以上是我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些感受，我想也许当时在场的，并且主动讲出自己内心感受的朋友们也许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当然，让我的内心得以安慰，能够坦然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的，不仅仅是彼时彼刻那一次的倾诉，那一次的反馈。整个四天的活动，这四天的融洽的，和谐的氛围，以及中日年轻一代对和平的向往，相互的理解，坦然地面对彼此，积极地想要为中日历史问题的和解做出努力的态度，也深深地打动了。

作为一个在日留学的中国人，我应该积极做好中日沟通的桥梁，为中日的和平友好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参加南京研讨会感想（翻译）

藤原慎太郎

我参加南京研讨会的契机是来自于想知道战争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的心情。

而给我这种心情的就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爷爷。他本身和南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因为出兵中国东北，战后曾经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他被扣留时也正好是和现在的我差不多的年纪。正因如此，现在我想重新审视战争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参加研讨会的过程中，我感受最强烈的是，对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情。这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记忆到目前为止所学的战争知识，发现大多都是从日本受害的角度学习的。都是和战争后期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冲绳岛上和美军的战斗、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攻击等日本受害相关的知识，总是听到爷爷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日本受害也非常严重之类的消息。然而，有关日本侵略他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恶行，即便从教科书上得知一些，却也缺乏对于日本人戕害他国、给当地人们所带来恶劣影响的深入思考。我的兴趣点“战争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主要就是要考虑战争受害者的想法。而且，到目前为止，思考与我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对于战争的想法与感情的机会，也绝不是那么多。

在决定参加南京研讨会之后，就开始阅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并且，得益于研讨会而有机会直面拥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战争具有加害和被害两方面，而且加害国和被害国各自对于战争的理解和处理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人，其被害和加害的程度及影响也因地域和个人而大不相同。战争体验绝不是什么可喜的事情，所以很难使人们与他人分享。因此，接触到其他人对于战争究竟有怎样的思考过程并将之吐露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此次南京研讨会上结识了那么多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并且采用“戏剧疗法”这种易于让人分享内心想法的形式让我理解了他人对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感情，对我来说是意义深远的经历。

如果把历史问题视为禁忌而置之不理的话大概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即便不置之不理，也不是迅速就能解决的简单事情。所以，或许就如这次研讨会上所展示的那样，通过小组的形式尝试理解中日两国不同人的感情是中日双方相互理解的契机吧。但是，我认为这作为契机是足够了，而如何以这契机为起点进行更深入地展开行动，确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为了东亚和平（翻译）

洪里奈

在参与研究“南京事件”这一课题期间，我一直为“价值认同感”这一问题烦恼不已。一直在想：在工作坊活动中，我该站在那边呢？我来到这个工作坊是否合适呢？

看到我这样，阿尔曼德先生关切地对我说：“请不要当隐形人。”先生的提醒是我意识到，至今为止，我的确一直心安理得的做着“隐形人”。

3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立命馆大学的工作坊活动。自那以来，我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一旦涉及到中日问题，我一直把自己当作隐形人，以此回避中日间的问题。但是在工作坊期间，阿尔曼德氏给了我空间，让我真实地感到存在于工作坊里。与此同时，我又必须直面既不是局外人也并非隐形人的问题。这一来，令我更加不安了。

作为韩国人，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在日朝鲜人的后代，如今又生活在日本的人…，我既不能完全成为旁观者，也不能“谢罪”，为此，在整个工作坊活动期间，我只好既不站在中国立场，也不站在日本的立场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因为阿尔曼德氏给予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摇摆的空间”。在追悼会上，阿尔曼德氏和朋友们来到我身旁，支持着我，使我十份欣慰地感到摇摆的立场也可以的，使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摇摆的立场中，我感受到无论是受害者的后代，还是加害者的后代，都表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这是工作坊参与者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我又有日本人的认同感，又有家人是受害者的记忆，在此夹缝间，我必然是要摇摆下去的。不过，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站在某一边的。

本次工作坊的成果，也许还不能立刻确定。但我想工作坊的每位参与者，今后一定会将在南京感悟到的一切，付诸于行动的。

在本次工作坊中，我和参与者结交了宝贵的友情。我发誓要继续保持这种友

情，并在下次工作坊开始之前好好学习中文，将工作坊活动不断延续下去，并以此为东亚和平不断取得进步。

7

记忆南京 2011

鸣去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甚近。曾几何时，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吕尤其突出，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超人，而且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等人都有密切交往。天宝 12 年 (753 年)，仲麻吕归国时，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听了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人把仲麻吕比作洁白如碧的明月，把他的死，比作明月沉碧海。因为是明月沉碧海，所以天愁人哭，万里长空的白云，刹那间也变得灰暗阴沉，一片愁色笼罩着天地人间。诗中感情充沛，深刻表达了两人的诚挚友谊，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不朽名作。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由此可见中日友好的关系早在唐代初露端倪。

到了近代，由于在日本军国主义所倡导的“大陆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发动两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分别为：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 1937-1945 年的中日第二次战争。尤其是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到 1938 年间日本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致使中国无辜军民死亡几十万人，给当地的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从抗战后到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抛出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并且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的言论以及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造成民众在心灵留下很多的创伤。值得欣慰的是日本的友好人士多次对此表示道歉，并且学生、老师、民间的团体等日本友人多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来参观访问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发生的行为表示道歉，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为推动中

日友好起到促进作用。

本次活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日两国的新一代青年在一起友好交流，对于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大家纷纷表示：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携手并进，为和平而努力！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沉迷于历史的悲伤之中，应该勇敢的面向现实，为中日的友好而努力！

I 8

记忆南京 2011

黄志敏

弯下腰的那一刻，脑子里边一片空白，只会不住的说“对不起，Sorry，请原谅我吧！”这还只是没有预设的情况。如果背负着来自于历史的创痕，那么要弯下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听在场的孩子们说他们记忆中关于那场战争的印象，不少人已经逐渐淡去了。这多少让我有些愕然。可那一瞬间，转过念头，才发现，这也是件好事。谁说反思一定要是沉重的？谁说一定要抱着“你必然应该将血债偿还”的心态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但这么说了，更重要的是一直沿着汉娜阿伦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什么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如何避免极权主义的发生？

是谁给了你施暴的勇气和动力？！

Armand 的具体意思我不是很懂，但是他说的一句话启迪了我：如果愤恨和不满没有得到发泄，那么他们某一天还会再来。佛相信这些负面情绪是可以消弭于无形的，前提是人的修为要达到足够的境地。放下，舍得，如果不能将心中的恼怒放下，那么前进是不可能的。

姜文曾经说过，自己在日本放《鬼子来了》的时候，看到眼前文质彬彬，谦逊有礼的日本青年，实在无法将其联系上那些在中国战场上杀人如麻的魔鬼们联系在一起。可是随着与日本人交往的次数增加，对他们了解愈深，脑中这两个图画反而慢慢重合起来。这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

今天，据说日本的孩子们身上还多多少少有美治时期的不自信。政府依然不能开诚布公。专制主义的幽灵在这片土地依然蔓延。甚至一个核电站爆炸都让世

界迷惑不堪。这让我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只有不断的解放身上的桎梏，才能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

每个社会，都像“寂静的无知山谷”，总有“先知”和用于担当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是否足够多？站前，日本也有过一个很有希望的政府（就像清末的政府），但是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让已经激化矛盾了的社会终于选择了军政府。以史为鉴，不是要为了道歉，那太矫情，而是要认清极权主义的产生和暴力的复辟。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暴力奴役和侵害，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大声维护并义无反顾的站出来维护其他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让日本民众了解不单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9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翻译）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 1 年级 川崎宏祐

在写研讨会报告的此时此刻，突然发现我是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平静。在日军曾经犯下大屠杀暴行的南京之所见、所闻、所感，已全都牢记在我心。从内心里感觉能够参加此次研讨会真是件幸运的事情。

但是记忆在南京度过的每一天，绝非都是快乐的事情。通过这 4 天的工作坊，我们听取了中日双方参加者的想法和大屠杀幸存者当时的经历。战争的悲惨、对日本的愤怒、对中国的谢罪、对和平的衷心向往——各种各样的感情都在现场迸发，我被那些感情压得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日本人，该如何直面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为日本人，该如何面对中国人？”这些问题时常缠绕着作为“日本人”的我的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这些问题非常困难，现在也没有找出答案。今后确实还有继续思考的必要。

参加工作坊感到最悲痛的是在第 2 天的日中对话时。各种感情喷薄而出，对于中国的谢罪要求，最终形成了日方不停谢罪的场景。我被平时根本就连想都不

会想的“日本人”意识所困扰，又加上深刻认识到自己对于日中历史是那么无知，一种无能为力之感充满全身。而且我也对日方向中国不停谢罪的场景持有不适的感觉。我对认为这种谢罪无济于事的自己产生厌恶，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有参加这研讨会的资格。结果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才好，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研讨会第4天，我们来到燕子矶纪念碑进行悼念活动，我清楚记得面对纪念碑时，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天气非常晴朗，让人根本无法想到在如此静寂、如此安详的地方曾经发生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环顾四周，都是我们研讨会的参加人员。这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拯救了我。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和中国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我们这些衷心祈求和平的人都聚在这里这一不争的事实。仿佛一下子看见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心情也逐渐地平缓和轻松起来。我想抛弃自己心中的偏见和纠结，首先从直面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想法开始。至此，我终于有种站到了起跑线上的感觉。

我重新审视作为日本人的自己的存在方式。首先就是有责任认真学习中日两国历史。我认为包括我在内，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非常多。而且日本人当中，单凭大众传媒的报道而决定对中国印象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在日常生活中也根本没有想到现在仍还有人因过去日本犯下的罪行而受苦受难。所以我觉得认清这些事实，接受他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要承担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而且也想对自己是个日本人而心存骄傲。看到我写的“骄傲”二字，大概会有很多人赞成很多人反对吧。的确，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可以轻易原谅的，那是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人的残酷无情的罪行。然而我只是偶然出生在有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日本并生活到现在。正是因为我想对能够面对过去中日历史的自己加以肯定，所以使用了“骄傲”一词。既然想持有“骄傲”之情，那也就必须担负责任。实话实说，我现在虽还不知道该以何种形式尽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责任，但肯定会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和形式。或许学习中日历史、不断思考和平的姿态恰恰应该就是担负责任的第1步吧。

这4天，是既有直面自我，也有深感彼此间紧密共存关系的4天。所有参加人员分享各自的想法和感觉。虽然有很多泪水，但也有多得多的欢笑。虽有语言上的障碍，但我们也是为了突破这种障碍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了很多谈话。研讨会之外，我们还一起去喝酒，还有最后一天晚上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边喝边

唱……。而我也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朋友”的评价。这4天真的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非常幸福的时光。

我参加此次研讨会的理由之一，是想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告诉我这种关系的人就是有战时来到中国经历的爷爷。当时的爷爷是作为卫生兵来到中国湖北省。战争结束后他有一段时间留在中国。爷爷告诉我，他留在中国时，中国人对他是非常友好的。这也许是爷爷心中谁都不能诉说的故事吧。但是，从爷爷的故事中，我想接受“无论是在怎样严酷的时代都可以和他人建立良好关系”这一观点和事实。在此次研讨会中，我也的确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从政治形势来看，当下的日中关系绝不能说是良好。在两国中都有发布负面消息的新闻机构、并有通过负面消息来认定对方国家和人民品质的错误倾向。这是必须改变并且是可以改变的事情。我想采取一种不为既成观念干扰、在重大问题上自己决断的态度。

我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思考作为日本人的自己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我认为很有必要向周围的人讲述我在南京的体验。无论多么深重的苦难都会被超越，都能建立起人与人相互间的良好关系。我将会不忘初衷、不负我心继续努力。如果不是参加此次研讨会，大概也就不会有我现在对中日历史与和平、对自我存在方式的深入思考吧。为我创造此次机会的以村本老师为首的各位老师、各位剧团的朋友、中日双方的参加者、一直支持我的所有人，衷心地谢谢你们。

10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

默崛

我是参加此次活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学生默崛。

能在5日至8日四天内参加HWH工作坊的过程中认识老师真是一件幸事。能和老师就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真是非常感谢。

在这次活动刚开始时，我坚信自己肯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但是，

也许是由于 Armand 先生的力量吧，我发现我错了，真没有像自己一开始想象得那样能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也正由于此，我开始考虑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了。说真的，此次 HWH 工作坊活动真得改变了我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思考角度。

(1) HWH 一开始，我是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的。这自不待言。说真的，当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时，听到剧团的人和参加的日方学生说“在参加活动之前，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后，对于日本对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暧昧态度、对于日本在历史和现今的行为真是感到非常理所当然的愤怒和不满。对于日本的谢罪感到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但是，虽说对于日方的道歉感到理所当然，却总是不敢直视前来参加活动的日方同学的感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犯下残暴战争罪行的是那些奉行军国主义的父辈们，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日方朋友都和战争、南京大屠杀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正是为了解真相、向中国表示友好才来到中国的。就连罪犯的孩子不也得在伦理和法理上给予平等对待吗？更不要说距离战争过去已经两三代、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日本年轻人了。

同时，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就像参加此次活动的某位日本老师在三藩市的遭遇一样，很多人对“对中国友好和不友好的日方朋友”无差别对待，认为应该在伦理上给予审判的人很多，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感情不够冷静。也可以说，除却像我们这样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和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生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就在此次活动中时不时成为激烈争议的“谢罪”问题，我回来之后也和朋友及其他学部学生有过交谈（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小调查吧）。当然这个小调查的范围非常有限，但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代表性。在这个小调查中，基本上都只知道田中角荣首相曾经谢过罪，认为“日本没有谢罪”的人还是很多的（即“田中首相谢过罪≠日本谢罪”）。但当我跟他们介绍一下此次 HWH 活动的宗旨和现场情况时，他们有些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理性了一些，认为“中国真正愤怒的是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是真正需要他们跪着谢罪”（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跪”不同于日本的“跪”，中国的“跪”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谢罪方式——汉译版本注）。我想这也许是两国没有真正交流和理解的原因吧。

为什么？是对中方年轻人的教育上有问题吗？中国人或者说中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对历史的承认？日本的实际行动？或是无尊严的谢罪？还是把与战争

毫无关系的日本人置于被审判的立场、要他们进行毫无尊严的谢罪？日方的年轻学生们真有那样谢罪的必要吗？

而且，与其把对方置于被审判的境地、时不时地揭开历史伤口互相伤害，难道互相正视历史事实、牢记历史，基于历史之残酷和悲剧性共同努力下去不是更好更实际一些吗？而且那样互相伤害是否符合人道精神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度探讨的问题吧。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认真地重新想一下这些事情，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是一脸迷茫。

顺便提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个小调查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提出一个政治学问题。那就是“像日本这样，议院内阁制中的内阁总理大臣究竟能不能代表国家全体？难道总理大臣以政府名义进行的谢罪最终也只能是个人行为吗？为了息中方的怒难道每位内阁总理大臣都必须谢罪吗？”（毕竟我不是政治专业的学生，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可笑。但我认为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现在就真实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2）如果站在日方青年的立场上来看的话，我更感到痛苦和悲伤。我真认为此次来到南京的日方年轻人真得很可怜。姑且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份一换吧。“我”真的和战争毫无关联，犯下如此残酷罪行的人是我们的父辈，而我却要代替父辈来谢罪。同样是年轻人的“我”真得能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吗？或许我是为了“父债子还”的伦理规范而来的？“我”作为日本年轻人真得非常痛苦。“我”作为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即便想改变政府不也是只能动用手中之仅有的投票权吗？“我”作为个人，真得背负不起那么重的历史包袱和痛苦。“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想在今后的人生中带着心理上的阴影走下去。历史责任对于个人来说太沉重了。

但是，这样转换立场的话，我就又不敢面对在场的中国人的眼睛了，无法面对中国人眼里的愤怒。更为可怕的是，虽然我们 HWH 的宗旨是尝试和解，但如果站在日方立场说点儿话的话很有可能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这更是我个人无法承担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天的活动中自始至终没有勇气站到对方椅子后边的原因。

同时，我又尽可能得尝试站在中立立场上过。我尝试过，但失败了。因为中方的思维方式已经内化至我身内，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Armand 先生尝试以“个

人”为单位为中心进行行动的尝试，的确给我带来了一点尝试的灵感，但是不知不觉就被国家共同体的思维给禁锢住了。

(3) 昨天，我和参加过此次活动的朋友一起通过电脑聊天时，有位中方历史系的学生提出“在中国历史上进行过残酷屠杀的侵入敌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抓住日本不放呢？”。的确出现了非常多的说法。但以我来看，可能是中方的心理上也出现了某些问题吧。

国交正常化以来，中方一直是坚持“面向未来”的立场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自 80 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抛出“南京大屠杀是虚夸的，非真实也”的言论，这严重地刺激了中方的国民。所以对于中方来说，事关历史问题是必须搞明白的，是和日方右翼势力的言论必须“说道说道的”。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本是中国的“朝贡国”，对日本方面一直使用带有蔑称意味的“小日本儿”。特别是汉语中的“小”有不值一提的轻视的意味。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这使得中国人心里上对于现实状态有种无法越过的纠结？

(3) 再有一点是关于自己的工作的。此次活动我是同时以现场翻译和参加者的双重身份参加的。以前做过不少翻译，但是像这次感受到如此大压力和如此紧张的经验还真没有过。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太过于敏感了，如果因为自己的某些翻译错误而导致本来是为了和解的活动产生争论和吵架，实在是我担负不起的重大责任。

该怎么办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是为了寻求和解来参加 HWH 的，我自己却深深地陷入两难境地而不能自拔。该如何做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以上的感想完全没有什么逻辑，一团混乱。给您带来的阅读上的困难与麻烦实在是抱歉不已。

或许，陷入两难境地也是一种幸运的事情吧。虽然自身是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但现在同感到自己此前的认识实在是过于肤浅了。以此次活动之经验为契机深入思考中日两国关系、消除两国间误解实在是一种重大的责任。这正是中文所言“任重而道远”吧。

记忆南京 2011 感想文

刘忠良

两年前，我参加了“记忆南京 2009”的活动。那次活动之后，心里有很多感想，后来也时常思考战争心理创伤与中日和解的问题。在得知 2011 年“记忆南京”的活动要再次举行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想再次和中日双方的朋友交流看法的愿望。这次活动中，虽然时间有限，但也还是在尽可能地和日本来的老师、学生的交谈中获得了很多新的感触。但是，两年来积累的以及这次活动的到的感触太多，它们缠绕在心中，尽管让我感觉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可还是找不到一个头绪，也许我还是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处理这些感触吧。

两年前的活动及其以前，我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问题。虽然我上大学时就想到了“民族心理”这个词，后来也知道张连红老师以及其他的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进行了幸存者战争心理创伤及治疗的研究，但由于我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心理学，所以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这一领域。但是两年前的活动以及之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体验，让我逐渐体会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依然没有去翻阅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两年前的活动及以后，我了解了一些幸存者的心理，感觉他们其实很宽容，这实在让我感到有些尴尬：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年轻人（数量、比重都是很大的）都非常仇恨日本，“杀光日本人”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来说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的，但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却是这样一种宽容的心态。我们和我们的先辈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太少了点儿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日本也是同样存在的，这两次活动中我也听到了一些日本朋友所述说的战时士兵的故事，那些“加害者”的真实想法与心理状态，大概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也都没能知道。我能感觉到，这些故事中的“加害者”还有东西想让我们知道。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自己也在一些事情当中也成为了“受害者”或“加害者”或者两者都有。以我自己对此的感受来看，我想我理解了曾给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常大爷、夏奶奶的心情，不希望这种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而且对“加害者”，只要以往的事实得到承认，其实不会去指责、纠缠太多。这次活动后不

久有一件事更让我如此认为，是和一个蒙古族的中国人交谈，他说：“曾经我们为世界带来了灾难”，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便真的不再计较当年那段历史了，以前心里存在的一些说不出的感觉，也一刹那不存在了。这是参加工作坊的影响还是常大爷、夏奶奶的影响抑或是人的本心就是如此，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我确实是不再计较了。也可能是夏奶奶说的，如果我们都说一样的话了（我们有某一个共同点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加害者”的心理状态如何，他们忍受着怎样的心理折磨，这其实是我参加这次活动最想知道的，大概也是由于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的缘故吧。我以我自己的想法来推断，如果在战争中做了不好的事情，对比战前的自己，大概他们也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吧。这种迷惑影响着那些人，或者说那一代日本人的行为，例如有的参拜靖国神社，有的迷恋于以前的军装，这是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极端例子。也有的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谈，这是认为自己是坏人的极端例子。更多的是在不明白当中痛苦地生活着吧。其实这也影响了下一代日本人，从参加活动的日本朋友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种迷惑，对于一直敬重的祖辈做过的坏事感到羞耻，也曾敏锐地感觉到祖辈心理上的异常等等。

如果可能我真的很想知道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士兵们的心理状态是不是我所想的这样的。因为如果“受害者”其实很宽容，而“加害者”又处于这种需要肯定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迷惑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交流的问题而让双方都处在心理折磨的状态，那就太遗憾了。更为遗憾的是两国下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的心情而自以为是，不仅使历史的创伤无法愈合，更有危及和平的危险。而在这两次的活动中，常大爷和夏奶奶都对日本来说：“你们都是好人”，不少人都流泪了，我想这些日本朋友的心中如果有那个不知善恶的结，也能打开了。而更进一步，如果是战时的士兵能够听到这句话，那我想他们也不会再纠结于此了。而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中日两国不管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还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后代，都回归正常的心理状态，这无疑是中日两国和平的又一大保障。

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受害者”的宽容有没有道理，“加害者”究竟是不是真的是好人这样的问题了。我们汉文化圈对人性的理解是：“人之初，性本善”，我想这可以作为解释了。而常大爷夏奶奶他们也有提到，是天皇的错，是日本政府的错，不是日本人民的错。当然也有人认为天皇、日本政府就是日本人民的代表，这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是不是一体的，

我想我们都不妨去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让“性本善”的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其实我也不能确定我理解的就一定正确,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去思考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肯定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活动期间很多很多的感触我想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整理都是说不出来的。但我想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日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的中日两国、两国人民以及个体,都是必需的。恰好在活动结束后这段时间我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自认为比较正确的认识,那就是人的本质,是所经历的历史信息的组合结构。因此我认为,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历史,是研究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提。错误的历史认知下,两国是不可能实现和解的。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没办法在短期内整理出来,先做这样的一个小结吧。工作坊为我们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我想这是工作坊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我们大概也不可能通过几次时间紧凑的交流就能够达到中日和解的目标,希望中日两国朋友之间的交流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就如夏奶奶所说的要是都说一样的话就好了。

12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 (翻译)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临床心理学专业硕士课程 仲野沙也加

“来到南京,我切身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仇恨、痛苦和悲伤。但绝非只有这些,还有当时温暖的,平和的氛围、以及大家的微笑和亲切,都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绝不会忘记。而且我也一定会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工作坊的最后一天,说了以上的话。我含泪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学生们注视着我,倾听着我说的话,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故事,于是那五天我们聚在了一起。现在,我只要记忆每个人的脸庞,就会有种想哭的感觉,他们教给我的太多太多了。在南京的5天是我生命中无可替代的5天。

我参加此次工作坊的动机有2个。动机之1是进入研究生院之后，我了解到战争的创伤会世代相传，而且战争给现在的我们的心灵也还带来深深的影响这一事实。而且，我认为通过参加这次工作坊，也能够亲身体验和学习到在学校以及历史课上没有教给我们的许多重要的东西。动机之2是听到村本老师说“中国学生们对我说‘日本人很亲切呀，下次真想和日本的同学们好好聊聊’”，“我”心中似乎有某种感情在涌动，我哭了。作一个“日本人”的“我”很想去中国看一看。

我从很小就对“战争”一词持有很强的厌恶感。无论什么人都有“温暖”的一面。而战争夺走了人们的“温暖”，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这些是国家间的事情……。从很小开始，我就无法饶恕这样痛苦悲惨的事实。但是，因为从历史课上学到的，以及从小就听说我外婆的兄弟和外公的父亲都在冲绳战死，所以那时的我认为日本是“被害方”的意识要多于“加害方”。而使我这种意识得以改变的是高中时读过的一本书。有关日本的战争加害，那本书中这样写道“参加中日战争的父亲由于所怀有的加害者意识而产生心理阴影，而且那段历史深深地刻在家庭中每个人的内心，所以每个人都得伴随着这些感情来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读了这本书，从中得知日本人所带来的非人道的暴力，真是非常震惊。作为日本人的悲哀，以及“决不能饶恕”的憎恨在心中涌动。我把这本书作为“记起回忆的物品”向大家作了介绍，并且带着这些来参加了工作坊。

但是，随着工作坊每天的进行，我心底的故事从我内心深处被记起。那是有关爷爷的故事。爷爷是在我4岁时去世的，虽说有关爷爷的回忆非常少，但也还是有些非常亲切和温暖的记忆。家里人对我说“你爷爷非常喜欢你哦，特别喜欢牵着你的小手去银行，所以几乎每天都去银行的哦”，所以现在他也是我最喜欢的爷爷。但是，爷爷也是一位以“想坐飞机而参加空军”为志向，励志成为士兵的人。听说爷爷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为没能加入到攻击珍珠港的特攻队而懊悔不已。从家人那里听说的有关爷爷的战争经历，在爷爷加害和被害方面并不是很详细。或许爷爷本身就没有对家人详细说过吧。爷爷当时通过专门培养士兵的学校而参军，并且获得较高的地位，在战争中活着回来了。也正因为此，从国家领到了很多钱。至于这笔钱具体是什么钱，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爷爷去世之后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从母亲那里得知这笔钱的存在。而且，还从爷爷奶奶的房间里发现了有关回忆战争的物品。那是肯定那场战争的文章。记忆中最最喜欢的爷爷……

爷爷那回忆战争的物品……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过去我认为爷爷是“因为想坐飞机所以才参加的空军”。而且，也觉得一直会这么认为。我并没有把爷爷的这件物件带到工作坊现场。但在工作坊现场，我感受到必需得接受爷爷是“战争的加害者”这一事实。

面对着这个现实，我参加了一人一故事剧场。那时，听到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战争暴力的痛骂声、看到听着痛骂声的日本人，我被这压得喘不过气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得无力，一种辛酸痛苦之情涌上心头。而且在我的背后还有爷爷这段故事。看着被各种感情压到了崩溃边缘的我，村本老师给了我非常温暖的关怀：“接受所有的感情、并且承认这些感情，一定会和你的下一步紧密相连的”。真得非常感谢村本老师那温暖的话语、温暖的眼神，还有所有日方参加者带给我的温暖。所以有这种温暖，我下定决心要在“一人一故事剧场”把我的故事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在“一人一故事剧场”被演出后，我接受了我心理各种各样感情的并存。我感受到了我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体验，我得以真正地面对“我”自己，理解了各种各样的心情。而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是大家还是努力理解那样不停哭泣的我。这故事之后，“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员对我说“您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剧团里饰演我的演员也对我说“能够扮演你，真是太好了”；中国的学生们能接受这样的我并过来拥抱我；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等等——这一切都让我彻底接受了这样的“我”，并且让我有向前的勇气。而且，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以及人性的温暖，不仅是要在这个现场，更是要一直珍惜下去。我想这一定会结出硕果的。

中国的学生们对我们真是太亲切了。他们对我们说“我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虽然无法说什么，但是如果我现在原谅你能让你减轻痛苦的话，我愿意原谅你”“不要成为你人生路上的包袱”“若掌握正确的知识，以一颗真诚之心面对的话，就会共同接受这个历史事实”“我在学习历史，正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的话语。通过真挚的感情教给了我“同感”“和解”“亲密”这些重要的东西。能够听到幸存者的证言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幸存的老人对我们说道：“由于战争，我们失去了太多，也有太多的人受到伤害。把这些告诉大家就是我作为幸存者的使命”“在当时还一点不懂事的我的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现在说的这些，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为了整个社会、为了作为、中国和日本年轻人。”和幸存者对话时，幸存者老

奶奶用非常温暖的目光看着当时只是痛苦地不停地哭着的我。看着那个作为“日本学生”的“我”和我说话，非常亲切、真挚。

“谢罪”并不是终点。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上的背景，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修复”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通过心的“感受”是实现这种“和解”“修复”的非常重要的契机。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面对这种伤害，我们该怎样理解、该如何面对、该如何交流下去呢？不能被冲走的心中必须要说的想法说出来、共同理解、分享……然后再去思考。留给我们的现实，以及今后要去构筑的未来，为了能让这些是积极健康的，哪怕只有一点，我也希望朝着积极健康的一面去思考。我希望带着正确的知识以及真诚的心，带着这次工作坊给我留下的无可替代的温情，在今后的临床心理学的学习上，认认真真地去思考。

在工作坊里，我接受了自己新的故事。而且也在想是不是去世的爷爷把我引到了南京。而且我要在心中不断培养这刚刚萌芽的故事，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认认真真地，温情地对待每一天。

给我带来如此珍贵经历的是因为有主办这次研讨会的各位、Armand 先生、笠井绫、剧团的各位成员以及村本老师、村川老师、金丸老师、小田老师、中国的各位老师，而且还有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中国成员、支持我的日本成员。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13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翻译）

西顺子

继 2009 年之后，今年再次参加了该研讨会。因为上次参加时留下了“治愈与和解修复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我希望看到这一过程”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这次也毫不犹豫的决定参加了。

通过上次的研讨会，我得到了这样一种自我认识：“我是日本人，我要承担起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这次研讨会又将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如同白纸一般，最

真实地去看，去反映，去感受，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

此次研讨会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学生那认真的眼神，那强有力的声音”。这次治疗历史创伤心理剧是通过设置了中国人的“椅子”和日本人的“椅子”，来象征大家集体的声音的方式展开的。这一环节打破了彼此的禁忌，表达出了最真实的感情，产生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对峙。

在这一环节的最后，全体日本人和全体中国人对面而立。那时，我站在最前列，和中国的学生面对面，他们那认真的眼神、那强有力的声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所要求的是“理解”，是“希望你们给我们、给中国更多理解”的呼声。对此，我自己也回答道“我想去更多地理解你们”。

参加上次研讨会我意识到“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明确日本是加害国的认识和责任”。然而此次研讨会认识到的是“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场合，和中国人面对面、听取战争受害者子孙的声音的责任”，还有“我回答了‘想理解你们’的责任”。每位年轻人的眼神和声音给我带来了压力。

在这最后的环节，我哭了。之后，中国学生们以明朗的笑容，鼓励我道“不要哭”“*You Can!!*”（你能行！）。我被他们那种向前进的顽强与坚强所激励。在政治力量面前，我很微小，也很无力，我的确被这种无力感所压倒。但是，至少我能做到的是去“理解”中国人们所处的状况和立场。

我从此次研讨会中获得了决不放弃的勇气。我不会忘记椅子（集体的声音）的背后是一个一个公民的声音。为了和对面的人们联系起来，我自己也要带着作为一名公民的求问意识一直走下去。并且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工作人员，去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真切地认识到，“战争创伤的治疗以及和解的修复，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不被集体的声音所左右、埋没，而且每个人都要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对方，对生命负责，坚强地生活下去”。

以埃尔曼德先生、张老师、笠井绫等为主的各位日方工作人员创造了让我有如此深刻体验的机会，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 3 年级

野间瑠璃

参加此次“记忆南京 2011”工作坊，我感受和思考最多的是“到底何谓日本人？”也就是“我是日本人吗”的疑问和我内心“我是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感觉。我平时生活在日本，思考自己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机会几乎没有。当回答自己到底是哪国人、或者思考自己身份问题时首先该想到的是“日本人”吗？这合适吗？一在这之前我从未这样思考过。我既没有过深入思考“我是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机会，也从没有追究过我们是凭什么判断“我们是日本人”、“到底何谓日本人”这些疑问。此次参加了让我重新思考自己身份的工作坊，对“日本人”的身份是不是该那么轻易地认同产生了疑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日本人”了。出生并成长在日本就是“日本人”了吗？或者说能把日语作为母语说的人就是“日本人”了吗？

在此次工作坊中，我首先对“日本人”的身份产生了疑问，但与此同时，工作坊中也有让我切身认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事情。

首先是听取幸存者证言时。我一边听取幸存者那无法想象的悲惨遭遇，一边尽可能地想象当时那种悲惨的场面。与此同时，我想到带来这些悲惨的正是日本兵时，对日本人的行为深感“耻辱”。进而，在“中日对话”环节，又认同了日本的主张，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本身没有经历过战争。虽然我关系密切的亲戚中有经历过战争的，但因为当时都是小孩子，他们也都是持有“受害者”立场的人们，所以，我想他们“加害者”意识一定会比其他参加者更淡薄吧。我不知道在听取受害者证言时、在开展对话时所流的泪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谁”的泪。

但是，我感受到前面所提到的“耻辱”“悲伤”本身，不正是由我自身对“日本人”身份的认同而产生的么？对于时代完全不同、未曾亲身体验的战争中那些完全不知姓名的“日本人”的行为，不正是我作为“日本人”而深感耻辱和悲伤的么？这种感觉不正是在无意识中被日本人所接受和继承的么？

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共同举办工作坊，分享从祖父母、父母那里继承来

(无意识地)的悲伤、愤怒、耻辱,开始切身感受到我们都是被并未亲身经历过
 的战争“亡灵”所折磨的同类。但在最后一天看到在燕子矶纪念碑前大声读出碑
 文时的中国学生们,又感觉到他们是有点遥远的存在。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
 了他们呢?我是真得能够和他们分担痛苦吗?我无法回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工作坊的几天,自己的心情处在不停的摇摆中,所以这份感想文的内容也就谈不
 上什么总结。今后的人生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迷惑和迷茫、纠结和疑问。但是,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忘记当我在工作坊中哭泣、悲伤时向我走来的朋友们的脸庞
 和所带来的温暖。

我认为,当就某事物进行思考时,如何将其作为“自己的事情”进行思考非
 常重要。现在我一想到日本的“加害行为”时,就想到了工作坊中韩国和中国朋
 友们的脸庞。就战争、就“加害”思考时,忽然意识到将其和现在的自己一起思
 考的情况多了起来。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是尽量做到客观地就事论事,这也是一个
 事实。

我的专业是日本史,特别是主攻近代史,所以能有更多地机会接触日本的“加
 害行为”,也由此对日本怀有厌恶感。不过我也想通过日本史的学习,对日本的
 行为进行自我独立的思考以及清算,从内心喜欢上日本这个国家。工作坊第一天,
 张老师在发言中提到“历史学的研究是实现‘和解’的手段”。我会以此为信条,
 奉献一生来面对这如此沉重且重要的课题。

15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立命館大学経済学部 3 年级

菅原悠治

我前年參加過南京研討會,因此這次我關注的點來自前年參加研討會的感受。
 一,南京研討會本身設定的目標現在進展如何,二是前年研討會結束時我感受到的
 的中日之間的溫度差。老實說,我很關心這兩個問題的進展,大概這就是我今年
 參加的主要原因。

邊帶著這些疑問，這次我決定不讓自己像上次那樣停滯在茫然中不知所措，所以一開始我是以輕鬆的心情開始參加第一天的工作坊。但我沒想到，看到第一次接觸到的一人一故事的即興表演時，自己還是驚呆了。但後來隨著較長的即興表演出現的時候，我發現觀看著的自己的看法逐漸變化。一個情緒能夠通過這種方式被共有，對此我感到震驚的同時，所有的人都被這一被清楚了概括出來的感情統一，也讓我油然產生一種恐懼感。

在多次觀看這些即興表演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會很快產生共鳴，也有時候毫無感受可言。在反省其原因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總是執著於糾結在某些點上。這是至今自己沒有意識到的。這也是我為甚麼在參加研討會之後堅定了“自己是日本人，同時也必然是日本人”這一想法的理由之一，即所謂的“文化”或“傳統”。這個發現，讓我曾持有的對“這個研討會在外部看來是怎樣的印象？”這一疑問重新回到我的腦海。這個疑問從兩年前第一次參加研討會時出現，只是之後被束之高閣。這個疑問所代表或引出的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我認為用簡單的陳述來解釋的話，只會斷章取義。不可否認的是，第一次接觸研討會的任何人，恐怕只會覺得我們這個集體做的事情很奇怪。但如果融入其中，又會明白我們所做的事情非常正常。對這個事實本身，我是持保留意見的。說明白一些，像我這樣有甚麼說甚麼的外部成員，直接提出這樣的疑問可能會給大家帶來困擾，但考慮到研討會今後可能發展為一個影響社會的運動，這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我斗膽在此提出質疑。

至於為甚麼我在意識到自己很日本的部分時會產生上述想法，大概也是因為即使自己行動上自由隨意，但還是有意識保持自己不脫離社會常識的緣故。同時我也意識到這個所謂的“常識”，是非常俱有日本特色的。當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前年的煩躁不安也消失了。但同時，新的疑問產生了。忽略互相間的文化差異後，是否能夠真正意義上的解決心理創傷呢？舉個簡明扼要的例子來說，在日本文化中死去的人都成佛，而中國文化完全不是這麼認為的。這個差異用文字說明起來很簡單。但正是這樣，才會導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挑起事端的是政治家等上層人物，但普通日本人就會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人幹嘛那麼憤怒啊？！”。如果有人要問我“那你說怎麼解決”，說實話我也拿不出答案。但是我覺得這次中方所說的“不需要沒有尊重之意的謝罪”，和兩年前感受到的溫度差，正是在這一點上得以相互關聯。我們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完全理解相互間的文化和歷史。

通過表現情感這一心理學的手法，彌補相互文化和歷史無法完全理解的部分，或許正是南京研討會本身的任務所在和社會意義。

寫下的全是批評，或許有人會認為我的觀點偏向右翼，但我認為這正是恢復中日關係中，必須跨出的重要的第一步。這也是我自己這次參加研討會最大的收獲。這個研討會以這個非常有難度的問題為討論主題，創造了兩國同齡人之間的相會和交流。我認識留學生，但卻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真正的心聲，得到了很多新的收獲，並且意識到了自己本身很多的問題。另外，通過這次研討會，我也感覺自己開始理解相互的文化。

研討會結束後想起上次研討會的疑問，現在的研討會成長到哪一個階段了呢？這次應該步入“承認”的階段。我也親身經歷並感受了這個階段，並且殷切期待並關注今後的發展。我也會爭取能再次參加下一屆研討會。

最後，本人才疏學淺卻得以兩次參加研討會，實在榮幸之至。同時感謝每一位參加者。

16

“记忆南京”活动感想文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滕川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是出生在南京，“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就只是书本上讲的日本侵华战争的一部分罢了，我很少去思量它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后来来到了南京读书，我开始意识到，“南京大屠杀”在这个城市是个比较忌讳的话题，但它之于我仍然是个等同于“过去”的名词，我有所禁忌，可仍然觉得事不关己。参加了“记忆南京”的研讨后，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就像张爱玲小说里的那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它之于我从未远离身边，只是从未发现。

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我是复杂的。从小的教育，让我根深蒂固的觉得日本侵略了中国，在过去是战争侵略，现在是经济侵略。在日本的右翼企图诋毁中国的

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本能的与日本人站在对立面。而客观的去讲，我欣赏日本的产品，尊重他们的民族精神，真心的为日本地震中的死难者悲伤。这两种感情纠缠在一起，当越来越多的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不再完全相信书本的一切，不再投入那股狭隘民族主义的浪潮，别人伤害过我们，我们何尝没有伤害过其他人呢？同时，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为是她的一员而义无反顾，无论谁要伤害她，我都会最本能的为保护她而战斗。在成长过程中，这两种情愫是并行的，我一直觉得没什么，也许就是因为潜意识为了合理化自我的矛盾，而选择漠视那些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参加了“记忆南京”的活动后，阿曼达教授的一幕幕戏剧，也声声叩问着我内心那些尘封的情感，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它们的流动：漠视—打开—觉察—斗争—面对—接受—转化—融合—平静的存在着。我开始明白，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心里容纳这种共存。这两种情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已经能够泰然处之了。与日本朋友相处的这些日子，我热爱那些和我们一样鲜活的生命，他们让我体验到了人心的柔软和温情，我希望我们的这丝丝暖流能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坚冰注入融化的活力。

最后，我想对所有人说：媒体让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葬送了大部分人的幸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无论它是打着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旗号；南京大屠杀是对生命和人性的一次亵渎，希望它能够被承认，否则那将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又一次亵渎；很多善良的日本人背负着战争的罪恶感，他们忏悔而又无奈着，希望他们的努力能被承认，这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一种捍卫；希望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不要再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了！

报告文献 （翻译）

立命馆大学映像学部 3 年级（纪录・摄影负责人）

和田慎太郎

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通过摄像机记录了这 4 天的活动和所有研讨会参加者。通过这样的经历，我开始思考，我作为摄影师，内心的动向、以及我会怀有一种怎样的苦恼。我也渐渐明白了前辈土井亨摄影师（他参加了 2007 年的“记忆南京”）以前所说的话。他的那句“拿着摄像机的我，就仿佛持枪的日本士兵一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摄影过程中，我对自己拿着摄像机对准别人的这一行为，感到一丝罪恶感和抱歉，而且还深刻体会到一种内疚的心情。由于人与人之间有摄像机的存在，那个空间原有的意味，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被大大地改变。

平时不会表达出来的内心的思想以及悲伤的记忆，真实地表达出来，并和他让分享，使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宗旨。在这样的研讨会上，一直端着摄像机摄像的我感觉自己的行为是如此的轻率，好像自己是个残酷的存在。但是，我不断地对自己说“摄像，记录是交给我的最大使命”，并且持续这我的设想工作。同时，摄像机的存在也正是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意义所在。

在听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一直边摄像边落泪。在摄影过程中，我的感情被被拍摄对象所感染而落泪，本来作为摄像师是不应该的，但是，我实在无法控制住自己所涌出的感情。

我很害怕如果自己的感情过多地被感染，就会失去冷静的视点。另一方面，作为第三者就像看电视一样接近被拍摄对象时又感觉自己真的是很残酷很残酷。更多的是以后一种态度来拍摄的我，一直对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十分地矛盾。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我一直怀有这样的矛盾。

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研讨会的所有参加者并没以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拿着摄像机的我。大家都很自然地对待拿着摄像机穿梭在会场摄像的我。我对大家对我的体谅，由衷地表示感谢。

最后，在研讨会中还有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我持花走向纪念碑的

时候，注意到一只非常漂亮的蓝蝴蝶在旁边飞舞。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不过回来时在长江畔拍照时，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和刚才那只很像的、振翅飞舞的蓝蝴蝶。我把它拍进了我的照相机。

后来我听说，在世界各地，蝴蝶是和死亡及灵魂相关的存在。所以我觉得，那只蓝蝴蝶也许是飞来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的吧。

我现在非常强烈地想把在南京的所学所感所思，向更多的日本人传递。

记忆南京 2011 交流活动感想文

王柯

作为一名在南京学习日语的学生，今年真的是十分有幸能够参加这次的交流活动。这次的活动中，接受两种截然不同战争体验和教育的中日双方，相聚在一起学习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互相聆听对方的心灵深处的声音。

短短的四天，使我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之前仅从教科书和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而现在则有了更深的认识，接触到了事件的幸存者，以及战争参与者的后代。同时以工作坊这种新颖的形式，来讨论治愈战争创伤，也是我之前未曾经历过的。

接下来就说一说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以及所受到的启迪。

首先，我不是一个南京本地人，所以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只是从教科书以及媒体得到的信息。对于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由于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事先我也做了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在图书馆借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等。特别是《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对我的震撼最大，作者以详尽的历史史料和实地采访等，再现了那段历史。同时对人性进行了探讨。读完之后，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恨不得将眼前的所有与日语有关的书，都扔掉，我讨厌自己所学的日语了。还有就是日本人，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人类可以残忍到那个地步。那真的可以说是“鬼”了。人性真的是很复杂。

这次活动有幸听到了夏淑琴奶奶讲述的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经历。

毕竟，教科书上看到的和自己亲身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奶奶那种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对我的震动也特别的大。我特别的感动，在那场浩劫中活下来了，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艰难。但是奶奶坚持下来了，并积极的对待以后的人生。这样一场在我看来难以承受的灾难，如果是我，我是否能够坚持活下来，我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此联想到现在的自杀率高的社会问题，中日两国都是如此，日本更甚。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越不过去的坎儿，非要用自杀来解决。我都为此感到汗颜。通过夏奶奶的讲述，我感受到她对于那些日本人的那种宽容。但是面对日本国内右翼说她是南京大屠杀的伪证人的污蔑。她愤怒了，一定要通过法律来为自己讨个公道。我十分钦佩这种做法。是的，在这种时候必须态度强硬。否认历史的人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

中日双方也就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我也倾听到了日本方面的声音。对于致歉与宽恕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没办法接受，毕竟我是不能够代表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但是我还是很理解日本朋友的那种深深地歉意。希望日本国内的那些右翼势力有一天也会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做一个真诚的致歉。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的努力。现在国内不怎么注重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到十分的遗憾。个人的一点努力是很小的，对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和解以及民族矛盾的化解，无异于杯水车薪。真心希望以后研究及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这次来的日本朋友，我十分敬佩他们。听到他们的分享，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十分的勇敢，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正视历史问题。同时，我也了解了一些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看法。日本政府有一定的责任，在教科书修改问题上涉嫌篡改历史，不承认事实。

另外，工作坊的形式很新颖，也很利于相互之间交流感情。特别是“戏剧疗法”和“一人一剧场”的治疗方法，可以让我们一同跨越过去、感受、思考。我其实对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中日双方致歉和是否接受的那一场模拟演出。日本友人站在中国人幸存者的立场上，所说的话，实在是振聋发聩。而其他人的发言及思考，也让我久久不能够忘记。

战争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普通民众则是其中最不幸的。他们在无助中迎接战争，他们也在无可奈何的接受战争所带来的任何结果。真心希望中日双方能

够就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和认定。日本右翼人士仍坚决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许多中国年轻人大量接触日本漫画和电视剧，对于日本文化怀有好感，但是一提到南京大屠杀，还是会激动。仇恨不易消除，中日间的友好关系，还需要彼此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名学习日语的中国青年，我也感到了肩上所担负的重任。未来不论从事何种职业，我都会为中日友好交流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记忆南京 2011 ~战争创伤与和解修复的尝试”工作坊后感

渡邉佳代

这次是我第三次访问南京。第一次是 2007 年，那次来南京参加的是国际会议。第二次是 2009 年，参加了国际研讨会。这次是第三次了。在这次研讨会上，中方参与者问我：“通过访问南京，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我回答是：对于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比起以前，现在更深感受到自己的、和不同立场人们的情感。认识到日本加害者问题就是身边的问题。

我的爷爷，因胳膊有伤未能上战场，为此他抱憾终身。我的外公，是原日军军曹，服兵役时在满洲。现在他们都不在人世了。他们当时在战场上是什么心情？又是怎样度过战后的岁月的？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直接询问本人了。特别是外公，右大腿里还留有一颗子弹，他是怎样平安回日本的呢？又是怎样升为军曹的呢？在满洲到底干了些什么？想问的事情有一大堆。

小时候，外公特别疼爱我，对别人从来都是平等公正的。每当谁遇到困难，他都会倾囊相助。“战争很可怕，胜者就是正义者。”“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中国人干了很残忍的事。”外公说过的这些话，至今难忘。

外公是抱着什么心情对我讲这些话的呢？出于这种思考，我开始关注有关战争的课题，并参加了国际研讨会。

经历的三次访问活动，每次主题都不一样。第一次访问活动，主要是亲眼见证在南京发生过的事情，了解发生过什么事。但是，第一次访问时，当看到大屠

杀纪念馆照片的证据，听了幸存者讲述的亲身经历的证言后，我感到了窒息。一方面竭力想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自己的感受却是“绝望”。回国后，我绝望地拼命搜寻证据，想证实外公没干过那些惨绝人寰的事。

第二次访问活动的主题是：敞开心扉和他人交流，充分感受自己和对方的心情。参加了阿尔曼德的HWH活动。通过活动，在绝望中寻求与对方的结合，并竭力从中发现“希望”。通过HWH的心理剧表演，和中国人共同去体验，再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试图将悲伤彻底释放出来。

第二次访问的最后一天，举行了追悼仪式。仪式中，逐渐将日本人加害者和外公联系了起来。回国后又阅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开始将外公服役过的满洲发生的事，与外公结合起来思考。深感对外公在中国干过的事，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可是，对于自己没干过的事，该怎样承担责任呢？怎样做才能谢罪呢？这就是本次活动的主题。

每次参加研讨会的成员都不一样。不过主要成员没有变，日中都有好几位老成员。本次工作坊活动共来了40位成员，是个大集体。开始前，还有些担心不能充分交流。但是，有了阿尔曼德的主持，有一人一剧剧组日中演员的努力，有前辈和伙伴们支持，感觉在本次活动中，日中人员的情感交流更深入更广泛了。觉得在本次工作坊会场，无论什么情感都可以安全表露出来，都得到温馨集体的支持。感到自己和别人的共鸣更深广，可以放心地和别人合作。

比如，通过HWH活动，感到心情在不断变化，产生了比“对不起”更复杂的心情（愤怒、不信任、不关心、嘲笑、无可奈何、孤独等由‘受伤’派生出来的情感），强烈感受到内心的翻腾。

那是因为在日本时，为了解战争而参加研讨会，并不断参加工作坊活动。与此同时，一边与冲自己而来的否定情绪抗争，却又在不觉中受到了否定情绪的影响。在研讨会期间，阿尔曼德营造了安全的氛围，让否定情绪和内心想法在犹豫不决中安全地表露出来。

在心理剧治疗中，布置了摆有代表中国的椅子和代表日本的椅子的舞台。人们可以在舞台上安全地发出表面声音和内心声音。从前辈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们的伤痛，让我对工作坊活动心存希望和感谢，同时感觉到他们深深的悲伤和痛苦。

另外，自己表露出的纠结、悲伤和伤痛心情，也被新成员的后辈和中国人接

受了，他们还努力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这令我深受鼓舞，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希望有一个可以表露任何情感、任何声音的平台。相互之间用肢体动作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情感，这比单纯用语言交流、表达的情感内容更广泛，更能唤起大家的共鸣。感觉本次工作坊已经营造了这样的平台。

在第二天的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舞台上，我喊出了日本声音：“也许我爷爷杀了你爷爷，强奸了你奶奶”。工作坊结束后的今天，那声音还一直深深地刺痛着我。

前一次工作坊感受到了“绝望”“希望”。这次感受到更多更复杂的情感并带回国。其中还包含着对母亲和外公的背叛感、畏惧感和罪恶感。十份担心伤害了对我最重要的这两个人。

中方各位最后表达的希望日本人做的事是“了解事实”“采取行动”等等。现在回日本了，我首先做的事是得到外公的军籍簿。为此需要准备办手续的各种文件，因此不得不面对母亲。

对于我将追寻外公在中国的途经路线一事，母亲说：“只要你心里想着外公的心情，外公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你将外公经历过的事传给下一代，这种做法本身就符合外公的性格。外公原本就想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下一代，希望对后人有帮助。这样想的话，外公是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展示给世人的。”

听母亲这样一说，我绷紧了的神经一下放松了。研讨会活动，让我和家人的追寻活动也一步步向前迈进。

外公和我内心的联系正一点点加强，而至今尚未触及到的是爷爷家，他家与战争也有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上，我之所以能感受到复杂的情感，这和爷爷也有某种联系。这是更具挑战性的、下一步要探讨的课题。

我将不再担心任何情感的表露，将把研讨会上感受到的那种联系和温暖的感觉作为支撑，坚持不懈地参加工作坊活动。现在的感想就是：这就是加害者后代的责任。

记忆南京工作坊的感想

袁晓菊

从南京回来，到现在过去了一个月了，那一次的工作坊，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我记得：其一个片段是：一个中方的参加者，她说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的经历。

当她还是小孩的时候，由于在日本出生，回到中国读书的时候，小伙伴嘲笑她，指着她喊：小日本鬼子。当 ARMANDA 问她这时她想对他们说什么？她说：“你们伤害了我”后来，长大了，她学校的老师对她说：你的成份不好，你不可以读书。”

ARMAND 问她感觉这样：她说：这不公平。。。。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

当我看着这些在我面前发生的时候，我仿佛看我父亲的童年。我看到：他身边的小伙伴嘲笑他，他无声的说：你们伤害了我。“他的学校老师说：”你家庭成份不好，你不可以读书。。

他说：这不公平。。我仿佛看到他难过的背影。。看到他无声的反抗。反抗这不公平。。

我象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与那时候的他一同经历，经历他的嘲笑，经历他受到的不公平，一个12岁的小孩不会知道如何对抗这些不公平，是吗？这一幕一幕，我父亲向我说过的故事，就这样发生，同样的，如果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如果我就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长，我又会怎样承受呢？我的感受是怎样？心理难过极了，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这样的伤痛就根植于父亲的血液里，影响着已经成长为我父亲的他。他对于我的学习非常严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考试不合格的试卷，不敢拿给他看，自己模仿父亲的签名，签在试卷里。因为我很知道他会很生气，会骂我。我不想被责备。如今，所有以前没有明白的事情，今天在这工作坊里面都有了答案。他要给我好的教育，他童年时候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梦想，想看到我来完成。

他用他认为好的方法计划我的未来，在哪读书，然后在哪儿上班。可是，在我就业的时候，计划经济已经解体，接父亲的班，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作已经不可能，只好放手。我知道这不容易，直到如今，他还是常说：内心亏欠，没有把

你们安排得更好。

父亲就这样把他经历的在日常生活中传给我，我接受了。只要读书好，其它的都不重要了。看着现在的自己，读书也不好，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知道又害怕改变，但是，只能够面对了。面对自己的差。

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的是：两个人一个小组，当其中一个说：对不起，另外一个就说：我不原谅你。，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想起：我的朋友为了热情招待我，不但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晚餐。当丰盛的食物摆上台面，而且解说如何烹饪这些食物。我听了，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呢？否认所有付出的努力，我只要读书好，其它的都不重要，不管别人怎样的努力，都不重要。我的同伴说：我不原谅你。更加难过地说对不起。我的同伴忍不住，说了声：我原谅你。这让我完全的释放了。

在这个工作坊，我完全地把自己交出去，让自己感受这些事情，情绪从平静到翻腾，又慢慢平静。原来伤痛和难过是允许的。。原来有空间一起去经历我们内心的最深刻的伤痛，我们整理。把过去和现在从新连结起来。我看见了未知的自己，我理解父亲更多，我是这样形成的。好象有很多的力量充满我。感谢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创伤工作坊。

21

“记忆南京 2011” 感想

张帆

交流会就这样结束了，8号晚上的聚餐让我感觉到了与之前不同的氛围，两国人开始更像朋友一样地交流，甚至开起了玩笑。聚餐之后两国年轻的朋友还在湖边弹琴、唱歌、分享故事。当离别到来时，我感觉到了深深的不舍。或许是这四天的相处让大家彼此更加熟悉，或许是 HWH 工作坊让大家敞开了心扉，或许是活动接近尾声，人们从回忆那段横亘在彼此心中的不堪的历史中走了出来，

心理上感到了轻松。之前虽然大家也在一起友好地交流，但总觉得过于客气，而彼此之间的距离感总是难以突破。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吗？在真正的交流和熟悉的基础上，隔阂是可以慢慢消融的，误解的源头就是错误的信息，然后像手指上的茧一层一层地慢慢叠加，变得坚硬而麻木。我认为交流会的意义就在于治疗因战争而有心理创伤的人，并且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让年轻的两国人民用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并且为和平而努力。虽然有些迷雾依然在阻挡我们的视线，但让我们知道这些迷雾的存在会帮助我们思考和分辨真实。下面让我来梳理一下这四天活动中我的感想。

在活动之前我一直在回避思考这个敏感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会让我陷入很复杂的情绪中：对日本军的愤怒和仇恨，对受难同胞的哀痛，对中国当时脆弱而倍受欺凌的耻辱，对提倡中日友好交往的教育理念的迷茫，对部分日本人民的真心忏悔的举动的感动，对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对工作的认真严谨的态度的敬佩……这些情绪会相互冲撞，让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在3月7号的“一人一戏剧”中某个分享者分享她的感受时，我很受感触，我感觉这就是我想说而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我们总在两极摇摆，绝对的憎恨和盲目的崇拜是两个极端，两种声音在争吵，似乎认同了某一种观点就会成为另一端的敌人。即使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当你的观点让某一个极端的人觉得有某种倾向的时候也是会受到批判的。期盼一种融合，分清历史与现在，分清政治与真情，分清同一民族的不同观点，而不是盲目地将对方涂上某种绝对的白或者绝对的黑。

对于阿曼达教授的戏剧疗法，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在活动刚开始时，作为在感情表达方面习惯含蓄的我来说，让我来表演是很有难度的，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些抵触，很难完全打开并表演出来。我能听到自己内心在呼喊：“为什么要表演？我怎么表演？我演不出来，快点结束吧！”虽然阿曼达教授进行了一些热身活动，但我依然觉得有些困难。我有点紧张，有点局促，自己的感情很难让它自由地流露。而发现了自己的困难后，我又有些不安和自责。可能是学心理学的缘故，我分析了自己在这个活动中的心理感受，发现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习惯于压抑和掩藏，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感受也会有所回避。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我遇到了非常好的搭档，分别是来自同声同戏剧团的春晖和存。他们投入的演出让我很有触动，让我跟容易进入角色，他们鼓励我放松，鼓励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能感觉到从他们那获得了能量。一直自以为没有很深感触的我在

最后一次和存角色扮演的時候终于忍不住哭了。当活动结束后，春晖来到我面前告诉我：“我觉得你性格很好，很自信。”我的内心又被触及，我告诉她：“我其实很自卑的。”春晖给了我一个拥抱，告诉我：“相信你自己，其实你可以做到比你想象得更好。”我感到自己眼眶发热，十分地感动。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刻她跟我说的这句话，每次想起都会给我力量。

由于特殊原因我没能参加3月6日的工作坊，我感到非常地抱歉和遗憾。阿曼达和Aya告诉我去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但是我错过了。由于成长的时代毕竟离那段历史有70多年了，我的父辈和祖辈也没有跟我说过关于战争的事情，都是从影视作品和教科书中了解的，虽然也会有仇恨、有愤怒、有耻辱、有痛心，但那种感觉不足以形成战争创伤，只是当听说日本否认这段历史和其他有辱中国的事情时会特别愤怒。我想这也是我在这么多心存愧疚和真心忏悔的善良的日本人面前会找不到怨恨的理由。

3月7日下午阿曼达为罗老师所作的角色扮演，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处境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为我的父辈和祖辈并没有告诉我任何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所以我的了解很少。当整个角色扮演展现在眼前时，我看到了生活在中日夹缝中的罗老师童年内心所受到的伤害，我想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遭遇。罗老师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愿意为中日和解作出努力，我由衷地钦佩。

3月8日我们一起去看燕子矶祭奠受难同胞。当我看到纪念碑后面的记载文字时，眼前出现了无数面色苍白的逃难同胞面向着滔滔江水，期待着江那边的一线生机，却在日本军的机枪扫射下，成片地倒下，染红了一大片江水……眼眶湿润了，这比苍白的概念更触动人的内心。所以当日本人在听了纪念碑碑文翻译后，有些人泪流不止，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虽然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但是那只是存留在历史上的一段记忆，由于右派分子的编排，更让他们看不到真相。当他们看到、听到一桩桩先辈犯下的血的罪行的时候，内心的冲撞是很大的。祭奠仪式结束之后，中日参与者在一起合影留念，拥抱安慰，笑语中有着湿润的眼眶。我很感动，心中喊道：“一直这样多好啊！其实人民都是渴望和平和友好相处的啊！”

8号下午阿曼达教授进行的空椅子对话活动，让我感触很大，但也感觉到一丝“残忍”。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日方右派的公开言论，我想日本参与者所说的应该就是他们在日本所真实听到的。其中有粉饰，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

他们所犯的罪过是所有战争的罪过；也有反击，认为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镇压新疆反动派、大跃进时也杀了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土，也是在侵略；还有指责，认为中国人反复诉说自己的苦难，不断地指责日本，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许多伤痛……在日本人民内心那个小孩子感觉到的是：害怕一自己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担心有一天被揭发；担忧一日本国土小，担心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所以要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埋怨一感觉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自己也很痛苦，希望不要用祖辈、父辈犯下的错来指责自己。其实日本人民所接受的信息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的，有些并不完全是真相，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很忐忑——难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真相吗？我不敢肯定，因为有更强大的力量在控制着这一切，谁真谁假，谁别有居心，这都没有办法说清。这个活动让我的思想有所转变的地方就是，我知道有些积怨是源于各种信息的误会，唯有互相地交流和深入地了解才能作出判断，不要盲目地跟从挑拨者的口号。当椅子撤走，阿曼达教授让中日两方直面对峙的时候，让其他人站到自己支持的一方。其实我能够理解中方和日方的感受，我知道站在这里的日本人其实是愿意面对历史，真心忏悔，渴望和平的，我也知道中国人其实只是希望真相得到承认，也是能很善良地理解日本民众的。但作为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形我只能选择支持中国一方，我不想让中国这一方显得太单薄。当阿曼达教授让中国一方作为“受害者”要求“加害者”的日方怎么做时，其实我很想逃，我觉得站在对面的，愿意来参加这次记忆南京的活动的日本人都是多么友好和善良啊，他们已经忏悔了，还要逼迫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不是那些直接伤害我们的人啊，这样真的有一些残忍。最后阿曼达教授让中方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次“对峙”，我们选择了拥抱和握手。其实，我们都希望彼此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都希望彼此能够永远像这一刻这么亲近。

被聆听的记忆 被理解的创伤—参加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会心路历程

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郑春晖

2011 年 10 月 4 日—8 日，我有幸以表演者和参加者的身份参加了“记忆南京 2011- 治疗历史伤痕，构筑和平”国际研讨会。作为中国同声同戏剧团的成员之一，与日本 PLAYBACK-AZ 剧团一起，聆听来自中日双方参加者发自内心的故事，为他们演出，感觉十分荣幸。作为参加者，走近已经被尘封的家族历史、国家历史，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与家族与国家有更深的联结。真实地与日本人交往，个中温暖的回忆代替心中对这个名词莫名的恐惧和“侵略者”、“动画片”等碎片式的印象。以下是在研讨会过程中记录下的思绪片断。

（一）融冰

与日本人交往是怎样？来研讨会之前我带着这样的好奇。这个与我们汉族似乎外表很相似，内在流淌着不同文化血液的民族。如果我们在中国或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而不在南京相见，他们对于我，也许只是“外国人”。仿佛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当我们在“南京”相见，这个对于中国人的中日记忆有特别意义的地方，日本人，不只是外国人，还是曾经的敌人。

来南京之前，我曾许多次问自己，对于日本人有什么感觉？

没有恨，因为历史离我们太遥远

不能恨，理智告诉我，这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他们上一辈，甚至上上一辈发生的事情，这是战争里自然发生的事情。

走到心灵深处，对“日本人”这个词，有一些莫名的恐惧。潜意识里，日本人似乎等于日本侵略军。

工作坊开始时，Armand 先生用剧场游戏热身，中日参加者都有一些很腼腆、有一些很活泼，大家仿佛都在适应着新环境，观察着身边的人。甚至人比例上，日方参加者有剧场表达力的更多一些，打破了自己以往觉得日本人拘谨的印象。

在这个地方，敌人的后代有“玩”，重新开始相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开始。

（二）“请原谅我” “你伤害了我”

在完成了几个有趣的角色扮演之后，这两句话扑面而来。同伴中有人在嬉戏，我知道他们的内心还没有适应这种感觉。我告诉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的，让自己进入那个角色，那个此前还有些害怕的角色：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我选择了“你伤害了我”进行第一次的尝试。一开始，这句话象一条管道，帮助我把内心的情绪流露出来。在不断后退的脚步中体会那种悲苦。甚至当“请原谅我”走近时，能量带着我后退，不愿看他。

这一刻，一不愿看见加害者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是我的记忆。当我见到他，就是想起我的屈辱、想起那暗无天日的岁月。我感受到身体的颤栗、内心的害怕。闭上眼睛，我不知要与现实隔绝，还是过去隔绝。

睁开眼睛，看着那诚恳地说“请原谅我”的日本少年，他甚至因为我的眼泪而惶惑。因为我的回避，他甚至不敢走近。

他清澈的眼睛甚至把我带回到现在，我已经不在那个黑暗岁月了，我回来了。

继续着“你伤害了我”，这句话变成一堵墙，阻挡那位走向我的少年，“请原谅我”，他依然坚持并恳切地说着。

我想接受他，但想着这是工作坊的第一个练习，要坚持，我继续用这堵墙阻挡他。

受害者的悲伤和仇恨需要被流露，被看见。

可当它不能被转化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一堵墙，甚至一个牢笼，把自己困在里面，不让外界的走近。

当我成为“请原谅我”，对方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原谅让我感觉到无力，我不知到自己可以做什么，甚至想放弃。而这份放弃又让我内疚。我觉得我卡在那里，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无奈，心怀退意却不能退的无力。

这是希望中日和解的日本友人的想法吗？在这个角色体验之后，我仿佛与他们有心灵的联结。

（三）共鸣圈

工作坊其中一个环节：大家围圈站立，当听到自己有主持人所说情况相似时，

往前走一步。

提问有：采访过亲历中日战争的人

家里有参加过中日战争的人

。。。。。。

其中有个提问是：这段历史没有在家中提及过的。

我站了出来，站出来的人寥寥无几。

我的家族的上两代，不仅参加过战争，而且以不同的身分参加到战争里面，战斗人员、指挥人员、行政人员、记者、秘密工作者。。。。。这些都没有在家族里直接被听说，而是从后来的资料上看到。带着这些故事的老人相继离世，这些属于家族血液一部分的历史被永远地掩埋。为何这些故事没有被说出来？为何有时表面灵牙利齿的我难于表达自己？还有多少故事我们可以抢救？

共鸣圈后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行动。

(四) 身份

这个练习很简单：我是某某某，我是某国人。

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也有听外面对自己国家的评论，美好的都属于过去，关于现在都不是什么好词。

作为在一个中国人，我自豪，我自卑，仿佛都说不上，却有一个很明确的信念，做一个不被别人看不起的中国人。

作为中国大陆人的身份，在与香港人的交往中被呈现。那种感觉也是复杂的。香港的制度、某些领域的发展都优于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可一部分香港人的那点优越感。即使是很熟悉的朋友，谈及某些事情，“我们香港如何如何。。。。。。，我们香港如何如何。。。。。。，还是很不舒服。”

谈及到大陆的民主，这似乎也是一个我们共识不会谈及的话题。不是有高低之分，而是我们接受原本就是不同的教育，自认文明的民族不愿放下自己文明的身段云，去聆听文明之路的困难；自知野蛮的民族不愿在高高在上的文明面前，低下自己本已不多的尊严。只是各执己同文同种同根，触及到价值观，同胞兄弟仿佛瞬间天各一方。

在这个练习之前，没有想过“身份认同”对于自己有这样大的冲击。我是谁，我属于哪里？这所属的族群是否在整个社群中的位置，原来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接触这个练习，我尊敬为和平、和解而来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尝试了解、面对这样的历史，这份勇气让我敬佩。

在这个练习之前，我接触到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从前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唱歌，仿佛我们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当他提及，在国外，他被认为是“中国人”，来大陆，他走的是“外国人”的通道，这样的划分让他很难理解和接受。

(五) 共创一个童话

工作坊里，一个环节是二人小组共同创作一个故事，一个个子微小的日本人，遇到一个中国人。

我和同伴编的故事很写实，日本人中途就长大了，遇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是中国人，他要救，这个中国人不让他救。后来这个中国人昏迷了，日本人还是救了他。中国人很挣扎，原谅这个日本是对家族的背叛。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个人先接受日本人，然后再向家族人的介绍，有不同的日本人。

(六) 对话 1

今天的对话让我很震撼，让我看到日本朋友的勇敢和我们面临各自政府的无力。

场地面对面地摆着两张椅子。Armand 先生说，这分别代表中国人和日本人，当你们选择一边，就是选择代表这个身分的人在说话。无论你自己原来的身分是什么。

当第一位日本人走出来，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说：现在的日本也是四分五裂，千疮百孔。。。。。。

我的心被触动，当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还停留在侵略、动漫、樱花等等碎片式的印象时，没有想过，这个国家也是他的苦和痛。这种对国家前景的担忧，作为国民的无力，是一致的。当我们常常以受害者的身分，要求这个国家对战争负责的时候，它们的政府，甚至还不能对他们的国民负责。核泄露，海啸；体现了应急措施的有力，国民良好的素养，也体现着政府的无力。我们以“受害者”身

分咄咄逼人时，是否真正体察当前这个国家也面临的难关。

中方的椅子一直空着，直到一位日本人冲上来，以中国人的身分向日方控诉着自己经历的苦难。南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也不轻易揭开的话题。日方参加者代表中方进行控诉，帮助中方参加者打开情绪表达的出口，我内心有份很大的尊敬。怎样的勇气，才能直面自己国家的这段历史，然后穿越他。

当我自己站出来，最大的感受是无力。日本右翼抹杀历史的“教科书事件”，日本政府采取了默许的方式。中国民众在中日战争所受的苦，也因为以经济利益为前提的“中日友好”而掩盖。还有许多的苦，许多的委屈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诉说。中日战争中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人民的伤口并没有被抚平，没有感觉到他们的作为“人”的伤痛被真正地了解和聆听，他们只是作为“证据”着。所以中国受害者的受害是双重的。

伤口被展示，只是政府作为证据来证明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其中的大部分害怕、委屈、屈辱因为没有被聆听。所以表达出来的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恨。

当我认识的中国人站在日方的角度发言，我的内心有交战。一个直觉的声音说：你怎么能站在那里？另一个声音说：她这样做有她的理由，她不可能背叛分子。相信她。

第二天，她向全体提问：是否感觉到她的“背叛”，那刻，我的心更释然，更佩服她的勇敢，明知也许被误解，她还是勇敢地为了和平，为公义，为了让彼此有更多的了解，走到了“敌人”的阵营。当今的中国，不正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年青人吗？智慧、勇敢、愿意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这次对话中，我发现我们需要不是日本人的道歉，事情已经过去了，错误也不是他们犯下的。

我们需要日本政府承认事实，对过去的战争负起责任。甚至对战争，对事实有不同的解读，中日双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事实。

但承认事实是重要的。

（七）拜祭

长江岸边的燕子矶，这是南京事件中的一个屠杀点，资料上说有5万，而可能事实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在这里被日军枪杀，直接进入长江。

拿着门票，即将拾级而上，忽听旁边的孩子的朗朗书声。

忙问，这里有一所小学吗？

当地人说：是的。

是公办的小学吗？

当地人：是的。

在这片被鲜血浸润的土地上，儿童们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到希望带来这个地方。

（八）对话 2

还是两张椅子，还是两个阵营，这次我表达了来中国了解本国的历史的朋友深深的敬意。

同时，我们发现，尽管在政府层面我们有许多无力，

但把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让身边的人和朋友知道，当越来越多人了解事实，对真相的解读也越接近。

（九）需要

参加这个研讨会，解开了自己的一些疑团：

为何日方认为自己已经多次道歉，而中方仍然在要求？

除了道歉，中方需要日方对于历史，为了和平进行怎样的努力？

日本有不同的首相因为历史问题向中方道歉，中方认为这仅代表首相个人，而非日本政府一贯的态度，以及首相并非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教科书事件”成为中日历史问题的焦点之一，中国一部分民众认为这是日方政府在行动上明确支持篡改历史和不承认事实的态度。

作为中方人民的一份子，当然希望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对战争负起责任。而对于日本友好人士，我们把向中方的道歉、谢罪作为对方为和平努力的礼物。尽管政府的态度不能一下子改变，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已经是为和平、和解在付出努力。

而中方对于历史本身，也更需要有更广泛的传播和新的认识。现在离南京远一些的地方，青年人并不知道历史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对于“南京事件”

许多也只停留在“大屠杀”等这样的名词中。对于史实的了解更多出于证据的需要。经历的这次研讨会，我们可以对大屠杀的亲历者、家属后代、甚至这个城市的居民，提供带有人文关怀社会服务、创伤治疗等，通过教育、媒体、演出，让更多的人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段历史。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走过创伤，真正地达到和平友好。

研讨会的四天里，我们和日本人除了参加工作坊，还在聊天、唱歌、演出。。。。。。距离反而带来一种吸引和亲近，也许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为和平，我们在一起。片断式的记忆连同和平的信息伴随我走向将来更远的地方。

23

“记忆南京 2011” 國際研討會參加有感

翁曉丹

時間如白駒過隙。2009 年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國際研討會，已是兩年前的事。

當接到村本老師的邀請時，我毫不猶豫決定參加。其理由是，09 年在南京之所見、所聞、所感，已經經過兩年時間的沈澱。我想看看兩年前所感受到的東西現在被消化了多少，在我的身體和心裡以何種形式被保存。另外，再次踏上南京這片土地，我會有甚麼樣的感受。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是我對南京國際研討會本身的成長非常感興趣。無論是有怎樣的改變，我都想親身體會它的每一個變化。據我所知和觀察，即使是中國本土從事心理學研究者，尚未熟悉和接受戲劇療法和表現藝術療法。

另外由於主持國際研討會的工作坊的是美國人和日本人，所以在 09 年的工作坊中，我發現中方參加者努力適應著工作坊獨特的進行方式和氣氛。今年的參加者中雖然有幾名參加過前年研討會，但其他基本都是新成員。而且參加人數達 40 多名，這個數字對於工作坊來說是很有挑戰性的。再加上今年的工作坊中除了戲劇療法，還增加了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手法。

因此，今年工作坊會如何進展，除了一些擔心，我還是很期待的。關於這個莫名奇妙的期待，我沒有任何確切證據，只是隱隱覺得，南京研討會承載了很多

來自靈魂的重量。無論研討會向哪個方向發展，它本身就象徵了對那段歷史的超越民族的祭奠。

關於活動本身，首先，我一直都認為即使曾經去過，工作坊開始前去一次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一個很重要的熱身和準備。我曾在兩年前研討會的首日，和參加者一起參觀過那裡。今年因為研討會日程以及自身行程的安排，沒能再次前往，自己覺得非常遺憾。前往紀念館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復習歷史，更重要的是在紀念館有其獨特的氛圍和能量中，自己的身體會更快更自然地融入工作坊。

另外，雖然工作坊開始前我知道會穿插進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手法，但當第一天看到劇場成員的表現時，我還是很驚訝。可能當時自己還沒有完全打開。之後慢慢習慣後，就開始佩服他們極具張力的表現力。

隨著工作坊漸漸深入，我意識到身體似乎不滿足於這樣的參加狀態。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確在情感共有這一方面，是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表演者以外的人，都只能用眼睛看。也就是說，觀者只是用眼睛接受某種情感的信息，究竟這個情感能否讓身體也感受到，對此我是懷有疑問的。至少，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沒有得到情感的共享信息。工作坊中語言使用的很多，我用的最多的，是自己的眼睛和大腦，而不是重視身體和心靈的感受。

第二天早上工作坊開始前，幾位參加者向大家描述了“此刻的心情”。同時，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成員依次用群體雕塑的形式表現這個情感。幾個人看下來，雕塑表現出來的情感和參加者本人所講述的情感之間，我沒有看出來貼切的意思。但是當主持人問參加者本人時，幾乎每個人都回答“很貼切”。我知道情感被別人百分之百理解並表現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沒有感受到敘述者本人所敘述的情感與雕塑所表現的情感有貼切的地方，這也是我真實的感受。我不知道在這個場景對於觀看的人來說，意義在何處。因為觀看的人既不在敘述，也不在用身體表現，只是旁觀者而已。

雖然參加者絕大多數不是專業表演者，但我更希望有讓每個人用自己身體表現的機會。就算成品很不專業，但是重視創作過程本身才是心理治療的根本。

總的來說，第二屆南京國際研討會比第一屆有了很大的成長。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能和兩年前的夥伴再次相見。兩年前的研討會在我們身體裡留下了很多印記，並在這兩年中，或大或小影響了我們的人生軌跡。兩年後大家相互分享各自的體會，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這兩年中，中國國內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隨著通貨膨脹，社會貧富差距增大，執政黨的社會信用度下降等國民不安因素增加的同時，來自草根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以用身體和心靈體會歷史，關注真實歷史中的“自我”，與“自我”對話為主體的南京研討會，無論對中國還是日本社會，都有其社會意義。今後南京研討會以何種形式繼續下去，是我們今後的課題。